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全球化城市的跨界想像：從當代台北城市書寫談起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of Global City: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Taipei



黃正嘉
Cheng-Chia Huang

指導教授：黃宗儀 博士
Advisor: Tsung-yi Michelle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June, 2011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全球化城市的跨界想像：從當代台北城市書寫談起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of Global City: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Taipei

本論文係黃正嘉君（學號 R96228007）在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所完成之碩（博）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8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黃宗儀

（簽名）

（指導教授）

林杏姿

梅宗玲

謝辭

三年了，這是一段忙碌焦慮，卻又充實愉悅的旅程。最要感謝的就是黃宗儀老師，謝謝妳用溫柔的言詞和犀利嚴謹的態度，帶領愚鈍的我走完這段路。謝謝妳給我擔任助理與助教的機會，讓我學習在埋頭唸書之外，行政與教學的經驗！

也謝謝梅家玲老師與林秀姿老師在口試時每一個寶貴的意見。還要謝謝開朗的姿瑾，與總是充滿衝勁的敏真，給我很多研究上的意見與資訊。另外，也感謝懿仁學姐的資料與研究室和一起修課的大家：志偉、俊佳、柔漪、偉傑、琪君、乃甄、又華、依陵.....。以及支持我的朋友：芝維、爵安，與我的家人。

這些日子以來，發現做研究真是一件既令人焦躁又讓人雀躍的事，它就像一幅沒有範型、也沒有既定拼圖塊的拼圖，有的只是一個模糊必須不斷修正的問題意識，以及努力尋找來的每一塊破碎的資訊。而這拼拼圖的過程我們將不斷檢視自己的所思所學，痛苦又歡喜地最終長出「做學問」的能力。

在完成這本論文之際，我的拼圖開始找到了下一個第一塊.....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

全球化城市的跨界想像：從當代臺北城市書寫談起

黃正嘉

中文摘要

Appadurai (1990) 指出今天全球化文化過程的核心問題在於，一方面我們存在天涯若比鄰的幻覺，而另一方面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卻同時存在著異化的狀態與心理上的距離；也就是說，我們要理解作為全球化城市的台北其文化的核心衝突，最重要的是去探查全球化台北可能一面伴隨著各種空間跨界想像，卻一面在這些想像中存在各種畫界的衝突。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對台北城市書寫現象的觀察，以及文本作品的分析，指出全球化的情境下，正在產生台北地理空間的跨界想像；而這種跨界想像主要隱含著寰宇主義的地理空間觀，包括：台北與世界一體的鄰近感、台北在現實地緣經濟重組中，感知層面上新的都會區域想像，以及台北新的社會文化想像。文中我以三種台北城市書寫現象：「台北時尚書寫」、「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和「移工書寫」，來分析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各種型態。並指出其中如何存在各種意識形態，與階級、種族、性別的限制，進而衍生了台北新的邊界，回應 Balibar 「邊界搖擺」 (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概念。另外，在研究取徑上，也希望本研究能提供未來以文學作為地理學研究一個初步的示範。

關鍵詞：跨界想像、邊界、精英式寰宇主義、分層式寰宇主義、多元文化

Abstract

Appadurai (1990) indicates the core issue of nowadays globalized culture roots in a conflict. The fantasies of electronic propinqu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lie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ccordingly, to realize the core conflicts of globalizing Taipei, the essential move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cross-border imaginaries of globalizing Taipei and recognize the conflicts of different boundaries as well.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emerging with globalizing Taipei by observation of the Taipei city writing phenomenon and following the literature approach. The recognized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implies the spatial concepts of Cosmopolitanism: the proximity between Taipei and the world, the imagination of new metropolitan Taipei in the economic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new Taipei social culture. Three categories of Taipei city writing phenomenon are reviewed by this study to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cross-border imagination among cosmopolitanism: Taipei fashion writing, migrant worker writing, and Taipei-Shanghai romance. Responding to 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and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by Balibar, this study indicates how different ideologies along with constraints on class, gender, and ethnic lies in the cross-borders imagination among cosmopolitanism while forming the new borders of Taipei. Furthermore, the approach proposed by this study could be a preliminary demonstration for future literary geographic researches.

Keywords: Cross-border imaginary, borders, Elite Cosmopolitanism, Layered Cosmopolitanism, Multiculturalism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3
一、寰宇主義	4
(一)、「精英式寰宇主義」	4
(二)、「城市區域連結」與「分層式寰宇主義」	6
(三)「差異的寰宇主義」、「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	9
二、邊界搖擺與新邊界繁生	13
三、台北城市書寫研究	15
第三節、文本取材與問題意識	20
第四節、研究方法：再現理論與文本分析	22
第五節、章節安排	23
第二章 台北時尚書寫	25
第一節、「台北時尚書寫」與精英式寰宇主義	25
第二節、暢銷上海的《蛋白質女孩》與分層式寰宇主義	27
第三節、改邪歸正的台北？	30
一、正面新興的台北圖像	30

二、再製階級符號的對立	31
三、被定義的台北	33
第四節、小結	41
第三章、台北上海愛情故事	43
第一節、兩岸書寫：從「反共懷鄉」到「台北上海愛情故事」	43
一、台北與上海的「分層式寰宇主義」	43
第二節、兩種「台北上海愛情故事」	46
一、《雙城故事》	48
二、《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	53
第三節、小結	64
第四章 移工書寫	66
第一節、「勞工文學」到「移工書寫」	66
一、勞工文學的興衰	66
二、移工書寫在台北，新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	68
第二節、《外勞詩文獎》作品	72
一、強調移工卑微的社會位置	73
二、凸顯台灣／台北的文明進步	75
三、以「勞動」再現移工	77

第三節、《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81
一、批判邊界	82
二、無法超越「公民權」的多元文化	85
第四節、小結	89
第五章 結論	90
第一節、研究成果分析	90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後續議題	93
References	9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Sassen (2006) 提醒我們，研究城市能幫助我們瞭解當代全球化社會過程，全球城市是探看全球化合理性與重要性的主要空間場域。也就是說，如果要探究台灣全球化的現象與問題的話，首善之都台北就是我們必須特別關注的地理空間。徐進鈺與郭彥弘 (2005) 在《Globalizing Taipei》的序中也強調，台灣將近半個世紀的全球化過程，首都台北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其為主要跨國生產、國外投資與跨國貿易的空間聚集地。因此要瞭解今日或未來台灣全球化的發展與衝擊，我們必須先關注當代台北的全球化。

觀察今天全球化城市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於，各種流動與科技的革新，造成 Harvey (1990) 所說的「時空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 ，加上全球經濟網絡連結和區域合作下，跨越行政界線或國界，這種都會區域新空間形式出現，城市看起來似乎能跨越原有地理空間的限制：「再也沒有所謂的『自然邊界』 (natural borders) 」 (Bauman, 2001: 96)。但另一方面，界線 (boundaries) 和邊界 (borders) 在城市裡卻再度成為問題。

這些相關的討論放在台北，有的從階級差異的社會界線 (social boundaries) 談起，承繼 Sassen (1991, 2007) 觀察全球化使城市空間秩序「雙元化」，「階級與空間極化」的概念。如：夏鑄九指出台北都會區域面臨社會片斷化 (fragmentation) ，高所得家庭與低所得家庭差距拉大，且陷入不可逆的惡性循環 (夏鑄九, 2003；夏鑄九、劉昭吟, 2003)。有些從全球城市空間界線的面相切入，包括對「族裔空間」的研究，如：陳虹穎 (2008) 對台北車站旁小印尼跨國移工聚集地的觀察；以及王志弘等人 (2009) 研究台北縣東南亞移工「族裔化地方」，空間畫界政治的運作。或是像王茜穎 (2006) 從全球城市都市計畫的角度，討論全球一地方的競逐與分

界；與黃孫權 (2006) 在其〈如何測量台北的邊界？—border, boundary, frontier and in between〉一文中，提到全球化時代，台北的行政界線只在「身份」領域起作用，都市內部充斥違建、「門禁社區」與全球景觀截然不同的空間區隔。

但這些台北全球化面臨的跨界和邊界、界線的討論，主要關注於實質界線運作與社會階級、都市空間的區隔，較欠缺在感知和想像層面的觀察。Appadurai (1990) 提醒我們要檢視全球化問題，我們不能忽略「想像」的重要性。因為「圖像、想像的和想像力，這些詞彙能夠帶領我們更批判性的看待全球化過程中新的文化過程」(5)，他指出想像不是虛無的幻境、不是現實的逃逸、不是與一般人無關的精英消遣，也不是與一般主體和慾望無關的盤算，相反地它是社會事實，並組織我們的社會實踐，全球化最大的特徵，便是我們活在一個充滿想像並被想像中介、支配的世界。Appadurai (1990) 更進一步指出今天全球化文化過程的核心問題在於，一方面我們存在天涯若比鄰的幻覺，而另一方面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卻同時存在著異化的狀態與心理上的距離；也就是說，我們要理解台北全球化文化核心的衝突，最重要的是去探查全球化台北可能一面伴隨著各種空間跨界想像，卻一面在這些想像中存在各種畫界的衝突。

然而我們又該如何去探索伴隨台北全球化產生的想像和問題呢？Norton (2006) 在其《文化地理：環境、地景、認同與不均等》給研究者一個方向，他強調文學對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文學能幫助研究者去洞悉我們想像的世界。針對於此，我隨之開始思考從文學地理面切入研究的可能性。初步觀察，雖然 Crang (2003) 已經指出「過去二十年裡，地理學家越來越關注各種文學形式，以之作為探究地景意義的方法」(57)。台灣地理學研究卻少見文本分析，更別提研究文學地理議題。當 2008 年秋天我驚喜的看見書店架上陳列著一本《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時，仍看到文學研究背景的作者范銘如，是以開拓過去文學領域偏重時間縱軸而被忽略的橫向空間為目的，試圖結合空間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文本中的空間與空間對文學形式的影響。如同 2010 年 Saunder 對文學地理領域的回顧，提到：

「近來一些犀利的研究地理與文學關係的文章，並非來自地理學科而是文學研究」(436)。因此，我開始試想我的研究，是否能從文學現象的觀察與文本分析方法著手，提供一個在政治和經濟地理視野外，批判性理解全球化台北都會空間的新觀點。

有鑑於這個發想的過程，我逐漸聚焦到一個比較大方向的操作與發問。也就是，我將透過對台北城市書寫現象的觀察，以及文本作品的分析，指出全球化的情境下，正在產生台北地理空間的跨界想像；而這種跨界想像主要隱含著寰宇主義的地理空間觀，包括：台北與世界一體的鄰近感、台北在現實地緣經濟重組中，感知層面上新的都會區域想像，以及台北新的社會文化想像。並進一步指出其中如何存在各種意識形態，與階級、種族、性別的限制，而導致了全球化台北在感知的地理空間上，什麼可能毫無阻礙的被擁抱接受，顯得自由無邊界？什麼又困難重重的被畫界在外，回應 Balibar (2004) 所提出「新邊界的繁生」(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觀察。另外，在研究取徑上，也希望本研究能提供未來以文學作為地理學研究一個初步的示範。

第二節、文獻回顧

因此，本節文獻回顧主要分成三部份。第一部分我首先指出全球化帶來的跨界想像隱含的是寰宇主義的世界觀，進而整理學者對於寰宇主義的相關研究。而針對這部份文獻的討論，我初步將寰宇主義歸納為三種型態：精英式寰宇主義、分層式寰宇主義 (layered cosmopolitanism)，以及悅納異己 (hospitality) 的概念與「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藉由學者們的研究，深入歸納寰宇主義作為跨界想像，背後可能存在的問題與矛盾。而第二個部份我除了要初步整理界線、邊界研究的發展，更要說明 Balibar 對於「邊界搖擺」(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觀察，並指出寰宇主義跨界想像

能幫助我們理解全球化邊界問題的矛盾。第三個部份，我則關注在研究取材與方法上，針對目前對台北城市書寫相關研究的發展、成果，與未竟之處作一整理。

一、寰宇主義

過去各學科對於全球化發展過程的討論，通常集中在經濟學的領域。不過近幾年來，學者越來越重視文化對於政治界線的決定、經濟的驅動、公民對於家園理解的建構和社會區隔的創造等，均扮演關鍵的角色。而也就在此脈絡之下，包括政治學、文化研究、人類學、地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界，開始逐漸熱衷於「寰宇主義」的本質和可能的類型 (Keith, 2005)。Douzinas (2007) 也指出「寰宇主義」確實已經引領起成千上萬學術書籍和期刊研究；Harvey (2000) 甚至以「Cosmopolitan is back」來強調寰宇主義傳統的哲學思維，已經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捲土重來。

（一）「精英式寰宇主義」

從政治學、國際關係和經濟學的角度，全球化最主要的特徵是物質上的「連結性」 (connectivity)，然而伴隨著實質「連結」增加，與之同要重要的概念，是在心理感知層面上「全球意識」 (global consciousness) 的出現 (Robertson and White, 2007)。Tomlinson (2007) 用「鄰近感」 (proximity) 深入說明這個現象。他指出「鄰近感傳達出與遙遠真實世界關係的直接即時性，及因彼此關聯而受影響的因果關係，……使任何人都無法自其中跳脫出來，而有了同舟一命的依賴感和參與感。」(4) 簡言之，就是跨越空間與地理界線「天涯若比鄰」的感覺。而這種「強制的鄰近感」 (enforced proximity)，通常隱含寰宇主義 (cosmopolitanism)¹的概念 (鄭榮元，2007)。

寰宇主義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其希臘字”kosmos“（「世界」之意）和”polis“（「城

¹在《文化與全球化的反思》一書中，鄭榮元原是將”cosmopolitanism“翻為「世界主義」。但為了譯名統一，本論文一律將”cosmopolitanism“稱為「寰宇主義」。「世界主義」與「寰宇主義」意思相同。

邦」之意) (Held, 1992&1995; Tomlinson, 2007) 。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臘斯多葛學派和犬儒主義對於城邦政治的討論，而現代寰宇主義的概念則以 Kant 為首，投射出超越國家的國際聯盟願景，和所謂「地球村」、「世界公民」的意義 (Held, 1992, 1995; Tomlinson, 2007; Douzinas, 2007) 。

現代寰宇主義概念雖然主要是 Kant 國際政治的思想，但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2009) 認為 Kant 的寰宇主義其實是一種地理空間觀，但同時此空間觀又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因為 Kant 在其《永遠的和平》中，假定地表為各個主權國家分割的領域，不同國家的居民有各自的公民權，國與國之間會受到商業和貿易的依賴而維持和平。並認為有一種超越人類學和地理學知識，普世皆準的寰宇道德，也就是在有限的世界上，人們相同地擁有地表，所以每個人在跨越邊界 (尤其為了貿易目的的跨界時) 都有權被「悅納異己」(hospitality) 的對待。這種地理空間觀，不但把國家本質化，把公民權與國家相互定義，還給予商業貿易行為正當性，並假想世界上存在著沒有地理差異的寰宇道德。

Harvey (2009) 認為這種地理概念的瑕疵，使寰宇主義很容易與自由主義的傳統結合。因為 Kant、Euclid 幾何學與 Newton 科學的時空觀一樣，架構了錯誤的自由理論和「世界史」幻想，並進而影響到後來自由主義者 John Mill 將世界想像為彼此連結且平滑的表面，統一固定的知識單元的觀念。也就是認為世界上存在與地理和人類學知識無關的自由的德性。包括人性的「liberty」和貿易「freedom」都是沒有地理差異的寰宇道德。這進而演變成一種種族中心主義，認為將自由帶入「落後」和「未發展」的地方是白人的使命；或促成家族長主義和干涉主義者的行動計畫。就像 Simmel 所言，寰宇主義因此常被拿來成為都市中心或大都會區域類殖民擴張的語言，合理化其地緣政治上的擴散和對遙遠地域的影響；而 Gramsci 則以「帝國寰宇主義」 (imperial cosmopolitanism) 加以批判，認為寰宇主義是受中世紀教會人類普救說，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影響 (Brennen, 2001) 。

不過，Harvey (2009) 認為全球化的當代，寰宇主義延續 Kant 的地理觀而招致的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其結合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自由民主的理想被等同於自由貿易，並視為超然的寰宇道德。所以雖然許多證據都顯示新自由主義造成市場寡佔、小額借貸卻被高倍利息剝削等，地理不均等發展問題。但許多人，例如：John Friedman 等人，卻誤把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視為寰宇主義理想的實踐。「把寰宇主義的未來寄託在全球自由貿易系統商品往來所恩賜的福祉」 (Robertson and White, 2007: 79) ，這種樂觀的看待自由貿易帶來的美麗願景，其實把貿易無疆界的世界等同於世界邊界解除的烏托邦想像。

因此越來越多反寰宇主義的論述，開始討論以寰宇主義來想像全球化地理空間的跨界，只是拋出一個新自由主義經理人／資本階級的「地球村」意識形態，其中可能存在明確的精英階級意涵。像是 Craig Calhoun 就指出，寰宇主義發展的歷史不只是帝國、遠距貿易和城市的計畫，更是一種由旅行者階級意識反映出的精英計畫。Saskia Sassen 也指出一般人很容易認為跨國專業管理階級的全球主義就是寰宇主義 (Harvey, 2008)。而 Bauman (2001) 也同樣提及寰宇主義是能自由移動「高上」階級的專屬經驗，他認為全球化世界形成兩個極端：對第一世界的居民而言，這個世界是四海為家，充滿全球貿易、全球文化經紀人、或全球學術超地域性的；距離瞬間可及、國家疆界不再重要。但對第二世界的居民而言，這個世界充滿藩籬，各種移民控制、居民法規、「清潔街道」 (clean street) 、「零容忍」 (zero tolerance) ，到處都是越築越高的城牆和難以跨越的界線。Douzinas (2007) 也主張今天我們並未真正看到一個存在於寰宇世界 (cosmos) 中的人 (demos)，因為我們沒有寰宇法律，有的只是面臨瓦解的國際法；我們沒有普世的正義，有的只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我們也沒有寰宇主義的世俗經驗，有的只是坐著噴射機的億萬富豪。

（二）、「城市區域連結」與「分層式寰宇主義」

針對上述寰宇主義只屬於精英階級經驗的批評，David Held 則提出八點原則²，認為若能遵循這些原則，便能透過治理的形式實現寰宇主義的理想。並且為了避免寰宇主義落入「普世性」(universalis) 的陷阱，而忽略了各地的差異與道德和政治事務闡釋的複雜性。他從地方的 (local) 、國家的 (national) 和區域的 (regional) 事務思考出「分層式寰宇主義」(layered cosmopolitanism) 概念來回應 (Harvey, 2008) 。

Harvey (2008) 認為 Held 等人之所以會提出像「分層式寰宇主義」這種「新的」寰宇主義地理觀，是觀察到資本主義活動和組織空間尺度轉移的各種現象所影響。也就是說，像是歐盟組織出現，或是全球化城市間的連結網絡，與都市區域的形成，這類實際空間的「再尺度化」 (re-scaling)，讓許多學者以為正好能夠修正過去寰宇主義存在西方殖民主義、白人種族中心觀，或只以精英階級經驗出發的缺陷，藉由因應各地理程度的差異，發展出兼顧地方特殊性 (particularity) 的寰宇主義理念與跨界想像。

關於全球化城市間的連結網絡，與都市區域的形成，早期如 Klaus Kunzmann 就曾觀察到。他發現城市之間有策略性網絡的出現，其是以城市為行政單位作網絡連結，也就是兩個城市之間或兩個城市以上的聯盟 (alliance) ；如：姊妹市和歐洲城市協會 (Friedmann, 1997) 。Scott (2001) 則以「全球城市區域」 (global city-regions) 的概念，強調城市區域成為全球尺度，經濟、政治和領域的新結構。並指出城市區域的三種型態：最典型的模式是一個中心的都會區，與其腹地和幾個發展較慢的從屬地域的結合；另一個常見的模式是空間重疊或聚合的都市區域。他們是為了相互合作產生的利益，形成既獨立又緊密結合的聯盟。第三個則是跨越國界彼此連結的城市區域模式。而 Sassen (2002) 也修改其原先認為「全球城市」是以紐約、倫敦、東京為權力控制中心的觀點，改以「鍊鍵城市」 (linked-city)

²Held 提出的八點原則為：一、平等價值與尊嚴；二、主動機構；三、個人責任；四、尊重認同；五、選舉決定公共決策；六、包容而分權制；七、免除重大傷害 (avoidance of serious harm)；八、永續性 (Harvey, 2008) 。

來形容全球城市網絡連結，所形成的跨界地理形式。亦即，都會區域、城市群、城市連綿區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新空間形式（夏鑄九、劉昭吟，2003）。

80年代亞洲、太平洋地區，也開始可見城市間的連結網絡與都市區域的形成，並將台北整合於其中。例如：亞太經合會（APEC）跨太平洋的城際網絡出現（Friedmann, 1997）；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台灣、香港和南中國沿海，以台北、香港和上海兩岸三地城市為核心所鍊結的「南中國成長三角」（South China Growth Triangle）（郭彥弘&徐進鈺，2005）；擴大這種台北與南中國沿海開放城市的連結網絡，王愛華（2004）更指出一種「大中華」文化的「區域劃分的技術」（zoning technology）；亦即，在中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特別行政區政策下，中國東南沿海、香港、澳門、台灣和新加坡，跨越海峽的華人城市區域鍊結的形成。除此之外，還有藉台灣與美國矽谷、台灣與日本兩種合作經驗，城市連結形成的「雙黃金三角」：「矽谷—台北—上海」和「東京—台北—上海」（周逸衡、徐明宜，2001；黃鎮台，2001）。尤其在兩岸三通政策實施、ECFA 簽訂後，更將出現以台北、北京、上海三邊城市連結，新的大中華市場「黃金三角」（萬瑞君，2010）；與將台北、上海、東京、首爾納入一日生活範圍³的「東北亞黃金航圈」（林祖嘉，2010）。孫瑞穗（2008, 2010）⁴還認為在兩岸三通，台北到對岸上海的跨國距離，比台北到國內城市距離更短。這種城際的連結，將建構出一種「新的東亞區域想像」。

這種城市區域連結的趨勢，看似已經透過多層次的空間組織，創造了跨越國界的空間關係與空間感知，符合 Held 所提出的「分層式寰宇主義」。然而 Harvey (2008) 則提醒我們，必須去瞭解這些分層（layering）是如何？以及在什麼尺度下被生產出來？像 Jayasuriya (1994) 就指出，區域是政治作用的產物，藉由概念、隱

³目前已完成台北松山機場—上海虹橋機場，與台北松山機場—東京羽田機場對飛，有人用「台北—上海一日生活圈」和「台北—東京一日生活圈」的說法。未來還將計畫台北松山機場與首爾仁川或金浦機場的航線。

⁴詳見：觀念平台：打開新東亞想像（2008）中國時報，12月9日A19版。以及名家—台海地區的新區域觀（2010）旺報，7月23日文化週報版。

喻和類比，想像有一個特定時空認同區域的存在。Wilson (1997) 也指出，例如：亞太經濟合作架構，以「亞太」作為一種範疇概念，將太平洋地區描述成崇高與無限的海洋，以象徵自由化「無可限量」的亞洲市場，用以創造統合性的框構，來指認跨越疆界而凝聚的區域，而催生了亞洲與太平洋地區成為一個「亞太區域」的想像。

Wilson (1997) 進一步批評，區域這個被修辭假定出來的社會想像，事實上是背負著資本主義追求自由貿易的動機。Harvey (2008) 更是直指區域這種被創造出來的單位，背後其實是為了新自由主義的目的，而非寰宇主義的理想。因此 Harvey (2008) 認為如 Held 等學者提出的「分層式寰宇主義」，錯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現況，作為修正過去寰宇主義缺陷的範本，反而秘密地仍在支持新自由主義邏輯和增強階級控制。

除此之外，Harvey (2008) 指出由於 Kant 的寰宇主義地理觀，一開始就沒有跳脫民族國家主權的思維，「所以在 Kant 之後，寰宇主義大部分潛藏了不是帶有階級意含競爭性的自由主義，就是保存了國族主義和階級力量為基礎的民族國家政治」(78)。也就是說，像這類「分層式寰宇主義」除了是新自由主義商業目的創造的城市區域連結外，其實往往還蘊藏著「國族主義」的力量，因為其無法排除那些以極度效忠國家、種族或信仰為基礎的「行政區域制度」(parochialism) 的觀念，所以反倒仍產生新的國家政治社群劃界。Robbins (1998) 甚至認為：「寰宇主義有時候是與國族主義相互合作，而非相互違背」(2)。

總而言之，上述學者們的討論，提醒我們架構在當代城市區域連結現況，而發展的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必須小心地檢視其中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國族主義之間運作的複雜性。

(三)「差異的寰宇主義」、「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

另一方面，當代全球化，人口流動頻繁、認同複雜現象所帶來的衝擊，還促

使學者們重新反思寰宇主義的意義，應該在於對多重複雜身份的包容。也依循此脈絡，發展出「差異的寰宇主義」(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

首先，是人類學者 James Clifford (1997) 觀察到現代生活每個人都是移動和遷移，但又與地方連結的矛盾現象，因而提出「差異的寰宇主義」概念。他挑戰 1920 以來的人類學傳統，將田野研究者定義為遠離家園的「旅行者」(traveler)，而被研究的田野則代表「單一文化」的預設。認為將「旅行者」(traveler) 和「當地人」(native) 切割，把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視為四海為家的旅行者和寰宇主義者，而其他有色人種即使同樣有旅行經驗，卻被歸類為文化本質化的在地人，嚴重地忽略了文化本身混血 (hybrid) 特質。造成寰宇主義 (特權階級、「free-floating」知識份子特徵) 與地方主義 (異文化當地人) 錯誤的二元論。

他認為「旅行者」應該包括奴役、助手、隨從、嚮導和腳夫，並各自有不同的寰宇觀點 (cosmopolitan viewpoint)，因此除了那些自願性流動的精英階級外，其他像是：非自願流動的難民或移工等，也應該有其「差異的寰宇主義」。所以繼 Clifford 的觀點之後，各學者 (Paul Rabinow, Arjun Appadurai, Benita Parry, Arnold Krupat, David Hollinger, Mitchell Cohen, Homi Bhabha, Aihwa Ong, Louisa Schein) 也都開始認為寰宇主義應該延伸到各式各樣的跨國經驗，而非過去那侷限在精英階級與普同單一的概念 (Robbins, 1998)。

接續，由於 Kant 寰宇主義核心，特別提出「悅納異己」的概念。亦即，Kant 寰宇倫理要求每個人在跨越邊界（尤其為了貿易目的的跨界）都有權被「悅納異己」的對待。他認為每個人都同樣擁有地球，所以每個人也都強制「悅納異己」的容納彼此；也就是說，當陌生人到達別人的土地時，如果只是短期的停留，且沒有被當地人拒絕的話，有權力不被當成敵人來對待 (Harvey, 2008)。因此寰宇主義這種強制容納彼此的概念，進而使其在全球化頻繁的流動情境下，常與「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相互交織。

如同 Robertson and White (2007) 所認為的，多元文化概念與全球化帶來的人口遷移範圍廣泛和頻繁情況密切相關。Keith (2005) 也指出，移民人口的流動，產生了多元種族 (multiracial) 的大都市，以及連結地方居民到跨國感知的全球化網絡，使得二十一世紀城市興起了寰宇主義以及多元文化的議題與挑戰。我們可以看到，過去被用來處理移民國家內部族群問題的多元文化論⁵，開始轉而用來為全球化跨界移動勞動者創造新的身份認同位置。如美國，中間階層的專業新移民：矽谷專業的印度工程師、華人、韓國人或日本人這類群體，開始被關注。並以這些新移民帶來的異國食物、民族聚落、民族節慶等去勾勒一種新的社會文化想像 (趙剛，2006)。台灣也是如此，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一方面受到來自世界各處無論是經濟或文化「開放」的壓力，另一方面又面臨更多大陸人士、外籍人士入籍或工作的現實情況，而要求對原本只以「四大族群」為藍圖的多元文化必須有更開放的想像 (張茂桂，2002)。

然而，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在策略上強調移民與少數族裔的特殊性，卻可能不斷重製差異象徵性的分類，像是「標籤化」、「本質化」、「對象化」、「自然化」的問題，構成一種「軟性隔離」，反而限制或僵化社會關係 (張茂桂，2002)。換句話說，多元文化很容易隱含文化本質論的意識形態，強調包容差異、尊重差異的多元文化，反而可能會去創造新的種族、民族社會界線。

或者，多元文化概念也往往錯誤地把階級差異，視為文化差異。這可以經由

⁵趙剛 (2006) 於〈”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一文中指出：90 年代，多元文化論大量出現在北美學術語境和日常生活中，原先是要用以解決美國長期以來黑白對立的問題。強調在一個民族國家的憲政體制下，談公民群體的相互承認與相互包容，並歌頌這樣的文化多樣性。它與原先民族熔爐最大的差異，是對差異性的承認而非差異的同化，挑戰以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為主體的民族熔爐霸權。

而台灣會出現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主要又是參照美國的論述，有其族群政治的考量。因為如果說美國多元文化挑戰了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霸權，民進黨在 90 年代提出的多元文化便是要顛覆過去「大中華」的民族主義，他們創造了「四大族群」(閩、客、原、外省) 的說法，把台灣閩南、客家、原住民及「大陸來台人士」當成個別「族群」，以凸顯台灣的主體性不附屬於中國性 (張茂桂，2002)。張茂桂 (2002) 指出「四大族群」是 1990 初期，一個新創造用來建立國家認同的論述，和美國的論述相仿，主張族群相互承認、包容與尊重，但卻互不相屬；亦即民進黨民族事務部主任所謂的「以多元主義重建台灣主體性」(趙剛，2006)。

觀察美國與台灣的情況發現。其多元文化往往不談階級問題，將社會想像為一個平面空間，而沒有縱深的維度。亦即只看到社會裡水平位置上的文化差異，而不去關注不同文化間其實存在著階級不平等。這產生的問題是，當通俗文化或消費上，差異被美學化，而添加浪漫的想像時，可能忽視文化差異部份是由族群階級面臨的社會弱勢、社會不平等處境所造成。所以在歌頌差異的同時，很可能也是在歌頌不平等（趙剛，2006）；讚揚文化的多樣性，卻再度凸顯階級的分類。如 Ghassan Hage 批評「寰宇—多元文化」（Cosmo-multiculturalism），只是透過中產階級異國食物、貿易和旅遊等消費，而產生世界多元文化想像。是將文化視為平面去欣賞他者，卻缺乏政治和歷史垂直的視野（Martin, 2000）。

另外，多元文化概念也總是沒有被適用到非專業且沒有公民權的跨國移工上。近似於 Sassen (2002, 2007) 對全球化批評，指出移民不論在大尺度全球人力市場或小尺度家務生存迴路，已成為全球化新政治經濟的重要組成，但只有上層專業人士受到重視，大量的底層移工、移民女性則被忽略。在美國，對於「外國人」的想像都只停留在專業技術移民上，而那些遠方來美國打工的勞工群體，則完完全全沒有進入到他們多元文化的思辨裡。而台灣的多元文化，從〈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中可以發現，其寫著「各族群都是台灣的主人」，但這族群清單卻只到「外籍新移民」就結束。也就是以公民權為防火牆，納入那些東南亞或大陸外籍配偶，將他們稱為「外籍新移民」，而將無公民權的外籍移工排拒在想像之外。因此事實上，主流的多元文化論都是民族國家的多元文化，是以民族國家為架構的一種排他性的多元文化（趙剛，2006）。

這些問題的根本，若從 Derrida (2001) 的觀點來看，是因為從 Kant 以來，寰宇主義的核心概念：「悅納異己」的設計，只是「拜訪權」（the right of visitation），而非「居住權」（a right of residence）；而且還被嚴格限制在依附國家主權之下，認為「悅納異己」必須受法律和國家警察的控制才能實踐。也就是只認同短期（商業）流動以及國家主權制度至上的「有條件的悅納異己」，而非真正「無條件的悅

納異己」的理想。所以，最終造成這類寰宇主義發展的方向，還是沒有離開新自由主義邏輯、文化本質論，也沒能跳脫國家公民權的架構。

二、邊界搖擺與新邊界繁生

前述文獻整理，發現作為地理空間跨界想像的寰宇主義，同時存在著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國家公民權或文化本質意識形態。而我認為這正好回應了邊界研究中，Balibar「邊界搖擺」(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概念。

近年來，界線(boundaries)與邊界(borders)研究，已經在許多學術研究上，成為很重要的主題。Lamont 和 Molnár (2002) 指出，界線包括了心理、意識層次上社會分類的核心，以區別物品、人群、實踐、甚至時間與空間；以及在物質或名稱上，社會差異具體化的形式。而與界線孿生的概念—「邊界」，過去社會學者則特別把它視為一道固定在實體地域空間上的界線。認為國家在空間或地方上，肉眼可見或地圖上字面劃定的邊界，會與認同與文化的象徵界線，共同確立民族國家的意義 (Lamont and Molnár, 2002)。

然而當代全球化趨勢，資本、技術、貨物和人員的跨國流動，為邊界研究帶來新的挑戰。研究者開始將邊界視為各種不同背景、混血化(hybridization)、混雜化(creolization)的人所互動的「空隙區」(interstitial zones)，而非實際二分不同國家人民、認同的地方(Gupta & Ferguson 1992, Alvarez 1995, Kearney 1995; Bauböck, 1998; cited from Lamont and Molnár, 2002)。或是討論國家本身和新來訪者之間，邊界的跨越、模糊和位移 (Lamont and Molnár, 2002)。

在這類研究中，Balibar (1998) 進一步指出，我們已經無法避免地生活在一個邊界搖擺的世界。因為國際交通往來型態的改變，過去受國家控制與挪用的自然-文化因素：國際大事、媒體、病毒等，越來越脫離國家的掌控；人們或文化群體的組成也超越了國家和空間的幅度；甚至還可以看到歐盟這類超國家尺度組織的

出現；這些地理空間限制、國家與民族分界削弱的現象，都是邊界正在搖擺的證據。而文獻回顧第一個部份，全球化寰宇主義的世界觀，就是相應此邊界搖擺現象所產生的跨界想像。

Balibar (1998) 解釋邊界搖擺的意思，是指邊界的意義和功能發生改變。也就是傳統上，邊界是實質司法上的定義和地圖上的畫記，它在國家領土的邊緣，標記著國家的盡頭；然而，現在新的政治社會學者認為，用來維繫國家主權運作的邊界，已不再是指領土的外圍的分界線，而可能是區域 (zone) 、國家 (countries) 或城市 (cities)。另外邊界不再能於其中擔保給予一個主權、行政、文化控制和稅賦等等運作；不再能保證最後的領土和人口；也不再以同樣的方式為「事物」和「人們」運作，不再以「同等的」方式，來對待來自世界上不同地方、不同社會地位的人 (Balibar, 1998&2004)。

不過，他認為隨著資訊、人員或事物流動的發生或控制，我們看到的反而是邊界的無所不在 (Balibar, 2004)。亦即，「邊界的搖擺並非意指邊界正在消失，成為『無邊界的世界』。相反地，是新邊界不斷繁生 (multiplied)」 (Balibar, 1998: 220)。Balibar 的觀點說明了邊界搖擺本身是一個矛盾，因為邊界既模糊不清，卻又無處不在，不斷繁生。

他更說明無所不在的邊界除了在真實 (real) 上，還存在象徵 (symbolic) 、想像 (imaginary) 層面上。因為「邊界」的概念，通常隱含著，努力去把我們心中所想、可能情況或分配或劃界的潛規則，概念為界 (Balibar, 1998)。更清楚來說，邊界是在主觀被內化的概念上，個人透過想像來區分自己歸屬於何種群體，或是主觀性的挪用各種邊界將我群歸類於更高或更不同的類別，來表示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place) 的方式 (Balibar, 2004)。他在檢視歐盟問題時，也認為今天誰是「歐洲人」與什麼是「歐洲」的討論，都必須回到「邊界」的議題上；亦即，哪種身份才屬於這個地方，與這個地方是什麼，這種現實與心裡上對地理所做的排除性分類就是「邊界」的運作。而他觀察到，雖然全球化帶來各種邊界搖擺的現象，

人們在心理層面上，仍然會去想像保護自身，產生一個集體認同的傾向，並造成不斷區分「純粹身份」的狂熱。

Balibar 的見地帶領我們觀察到全球化主要的問題是反映在邊界的兩面矛盾上，提醒我們當代全球化台北可能正一面陷入邊界的搖擺，卻又招致新邊界的繁生。並且指出今天邊界衝突的現象，來自於全球化跨國 (transnational) 或跨界 (cross borders) 的活動仍建立在國家的體制上；亦即，大規模的私人實踐和社會關係在文化、經濟領域和公共機構架構被組織，但基礎上卻仍然保留國家 (Balibar, 2004) 。

然而 Balibar 的歸因，卻無法解釋為何即使同一個國家體制中，還是會不斷出現各種邊界；也無法解釋就算是為國家帶來生產利益的人，如：跨國移工，為何還是受到邊界重重管制。因此，我主張要闡明邊界的矛盾困境，我們必須從寰宇主義跨界想像來討論，因為我認為今天造成「新邊界繁生」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去想像地方不再也不應該有邊界的概念，往往本身就正在為地方製造更多的邊界。也就是說，本研究將指出在心理感知層面上，我們認為地理空間、國家與民族已經不再重要的寰宇主義跨界想像，本身就存著在第一部分文獻回顧中所提到的，新自由主義、文化本質論與國族主義意識形態難題，所以會進而造成台北地理空間，無所不在地去區分我群、排除他者的新邊界。

不過，為了說明全球化台北跨界想像如何存在更多畫界的衝突，本研究將藉由分析當代台北城市書寫為取徑；因此，下面也必須先對目前台北城市書寫研究進行瞭解。

三、台北城市書寫研究

「城市書寫」的範圍極其廣泛，除了一般小說、散文類型，也包含照片、紀錄片，甚至官方宣傳文宣 (王志弘，2006) 。一般來說，普遍認為台北城市書寫的發展，是 80 年代後林耀德提出的「都市文學」文類，其與鄉土文學形成典範上的

對比，作品多將城市描寫為墮落、罪惡、混亂的淵藪（楊佳嫻，2004）。王志弘（2006）認為現在使用的「城市書寫」和「都市書寫」並無差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生產、媒體角色與市民參與的因素越顯重要，可是同時官方與非官方的界線也趨於模糊。因為各種市政文宣其實是民間機構的設計和撰文，而宣稱是由市民寫作的公車捷運詩文或台北文學獎作品，也多少介入了官方或評審觀點的篩選機制（王志弘，2005）。因此，我認為「台北城市書寫」包含所有以台北為主題的書寫作品，其不能全然區分為政府、市民、或特定族群的視角，正因為這些作品涵納了各方衡量與動機，作品的出版與敘事的成立才能顯示社會主流的論述，與本研究欲揭發的背後的意識形態。

（一）文學研究脈絡

台北書寫的相關研究，大多主要被放在中文或台灣文學的脈絡下，作為對都市文學主題的討論。這類專書的文獻最早為林耀德（1980）揭示 80 年代都會情境如何引起作家新的書寫觀，並形成新的「都市文學」文類。顏忠賢（1998）繼而在〈不在場 台北一八〇年代以後台灣都市小說的書寫空間策略〉一文中，提出台北都市小說顯示出台北「不在場」的書寫策略，其「不在場」同時包含「他處」與「差異地點」兩種型態。前者如朱天心《古都》寫台北總連結到「他處」的京都，後者則呈現虛構或拼貼的差異地點感。另外，雖然是研究都市詩，陳大為在《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書中，也指出 80 年後描寫都市的詩作與人類科技未來的想像結合，而 90 年代以後，作家觀察到資訊網路時代對地理空間的消弭，台北實際地景開始模糊，開始被描寫為無邊之城。

同樣是從文學研究出發，范銘如在她《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的專書，其中一篇〈本土都市－重讀八〇年代的台北書寫〉中，透過地理和空間理論來分析 80 年代的都市文學。藉由蕭颯和黃凡的小說，更進一步指出，全球化跨界異質的流動，如何使台北的空間表徵發生質變，帶來對都市正面新興的想像，

讓台北過去「邪惡他者」的象徵，轉變為可以安居、嬉戲與挪用的城市，被畫入本土生活的一部分。范銘如的論點確實將過去對都市文學的觀察又推進了一步，可是卻沒有解釋這種轉變的原因，以及它與台北的全球化發展有何關聯。經由這些討論，可以發現不論是跨國資本流動或資訊網路科技帶來的影響，台北「跨界」特質的成型，相對反映在台北書寫的策略與城市圖景的呈現。

相異於前述都市發展如何改變台北書寫的語態，研究者也開始嘗試從都市文學的文本再現，去探究屬於感知的台北都會現實。林以青（1995）在收錄於《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中，《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〇年代的台北為例》一文中，便嘗試從70年代文學經驗去體察都會情境。透過文本她指出其中快速的資本化、都市化帶來心理層面的都市焦慮，而蓬勃的都市發展卻也萌發對文明進步的希望。美軍駐紮的景象還另類的帶來自許為國際城市的想望。而如新公園等都會幽暗異質地點在小說中的描繪，也顯示都會匿名性與包容的可能。

許多碩博論也繼而在這個脈絡下，徵引人文地理學或各種空間論述為理論背景，藉著文本再現來分析80年代後，都市意象和台北圖景。如：李建民的《八〇年代臺灣小說中的都市意象—以台北為例》一文，就借用了林區（Kevin Lynch）「都市意象」的概念，先分析80年代臺灣社會的政經文化、文學創作環境，與都市小說的關係。然後分別從「都市地圖」、「地域」、「通路」、「地標」、「建築」等方面來探討都市小說中所呈現的空間意象。並且透過小說文本的敘述方式、寫作手法，分析都市生活時序所呈現的時間意象。除此之外李還從小說中歸納出「資本社會裡的社群關係」、「都市生活的多樣面貌」、「資訊氾濫的現實失真」三個向度，來說明台北的生活文化意象（李建民，2000）。而高鈺昌的《台北的三副面孔：八〇年代以降文本中的三種台北圖景》則以文化地理學觀點將文學視為地景的一部分，企圖透過台北書寫的小說作品來照見台北圖景。然而他卻將台北分為「都市文明」、「鄉村」與「自然」三種圖景，未能說明這三種分類的意義和關係，落入了台北面貌的分類學。

上述這些討論最大的侷限在於，研究者把台北書寫和都市發展視為相互映照的鏡像。不論是像陳大為或方婉禎那樣把都市發展變遷全然當作台北書寫的驅力；或是像李建民、高鈺昌將台北書寫當作看清台北現實情境的透鏡，他們都忽略了再現並不是與事實分離的鏡子，它不僅反映意義同時也建構意義，它能帶領我們看穿社會對地理想像的意識形態。不過這些研究也啟示了台北都會發展，將帶來新的書寫類型，與城市書寫的策略和語境。並給予藉文本分析從事都市研究初步的示範。

（二）社會科學研究脈絡

除了那些被置於文學脈絡下討論的台北書寫之外，也有其他學科開始嘗試從台北書寫的文本再現，反過來討論背後誰在書寫城市？誰能成為被召喚的市民主體？以及台北各種不均等問題？

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為王志弘〈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台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他首先把城市書寫區分出官方角色，取材 90 年代後文化局出版的文宣刊物與 1995 到 2001 年官方舉辦的公車捷運詩文作品，引介記憶裝置與記憶再現體制的概念，提出城市書寫被紀錄的記憶是誰的記憶、哪些記憶才算數？記憶的召喚和宣揚結合了誰的實質和象徵性利益？裡面隱含怎樣吸納和排除的機制等問題。透過文本分析，王志弘指出 90 年代後的城市書寫透露出官方以記憶再現實行文化治理的目的，其中庶民的記憶被凸顯，並圍繞多元族群的經驗開展，試圖吸納各類市民；而記憶被視覺化符號化，使記憶被轉化為消費商品；還將多元意象連接上全球化、國際化想像。然而他認為官方城市書寫的書寫權和風格品味卻是屬於中產精英人士，相對排除了中下階級、勞工、身障者等經驗。最後提出文化治理已成為文化鬥爭的場域。此外，圖片影像也被作為台北書寫文本分析的材料，王志弘 (2003) 曾作過相關示範。

莊雅涵等 (2004) 甚至透過朱天心《古都》的台北書寫與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位

市長的選舉與市政論述對話，他們指出陳水扁以「市民」為號召，其實是服膺中產價值的群體，並透露本省族群將台北視為威權統治、壓抑本土的淵藪的城市圖像，而馬英九則以台北為故鄉將台北視為中華文化中心的想像。而《古都》中對台北的描述，則代表在政權更替而不斷填充的不同台北想像裡，尋常市民記憶的錯亂無依。由於此研究是從政治學的視野出發，所以相異於王志弘以階級觀討論書寫權的不均，此處則以本省與外省族群的鬥爭來討論台北想像差異的建構。

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的博論，則以台北書寫的文本分析，嘗試批判全球化台北的都市現象。她選用陳映真、黃凡、林耀德和朱天心的小說，一方面探看 70 年代以後，台北東區城市空間與身體節奏的轉變；一方面分析文學中的表徵空間，與人們如何利用表徵空間去挪用、佔據甚至反轉現實空間。林秀姿的研究指出 80 年代後的台北，出現了新興管理階層、新興中收入戶和無技術勞工階級的分化；與以歐美城市為藍圖的美好台北想像和現實中城市排除他者的矛盾。她具批判性的文字將過去台北書寫研究，帶入新的領域，揭露了許多台北全球化過程的問題。然而林秀姿卻只將小說當作較具敏銳觀察力的作家對台北的田野筆記，單純用片面的小說敘事來印證全球化理論，而未能分析小說所代表的文化現象，小說敘事策略背後的動機和影射。

綜觀台北書寫研究，可以歸納初步的結論。首先是政治與經濟等都市發展的脈絡，總是與台北書寫描述的都市景象與書寫策略交織。其次為不論是原來文學研究的體系，或是其他學科的研究脈絡，越來越多學者利用台北書寫從事再現研究，以補足那些在都市計畫報告書與統計資料外，台北的「感知空間」(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與背後城市不均等、權力分配問題。然而其中也包含共同的侷限，一是沒有把台北書寫趨勢視為文化現象，並針對此現象與全球化城市發展作解釋；二是這些研究目前僅發展到 2000 年初，對於二十一世紀以來，台北跨界特質的空間形式，與相應而來畫界的衝突，無法提出通盤的觀察。

第三節、文本取材與問題意識

一方面，承繼本研究最初始的動機，是為了去理解當代全球化趨勢下，在想像與感知上，台北的跨界與畫界問題。亦即全球化台北存在著哪些形式的寰宇主義跨界想像，而其中存在的意識形態又如何衍生感知上台北地理空間的新邊界？

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英國文化研究先驅 Raymond Williams，認為群體社會所共享的價值，集體文化的潛意識和意識型態，可以藉由書寫作品、建築和流行風尚來觀察 (Storey, 2003; Philip Smith, 2008)。提示了書寫作品對於探查群體價值觀的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試圖觀察近十年台北書寫現象與台北書寫文本，並且同時希望能補足目前對台北城市書寫研究在 2000 年以後斷代上的闕漏。不過由於研究篇幅與時間限制，論文中觀察的台北城市書寫主要以小說作品和少數詩作為主，散文、紀錄片、舞台劇、電視劇或電影等，暫且無法全部涵蓋之。

初步觀察 2000 年後台北書寫，我認為有三個主要的書寫主題現象：第一類，是「台北時尚書寫」現象；它延續自 90 年代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和施叔青《微醺彩妝》等多有批判都會物質糜爛的書寫主題，以及 90 年末開始轉變為如《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等藉消費指南來誇耀台北寰宇主義的書寫類型，到 2000 年後以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第二類，是「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的書寫現象，它是戰後「兩岸書寫」的變形，從懷想祖國與血親的主題，轉變為描寫台北與上海兩岸男女的戀愛故事，其主要以《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為代表；第三類則是「移工書寫」現象，我認為它是 70 與 80 年代「勞工文學」的轉型，原本是與農工文學和鄉土文學傳統相關，以南部「台灣勞工」為主題，而在 2000 年後開始由台北市政府與知識份子另外促成以「外籍移工」為主題的書寫，其以《外勞詩文獎》作品和《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小說為代表。

本研究除了觀察這三種台北書寫現象，還將針對其中代表性的小說進行文本分析，包括：《蛋白質女孩》系列、《雙城故事》、《七世姻緣：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外勞詩文獎》作品與《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小說。

具體來說，本論文主要將透過 2000 年後台北書寫現象與文本再現，觀察全球化台北產生的跨界想像，如何呼應於文獻回顧中提到的三種類型的寰宇主義？而學者指出寰宇主義存在的新自由主義、文化本質論與國族主義等意識型態，又如何在全球化的台北下運作？進而導致各種在心理上，不斷去區分台北與台北人的邊界，甚至矛盾？以及理解邊界對怎樣的城市身份想像開放？什麼樣的身份想像又難以跨界？回應 Balibar「邊界搖擺」(the vacillation of borders) 與「新邊界繁生」(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borders) 的概念。而在這個主要的問題意識下，延伸的本論文各章要處理的問題，如下：

1. 首先，我藉由以《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出現與流行，討論其如何讓我們觀察到精英式寰宇主義，與分層式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出現？其中又如何隱藏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且與近年來學者認為書寫中台北正面形象出現，是由於全球化台北跨界流動特質，可以化解過去台灣島內南北／正邪／本土與外來對立邊界的說法對話，探問小說「寰宇主義」式的台北跨界空間想像，如何反而是衍生台北都市內部，台北人與台北空間新的邊界？

2. 接著，我要說明「兩岸書寫」形式如何改變？而當代出現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主題，又如何對應了第一章所觀察到的台北與上海分層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並進一步對《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台灣／中國情人》兩種「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從事文本分析，討論其跨界想像中如何同時蘊含著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衝突與合作？讓台北與上海陷入邊界的矛盾？

3. 最後，相對於寰宇主義過去對他者跨國經驗的忽略，我整理以底層跨國移工為主題的「移工書寫」，討論另一種往往與寰宇主義的核心概念「悅納異己」相結合，主張對多元身份包容的「多元文化」想像。我首先要說明從「勞工文學」

到「移工書寫」的轉變？探問其於 2000 年台灣外勞政策緊縮之際，反而在台北出現，其中可能隱含何種意義？官方以「多元文化」論述推行「移工書寫」，是否代表台北出現了超越公民權更開放的跨界想像？並從《外勞詩文獎》作品和《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小說，分析其如何仍無法擺脫文化本質論、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國家公民權架構？進而衍生台北與跨國移工間重重的邊界？

第四節、研究方法：再現理論與文本分析

1980 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結構、後現代與後殖民等觀點豐富了文化地理研究的視野，促使「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而興起「新文化地理學」（New Cultural Geography），並且使得文化地理躍居人文地理研究的核心（Norton, 2006）。地景的意義被重構，過去地景被認為是地表上的實體景觀，但新文化地理學認為既然我們身處於圖景式再現與象徵環境中，地景就必須透過各種中介和介面來研究，除了以往地面上石頭、水文、農作之外，畫作、書寫、文件、影片圖像也同樣構築了文化地景（Daniels and Cosgrove, 1987）。亦即，新文化地理學特別重視「再現」（representation）的研究，也就是那些製造圍繞在我們生活周遭意義的語言和圖像（Sturken, Marita and Cartwright, 2001），它涉及意義的再製，所以它並非事實的鏡像，其不僅反映意義同時也建構意義。再現理論要我們注意的是，圖像和語言並不是一個讓我們看到「真實」世界的透鏡，而是一種訊息，它揭露正常事物欺騙性的外衣，幫助我們看清那些由意識形態的迷思所隱藏的、歪曲的、片面的機制（Mitchell, 1986）。

鑑於對地景意義新的理解與再現研究的發展，文本分析（analysis of text）成為人文地理學時興的方法。過去強調田野實察、訪談或是計量分析的地理學，開始承認唯有透過文本分析才能幫助地理學家去探查想像（imagination）層次上的地理，也就是列非伏爾所說的「感知空間」（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以文本分

析取徑去研究文學書寫地景，更是近二十年來地理學家爭相探究的領域。其中文學作品的主觀性並不會造成研究的限制，相對的，它的主觀性正好傳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誰是書寫者？寫了些什麼？為什麼這樣寫？都能幫助研究者去思考、挖掘一地的「地方感」或「場所精神」 (genius loci) (Crang 1998)。換句話說「小說的真相超越了單純真實。小說的真實相較於日常生活的真實，可能超越之，或者包含更多真相」 (Pocock, 1981:11)。

本研究除了部份詩文作品外，其餘全為小說作品，因此，本研究的文本分析法，主要為小說分析。我將選用的小說《蛋白質女孩》系列、《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拆解出時序結構、人物、情節、場景、對話、敘事觀點與象徵／表現手法等。然後進行詮釋工作，挖掘作者的有意識的動機、和無意識下的意識型態。

第五節、章節安排

第一章我說明本論文研究的動機，來自於想要去理解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存在天涯若比鄰的幻覺，而另一方面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卻同時存在著異化的狀態與心理上的距離 (Appadurai, 1990)；而我進一步，想透過台北城市書寫現象與文本，指出全球化的情境下，正在產生台北地理空間的跨界想像—寰宇主義的空間觀，而其中卻存在各種意識形態，反而導致「新邊界繁生」。因此我的文獻回顧分成三部份，首先我整理學者們對於三種形式寰宇主義的討論，及其中隱藏的意識形態。接著，我主要說明 Balibar 對於全球化邊界衝突的觀察，並指出寰宇主義跨界想像如何幫助理解當代邊界問題的矛盾。最後，我整理目前台北城市書寫的相關研究。也具體的說明我的研究方法，以及下面幾章要處理的問題。

第二章我首先觀察 2000 年後以出現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現象，是一種精英寰宇主義想像，再由學者們對《蛋白質女孩》的

台北故事如何暢銷於對岸上海的討論，觀察到台北上海城際區域連結下，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的出現；並且說明台北精英式寰宇主義，是台北上海分層寰宇想像的基礎。另一方面，我也將與學者認為書寫中台北正面形象出現，代表了全球化台北正在消弭各種畫界的說法對話，指出當代台北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想像，隱藏著新自由主義邏輯，而衍生了台北空間與台北人身分新的邊界。

第三章我整理「兩岸書寫」的脈絡，發現故事類型從原先「反共懷鄉」的主題，轉變為「台北上海愛情故事」，代表伴隨現實台北與上海城市區域連結的新空間尺度，出現了在第二章提到的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而我進一步對《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台灣／中國情人》兩種「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從事文本分析，觀察到在此跨界想像中，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國族主義如何同時幫助了分層式寰宇想像；另方面，國族主義卻又如何與文化本質論結合，使其與分層寰宇主義產生衝突。最終衍生了「台北／上海」為「落後／進步」與「台北／上海」等於「進步／落後」的邊界矛盾。

第四章我先整理 2000 年後，台北「移工書寫」的形成脈絡；指出原本發源於南部農工文學與鄉土文學典範的「勞工文學」，轉變為以台北為中心的「移工書寫」。說明 2000 年初臺灣外勞政策緊縮的環境之下，台北市政府以多元文化論述推行「移工書寫」，可能顯示台北孕育了超越「公民權」限制，更開放包容的跨界想像。然而，進一步分析《外勞詩文獎》作品與第一部移工小說《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發現其中無法擺脫文化本質論、新自由主義，也沒有脫離國家公民權的認定，仍將移工劃分在台北的邊界之外。

第五章，我總結三種類型的台北書寫，讓我們深入理解全球化情境下，寰宇主義、多元文化和城際區域連結的概念，如何促成台北的跨界想像，卻又衍生更多畫界的問題。並說明本論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可供研究者後續討論的現象與議題。

第二章 台北時尚書寫

本章我將藉由以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的成型，觀察到全球化台北出現了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想像；另一方面，也從學者們對《蛋白質女孩》中台北故事能暢銷於上海的討論，觀察到精英式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可能成為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想像的基礎。然而，本章後半段，我與學者認為書寫中台北正面形象出現，代表了全球化台北正在消弭各種畫界的說法對話，指出當代台北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想像，隱藏著新自由主義邏輯，進而衍生了台北空間與台北人身分新的邊界。

第一節、「台北時尚書寫」與精英式寰宇主義

台北都市書寫的主題，到了 1990 年代，以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和施叔青《微醺彩妝》為代表，形成新的「台北時尚書寫」現象（蔣興立，2010）。這類書寫以各種國際時尚消費商品來記敘都會的特質：「書中 [指《世紀末的華麗》] 出現大量的時尚書寫與名牌服飾資訊，對國際知名時尚設計師川久保玲、加利亞諾、拉克華、亞曼尼、三宅一生等人的服飾美學如數家珍，並以此時尚書寫串連小說敘事的推展」（張小虹，2006：177） [括號字為筆者所加]。施叔青的《微醺彩妝》也同樣可見各種跨國時尚商品充斥其中，並且部份與《世紀末的華麗》中提到的重疊，包括：「香奈兒、維多利亞的秘密、山本耀司、迪奧、三宅一生；香水彩妝包括卡文·卡萊 (Calvin Klein) 的古龍水、鴉片 (Opium)、毒藥 (Poison)、頹廢 (Decadence)、迷情 (Obsession)、香奈兒五號、蘭寇的『火紅』、迪奧的『蠱』、三宅一生的『生之水』、KENZO『風之戀』香水、雅詩蘭黛的『微醺彩妝』」（蔣興立，2010：9）。

不論是《世紀末的華麗》中提到的「台北米蘭巴黎倫敦東京紐約結成的城市

邦聯」（朱天文，1992：189），或是《微醺彩妝》裡的「台北人雖身在台灣，卻想方變法的想把心帶離台灣」（施淑青，2002：90），我們都可以發現1990年代後，透過國際流行時尚的符號拼貼，出現台北與世界同步連結的跨界想像。張小虹（2006）認為這種跨越原有地理空間的台北想像，就是「Cosmopolitan／寰宇主義⁶」：「小說文本中米亞所代表的“Cosmopolitan”可以一語雙關地同時指向超越民族國家利益與界限、『國籍不明』的『寰宇主義』與全球流通發行的流行時尚雜誌《柯夢波丹》」（178）。

然而1990年代的「台北時尚書寫」大致是站在批判台北寰宇主義想像的立場。劉亮雅（1995）便指出朱天文在《世紀末的華麗》中撻伐後現代台灣頹廢享樂、欠缺深度感與歷史意識；而施叔青則透過《微醺彩妝》嘲弄主角缺乏在地關聯的寰宇主義（劉亮雅，2004）。直到90年代末，「台北時尚書寫」中的寰宇主義式的台北都會，開始被視為台北值得誇耀的在地特色。其中《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便具有開創性的意義⁷，書中幾個篇章，如：「在地城市的異國美食索引」、「不只買家具，更要買氣氛」、「台北也有 BLUE NOTE」、「台北所在，外國氣氛」等，將台北能享用到異國美食、文化消費與品味作為台北與全球連結的象徵。2000年後，各種旅行文學書寫台北的書籍，包括：《製造風景》、《下一站，叫幸福！——ICE 與 Elma 的紐約台北城市幸福加油站》等，都是承襲其再現台北的方式。

除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等類旅遊指南或旅行文學的文類外，2000年後小說形式的「台北時尚書寫」便是以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為代表。其獨特的台北書寫，使這本小說一躍成為2000年初最暢銷的書籍之一。《蛋白質女孩》99年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時，即受到廣大讀者迴響；隔年成冊出版，就榮登金石堂排行榜前五名，而且連三年進入金石堂年度暢銷榜，到現在再版近20次，

⁶張小虹原文中將Cosmopolitan譯作「世界主義」，本論文為求用詞統一，寫作「寰宇主義」。兩個名詞的英文相同。

⁷王志弘（2005）在其〈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台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一文中，提到關於一書時，認為：「這本書[《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開啟了深具代表性的新城市再現方式」（7）。

成為新一代暢銷作家。「許多廠商，也借用『蛋白質女孩』一詞，行銷手機服務到西洋歌手等各類產品。……王文華於書展「時報出版攤位」舉行握手簽名會，近二百名讀者人人手拿著《蛋白質女孩》、《61×57》等著簽名，甚至有人早上九點多即開始排隊，或是特別帶來王文華專欄剪報簿、當場給王文華出題寫押韻詞句，由此可見，王文華的文字魅力愈來愈盛、王文華的讀者也有愈來愈多元的趨勢」⁸挾帶小說的魅力，王文華與陶晶瑩搭擋合開談話性節目—《桃色蛋白質》收視也屢創佳績。2002年登陸銷售後，更是在中國刮起一股「王文華現象」。

《蛋白質女孩》一二集，台北人不再只是像《世紀末的華麗》和《微醺彩妝》中，透過消費與世界為鄰，台北人更實際以世界為家。「第一次約會很規矩，送你回家的車上還有司機。第二次帶你到香港血拼，當天來回絕不佔你便宜。第三次的飯店是五星級，…」(11)、「想她在去紐約的飛機上打電話給你，……，她告訴你此刻正飛過你們去過的斐濟」(237)⁹。他們可以當天往返香港只為了一次約會，並且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渡假：「去吃第凡內早餐，去格林威治村看楚浮的『夏日戀情』」(162)¹⁰。如同黃宗儀(2007)指出小說讓讀者能夠「想像自己以世界為家(at home in the world)」，將此時此地與小說中不斷出現的紐約接軌」(24)。

透過1990年代開始成型的「台北時尚書寫」我們觀察到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出現。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這種台北空間跨界想像，結合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停留在自由貿易下商品消費無國界、都會國際金融大樓地景，以及跨國專業經理階級生活經驗的描述上；如同文獻回顧中Harvey等人的批評，只是一種精英式的寰宇主義。

第二節、暢銷上海的《蛋白質女孩》與分層式寰宇主義

⁸節錄自「王文華流行館」<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promote/cn.htm> [2010/1/2]。

⁹前兩句引文，節錄自王文華(2000)《蛋白質女孩》，台北：時報文化。

¹⁰而此句引文則節錄自王文華(2002)《蛋白質女孩2》，台北：時報文化。

《蛋白質女孩》除了讓我們看到全球化下，跨越空間的各種流動連結，「精英式寰宇主義」的台北想像應運而生。同時小說意外在上海走紅，也顯示全球化東亞都會區域經濟結構的連結重組，產生了台北與上海雙城連結「分層式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

根據香港亞洲週刊統計 2002 年《蛋白質女孩》簡體版風靡中國「王文華《蛋白質女孩》中文簡體版榮登上海地區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超前於余秋雨的《行者無疆》（第五名）、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第十名），甚至，打敗全球施法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第四名）；及至二月底前，《蛋白質女孩》中文簡體版已於大陸當地創下 15 萬本的高銷售量」¹¹，並且讓出版商大為驚訝。

過去有關《蛋白質女孩》討論，也都主要圍繞在其何以能順利行銷於對岸的問題上。由各種用台北地景、明星名字、政黨傾向等台灣社會現象堆砌而成的情節和韻腳，何以能夠成功的轉譯給中國的讀者？以台北都會為故事背景的情愛小說，為何能夠暢銷於對岸。這是連王文華本人都沒有預料到的「『這本書乍看之下怎麼可能賣到其他國家？』王文華自問，書中充滿了台北獨特的文化符號，有在誠品約會的高級虛偽，Room18 Pub 裡的裝模作樣，上海或東京的讀者來看，『趣味馬上減了 50%』」¹²。

王德威（2002）曾提出一套見解，指出王文華擅長使用押韻、排比、對仗，這些雙雙對對的修辭技巧，並利用中國傳統文學裡才子佳人的主題說故事，讓對岸讀者能接受他的小說。除此之外，若細讀小說將不難發現更多兩岸都能同時分享的符號，像是：「她的身材像辛蒂克勞馥，你永遠不會是勞伯瑞福。她的心像杭州西湖，你的心是一棟鬼屋」（211）；「你難道不知道，五四健將羅家倫其貌不揚，但就憑一手美麗的情書，娶到了北大的公主」（211）這幾句，又如：「我可不

¹¹ 節錄自「王文華流行館」<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promote/cn.htm> [2010/1/2]。

¹² 節錄自楊岑斐（2003）幾米・王文華，如何暢銷到中國？2 個台灣文化品牌的打造故事，數位時代雙週刊 58 期，<http://www.books.com.tw/magazine/item/bnext/index0516.htm> [2009/0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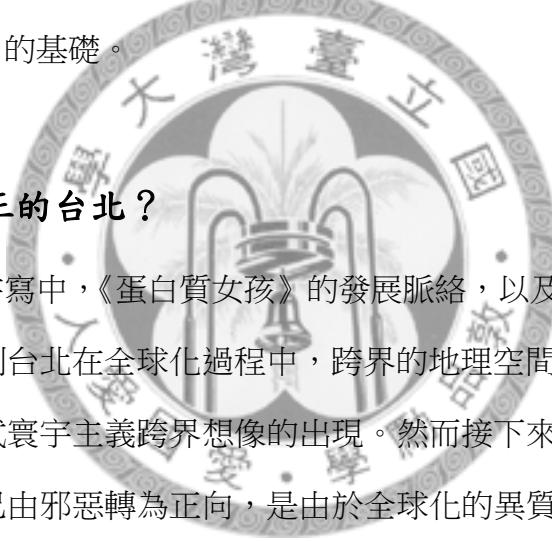
可以引用現在最流行的徐志摩：『我抬頭望，藍天裡有你，我開口唱，悠揚裡有你，我要遺忘……』」（211），以及其中一段：「大陸作家王力雄在九八年出了一本《天葬》，書中說他在西藏懷念內地的情人，發了一通電報說『昨夜我作了一場春夢，你媽上街買菜，我啃了你一口……那你就學女詞人朱淑貞，他在情書上畫了許多圓圈，大圈、小圈、單圈、雙圈、全圈、半圈，然後寫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全圈是團圓，半圈是別離……』」（213）。

也許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記憶，是《蛋白質女孩》風靡中國的原因之一。不過針對這個問題還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李政亮（2005）用兩岸「文化時間差」來解釋，認為王文華走紅並非特例：「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流行文化的引進大陸，一直存在文化時間差，如同觀察者所說的，『大陸的小資們一直在以這樣和那樣的理由對台灣文化界進行著「起死回生」的重新打撈，最典型的例子包括：朱天文、朱天心姊妹和她們的「三一學社」，白先勇、夏濟安、王文興和他們的《現代文學》作家群，賴聲川和他曾為台灣80年代「小劇場運動」奠定輝煌的表演工作坊，林懷民和他的雲門舞集……』」（9）。李政亮指出「城市文本中眾多具體的城市地景不但未造成閱讀障礙，反而讓閱聽人建立起城市生活參照系」（11-12）。原因在於中國改革開放後，都市意義翻轉造就了小資階級的認同出現，台北也因此成為中國都市參照的對象，歐佩佩（2005）也將小說熱賣的原因歸結於「一方面是因為填補了中國書市目前的空缺，另一方面則滿足了小資對城市生活的想像和界定」（48）。李奭學（2002）則認為書中的台北雖然對中國人來說有些陌生，但卻反而能滿足某種對台北紙醉金迷的「他界的想像」，例如那些常人較少涉足的某些次文化：搖頭丸和性派對等，「想像二十一世紀的台北摩登」¹³。

黃宗儀（2007）則拉高到全球都會區域的層次來理解對岸的《蛋白質女孩》現象。指出90年代上海如火如荼渴望晉升全球城市之際，開始以「寰宇主義」的開放好客論述打造城市自身，並藉此開創「新上海人」的新身份想像，賦予那些

因全球化資本流動而匯集上海的專業人士一個新階級位置。而《蛋白質女孩》走紅於上海，正好是因為王文華成功地翻譯西方因全球都會連結而衍生的理想都會精英文化，小說主角們「以世界為家」的寰宇主義式生活，迎合了全球化時代的上海人對「彈性身份」¹⁴的想像。亦即，黃宗儀的說法提醒了我們上一節所說在台北出現的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結合，描述全球跨國資本與跨國精英流動經驗的「精英式寰宇主義」，繼而成為上海打造自身全球化想像的中介¹⁵。

透過學者們的論點，可以發現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上海讀者能輕易的接受《蛋白質女孩》的台北故事，表示兩岸共同的語言結構、文學素養與歷史傳統等國族意識的元素，以及台北精英式寰宇主義的想像，可以轉化為跨越台北與上海邊界「分層式寰宇主義」的基礎。



第三節、改邪歸正的台北？

藉由都會時尚書寫中，《蛋白質女孩》的發展脈絡，以及小說暢銷於對岸的現象，我們可以觀察到台北在全球化過程中，跨界的地理空間型態下，伴隨著精英式寰宇主義和分層式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出現。然而接下來，我首先要與近來學者觀察到台北圖像已由邪惡轉為正向，是由於全球化的異質流動使台北想像能更包容協商的論點對話，我將指出全球化台北的寰宇主義想像，卻衍生了台北人身份與台北都會空間內部新的邊界。

一、正面新興的台北圖像

近來學者發現文學中台北的負面形象已轉趨正向。廖咸浩（2004）認為台北在

¹³詳見李奭學（2002）台北摩登一評王文華著《蛋白質女孩》，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2/08/19。

¹⁴黃宗儀（2007）指出：「今天資本主義的彈性積累跨越多重尺度，既改變了生產、勞動與市場，也產生新的國際分工形式。我認為由此應運而生的身份想像可稱之為『彈性身份』，用來指涉『專業經理階級』（th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為主的跨國主體」（13）。

¹⁵黃宗儀（2007）認為：「由於上海與台北都是華人城市，預設的相似性使上海讀者可透過理解『二十一世紀的台北摩登』（借用李奭學語）來想像上海的曼哈頓化，想像新上海人未來的生活方式。當台北成為上海與其它全球城市（紐約、倫敦）接軌的界面時，文化學習的過程就更趨容易了」（26）。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分別由於不同原因，而相繼承擔了負面的象徵意義。他指出，在 70 年代鄉土文學的浪潮下，台北接受西方的現代性，而被視為西方與資本主義在台灣的代理人，成為腐敗墮落的符號；到了 8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台灣意識」的勃興，台北反而成為「中國」及「無法現代化」的餘毒。兩種不同的論述，同樣都讓台北成為邪惡的他者。張誦聖 (2005) 從文學場域變遷的觀點，繼而發現過去台北的負面形象，事實上隨時間演進有所變化，他說明早年是由於現代派和鄉土派之間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疑慮或譴責，導致台北以負面形象呈現，然而 80 年代末，副刊以及與副刊掛勾的出版社，孕育了相對保守的中產性格作家，對台北都會的描述趨於曖昧。而范銘如 (2008) 更明確的指出儘管 80 年代的台北書寫有部份承襲上個世代對都會生活的批評，但另一種較正面的新興都會形象正在成型。范銘如解釋其原因與台北的全球化有關：「80 年代台灣與國際經貿的往來越來越密切頻繁，各大國際銀行直接在台北設置辦事處，大眾消費市場裡到處可見舶來品。……80 年代文化的流動性、異質性、對外來文化的快速引進與消化，固然造成知識份子的焦慮與抗拒，卻也讓他們對於台北的空間與文化該如何自適發展、又該如何被表述，產生興趣」(182)。范銘如透過黃凡和蕭颯的小說，進而指出台北的全球化反而帶來地方的融合參與，全球在地化的願景使城市可以不必然是與南部本土對立的他者。亦即，全球化讓台北能夠化解過去南北／正邪／本土與外來各種對立，出現一個正向包容的城市想像。

二、再製階級符號的對立

觀察 2000 年後「台北時尚書寫」，的確也能發現全球化台北正面的都會形象。然而接續藉由《蛋白質女孩》從事文本分析，我卻發現其「精英式寰宇主義」的台北全球化想像，並非更具包容與協商性，反而是再製了上層白領經理人士 (合理的都會使用者)，與底層勞工階級 (欲排除的都市邊緣人士) 的階級對立畫界。

因為首先，可以看到小說反覆強調台北存在兩種決然不同的群體。一方面可

能有省籍和政黨不同的傾向：「她討厭計程車司機開車後鎖門、後照鏡下掛佛像、聽台語節目、問她喜歡陳水扁或宋楚瑜」(18)。一種是對政治熱衷，喜歡問別人的政治傾向，「聽台語節目」比較偏向本土意識型態的族群。另一種是政治偏藍，「喜歡余光中的鄉愁四韻」的外省群體：「2000 年選總統，都投給了宋楚瑜」(162)；「他喜歡余光中的鄉愁四韻，妳的鄉愁是兩天沒去台北東區。他穿的夾克樣式像宋楚瑜，妳的衣服清一色是 agnes b」(40)。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兩種群體有社會階級的落差。因為雖然小說用這兩種群體語言習慣的差異，來形容兩者之間難以跨越的界線。「如果你台灣國語，兩句之後他就開始眼睛游移，對你說 Excuse me」(13)。但我們可以發現王文華文中與「台灣國語」對比的語言不是「標準的國語」或「外省腔的國語」，而是英文的「Excuse me」。也就是指涉台北有一些連國語都講不標準的低階級族群，更有一群文化資本、知識教育水平較高，而能精通外語的上層階級。但兩種文化彼此無法對話：「她說法文你講閩南語，她聽德布西你看布袋戲」(32)、「喜歡看 Discovery，沒聽過霹靂布袋戲」(162)。兩句對話，是作者借用張寶的語氣，講述第一人稱的主角念台大、出國留學、生活在台北東區，家裏環境優渥因而不懂外面的世界。對他來說，傳統戲曲文化（布袋戲）成為他優越的生活環境外，無法理解的世界。

接續還會發現小說不只呈現兩階級文化無法溝通，更區別了兩種階級文化的優劣：「『我為什麼不能跟她在一起。』『為什麼？』『因為她講台灣國語』」(56)、「『台灣國語也是一種浪漫殺手』」(56)。其中主角和他朋友張寶解釋自己無法接受某個女生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國語」變成扼殺愛情的致命傷，小說後段主角還要「勉為其難」的答應女生的邀約，用以證明愛情的偉大。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底層勞工階級的慣習 (habitus)，被與「骯髒不潔」、「相貌不揚」的形象作聯想：「『他身高 165，耳朵大得像豬。皮膚黑得像香菇，滿臉落腮鬍。眼睛小的像老鼠，眼鏡片上有油污。每次都穿相同的衣服，身上的

味道像『比安住』。嘴巴很溼潤，因為一直嚼檳榔都不吐』」(72)。這段形容出現在《蛋白質女孩》第二集中，描述女主角與「恐龍」網友見面的遭遇，作者用趣味性的文字排比，將身高不高、相貌不佳這些外在的缺點，以及有髒污、臭味這代表衛生習慣不良的特徵，與勞工階級必須長期暴露在日曬下而較深的膚色，以及為了付出超支勞力而必須嚼檳榔提神的形象類比聯想。

接續，第二集中另一段對話，還可以察覺到階級文化的落差，還變成道德有無缺陷的判準：「這可能是一個五十歲、前科累累的強暴犯，藉用這個名字誘拐小女生，等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你跟他談侯麥，他以為你要請他吃喉糖。你跟他談楚浮，他問你是不是迷了路」(43)。文中沒看過法國導演侯麥或楚浮的電影，被用來當作奸犯科、品行不端者的特徵。因此，總結而論，《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雖然應證了學者們討論台北的全球化帶來都會的正面形象，但小說的敘事卻反而讓我們看到都市階級符號的對立。其中階級的文化不只被以優劣分類，底層勞工階級甚至還被借用為「相貌不正」、「身體不潔」、「品行不佳」，這些污名的象徵。

三、被定義的台北

上一個段落，我指出雖然《蛋白質女孩》也以台北全球化的異質與跨界流動想像，作為台北正面新興都會的圖像，然而正面的台北圖像，卻是在區隔都會上層與底層階級的文化類別。接下來，我還將說明上層階級被進一步定義為合理的城市使用者，而「都會華麗區」也被定義為唯一的都會空間形式，衍生了都會內部使用者身份與空間想像的邊界。

(一) 誰是台北人

「台北的男人分成三種：蒼蠅、鱉魚、狼……台北的女人分為三種：冰箱、燙斗、洗衣機」(8)。這是小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開頭，藉由兩個單身男子的 man's talk，幽默的將台北的男女分類，這是承襲西方都市觀察者，利用面相學試圖洞悉

大城市中陌生人的傳統。王文華在故事的開場白，教導讀者如何分辨「台北人」的種類，不僅僅是要傳授一套在都市求愛叢林中生存的準則，更為都市使用者下了定義，並且在其中加以分類，甚至排序人的優劣：

台北的男人依道行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像我們這樣的蒼蠅。蒼蠅戴眼鏡、165 到 170.....。蒼蠅基本上沒什麼野心，只是在找媽媽的替代品。對女人我們只敢繞圈飛行，發出嗡嗡的噪音不咬人不吸血，卻怎麼樣也揮之不去。早上七點打電話告訴你今天會下雨，下午三點問你要不要吃點心，六點說我知道東區開了一家新餐廳，十一點說衛視在演『鐵達尼』（8）（粗體為筆者所加）。

小說裡「蒼蠅」被認為是求愛過程裡道行最低等的一級，然而這些人不只是戀愛招數的低階份子，更是小說中台北人經濟地位的最末等級：「小資產階級」。雖然財貨不多卻有一定的教育程度，他們看電影、上餐廳，認同並模仿「宰制階級」的生活品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這些經濟資本最少的男性，要被描述成戴著眼鏡，身材矮小，甚至還有點戀母情節的懦弱樣。

我認為在王文華幽默的筆法下，其實隱藏資本主義式的判斷。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台北男人的長相、性格和行為，全然與其本身財力程度結合。其中較高等級的「鯊魚」在情場的高明技巧，來自於在職場中的歷練，他們代表都市私人企業的主管階級，因為熟習於用金錢利益衡量事物的商業手段，並累積了相對財富，連說話都能比沒錢的「蒼蠅」流利又好聽：

他們曾翻雲覆雨，知道性是什麼東西。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晰，最後就是要吃掉你。他們在派對中主動問你的姓名，總是能找到藉口讚美你。...和蒼蠅相比，鯊魚有膽量和小聰明。...鯊魚當然不只是詩情畫意，他們也懂適時要買 Gucci。他投下鉅額資金，最後回收當然要連本帶利（9）。

而最上等的台北男人是有錢有閒，開跑車說英語的「狼」。他們是典型企業家第二代，擁有最多經濟資本的「宰制階級」。：

道行最高的是狼。他們有英文名字、戴墨鏡，打扮的像電影明星。他們有車（有兩個座位但絕對不是 smart）、有名（爸爸經常上財訊）、有時間（花半小時吹頭髮四點就去健身房）知道台北好吃好玩的地方怎麼去。最重要的是他們彬彬有禮、葷腥不忌、攻守有據、處變不驚。……他們約會的對象不限台北，而是全球華人社區。約會時從不西裝筆挺，故意 casual 來顯示自信。他們知道西裝會產生距離，而卡其褲可以鬆懈女生的警覺性（10）。

歸納王文華定義的三種台北男人，可以看到最上層的精英，不但長得像電影明星，連談吐舉止都彬彬有禮，彷彿就是女性心目中的「好男人」形象；中間汲汲營營於事業的白領階級們，雖然把妹技巧高超，骨子裡卻只是錙銖必較的「壞男人」；而剛進入職場的一般男性，不只薪水有限不會追女生，連長相都被形容得很抱歉，成了名副其實的「蠢男人」。在王文華看似詳盡的分類中，台北男人似乎全都在金融業工作，若要進一步區分這些人的外貌與內在，全然取決於其社會地位的高低。

同樣地，台北女人也以經濟、文化資本多寡的邏輯，被區分類別和等級。最上層最難追到手的是「冰箱」：

他們考上北一女，台大畢業後留學紐約或洛杉磯。他們聽歌劇、看達利、吃 yogurt、講話時習慣把聲音放低。在滿街檳榔的台灣，他們用具有法國風味的名字，Yvonne、Josephine，每個名字聽起來都像一種化妝品。他們跟人約在只有英文名字的餐廳，堅持喝某種牌子的礦泉水，有沒有氣泡，有時會要了他們的老命。他們穿黑色、逛誠品、上健身房、看 Discovery。……和他們講話你必需是誰的兒子，或必須先認識誰的兒子。如果沒有家世，你必須任職於外商公司……（13）。

「冰箱」們的學歷高，職業佳，擁有最多財富基礎，卻只以身份高低和職業貴賤來判斷是否與人來往，在作者的筆下，他們被定義為難搞又勢利的女性。這與台北男人中擁有最多財富的「狼」，帥氣且風度翩翩的描述，形成十分有趣的對比。

次等的是「燙斗」，她們忽冷忽熱的令男人難以捉摸。而最平凡台北女性是「洗衣機」，他們被作者認為是「男人最想碰到的」，「你一身世故污穢，他大方的接受你。你不需用力，她就讓你的世界轉個不停」(14)。

和男人一樣，台北女人的外表也與其金錢多寡和職業高低有關，最上層的「冰箱」不但經濟資本最多，連長相都有「令人跌倒的美麗」。然而心地好壞卻恰好和財富成反比，白領精英的「冰箱」是以貌取人的「壞女人」，平庸無奇的「洗衣機」卻是善良真心的「好女人」。因此我們發現，小說除了以資本主義觀點辨認台北人之外，還隱含著性別偏見。有錢高學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有一定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女人卻是「壞女人」，傳達台北男人「為富『是』仁」和台北女性「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價值。

不過無論如何，全文描寫的台北男女全都成了「專業經理階級」(th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 的形象。因為雖然作者將都市男女初步都分成三類，並隨著劇情發展，又分別出現特殊的男女類型：凡事高要求的「高維修女子」、善良又美麗的「蛋白質女孩」、又帥又多金的「雷射頭」……。而這種幾近分類狂的寫作手法，製造了一股強大的壓迫感，讓讀者沒有心力去思考每個類別的正確性，只要有幾項特徵符合讀者原先的認知，我們就很容易被說服，並且認為作者已經將台北的眾生相應有盡有的歸納於其中。然而儘管文本裡的男女分類再詳細，也都只是敘述那些求學過程順利，最好留過學，然後在金融機構、外商公司工作的白領階級。女性例如：「高維修女子」只坐捷運、吃西餐、上健身房、看 CNBC；「蛋白質女孩」要帶三明治上班、假日去爬山、負責、有禮、浪漫、純情；男生像是「雷射頭」讀過哈佛 MBA、擔任銀行經理、年薪千萬；或是兩個男主角這種大專畢業、混過美國野雞大學、薪水不高但工作穩定有保障的這群人。

界定了「台北人」為專業經理階級的身份後，還點出哪些人與這些「台北人」不同類：「『所以這個『梁詠琪』……』佳佳沉思，『可能是砂石車司機！』」(43)。這是《蛋白質女孩》第二集的內容，佳佳想認識網友，而寶琳娜則提醒她光看網

路暱稱不可靠，可能會找到和她想像差距很大的對象。因此佳佳脫口而出，猜想名為「梁詠琪」的網友，可能是「砂石車司機」，也就意指非白領階級的司機，和她不是匹配的對象。這樣類似的分類情節，也出現在第一集的故事裡：

『你乾脆一次告訴我，哪些女人和我們不屬於同一聯盟。』

『在以英文名字互稱的公司上班的女人、公司有「助理副總裁」這種頭銜的女人、辦公室在二十樓以上的女人、用「project」這個字眼聯描述手邊工作的女人、迷戀財務槓桿和其他大型槓桿的女人、懂得「台股期指」和「殖利率」到底是什麼東西的女人、義大利字知道得比英文字多的女人、頭髮挑染成紅棕色的一種女人、去香港的頻率超過去萬華的女人、因為認真而美麗的女人、e-PHONE 廣告中的女人、日常對話會用到「宰制」、「父權」，或「後殖民論述」等字眼的女人、穿黑色內衣的女人、帶紫色墨鏡的女人、家裏有兩面鏡子以上的女人、有行動電話卻從不開機的女人、去過瑞士的女人、會咬著一根紅玫瑰跳探戈的女人、吹長笛或彈鋼琴的女人、還有任何知道 S&M 不代表 Sales & Marketing 的女人』』

『照你這樣講，這世上和我們同一聯盟的女人只剩下我阿嬤』

『或許在加上我們公司倒垃圾的歐巴桑』 (51) (粗體為筆者所加)。

首先，這段對話的開始是張寶在奉勸男主角哪些女人很難追，而男主角問他「哪些女人和我們不屬於同一聯盟。」於是張寶開始一一點出各種女人的態樣，但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一長串的人物描述，事實上都是小說一開始所定義的「台北女人」。所以對話的最後兩句，男主角沮喪的表示，如果照張寶這樣形容的話，全台北恐怕沒有一個女生可以追到手，除了「我阿嬤」和「公司倒垃圾的歐巴桑」之外。這是一個趣味倒反寫法，意思是要彰顯全台北的女人都很難追，除了「公司倒垃圾的歐巴桑」之外，也就表示了大樓清潔女工並不符合「台北女人」的定義，並不是寰宇主義的台北想像裡，合理的城市使用者。

小說中將清潔女工排除在全球城市想像外的描述，呼應了薩森 (2002) 的觀

察，今天全球城市管理與協調的經濟活動，產生了許多高薪資的專業職務需求，但也因此產生更多低薪的服務工作需要，然而在主流的全球化論述中，我們都只在意那些全球資本的上層迴路 (the upper circuit of global capital) ，和資本的快速流動，而忽略底層的與那些滯留原地動彈不得的人。

王文華筆下的台北人，是依照資本與文化品味定義的。台北儼然是以宰制階級為主，而小資產階級汲汲營營的都市，底層勞動的身影在跨國企業和商辦大樓的光輝下被擦拭乾淨。低階勞工甚至只能以他者的身份出現，用以凸顯「真正的」台北人。觀看文本，我們還會發現，女性在這個城市圖像中遭受的另一層壓迫，她們的社經地位越高，雖然看似與男性的白領精英相同，都是都市裡的合法使用者；然而實際上卻是目中無人，道德備受質疑的「壞女人」。然而倘若她們是文本中，社經地位較低的「倒垃圾的歐巴桑」，或是根本不具任何生產能力的「我阿嬤」，其台北人的身份根本上就被否定。

(二) 哪裡是台北？

接著，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中的台北是紐約時尚，與華爾街金融式的。主角們以英文名字相互稱呼：「Alex」、「Michael」、「Tracy」、「Richard」、「Yvonne」、「Josephine」、「Julie」、「David」。用流利的英文彼此交談：「開口之後，你得有滑溜的英語，知道 investment banking 是什麼東西」 (13)。並且在國際金融業工作：「BOA」、「ABN」、「花旗銀行」，常常動輒充斥著管理投資學的術語：「槓桿」、「台股期指」、「殖利率」、「本益比」、「CSR」、「project」、「degree」、「Porsche」、「HTTP」、「SAP」、「ERP」、「ISP」、「ICP」、「ASP」、「S&P」、「IPO」、「EPS」。小說中的台北似乎看來與紐約沒有距離：「第二天他繼續回去當林太太，你告訴女友昨晚老闆從美國回來」 (74)、「你的部門從美國調回一名上司」 (81)、「她今晚得打電話到美國，談一個一百萬美元的生意」 (19)；並過著紐約名牌時尚的生活品味：「Gucci」、「Prada」、「法拉利」、「agnes b」、「philosophy」、「Armani」、「Tiffany」。

台北的景象完全與「欲望城市」、「艾莉的異想世界」中紐約的街景重疊。

小說以紐約來想像台北可能與王文華的個人經驗有關。他唸完史丹佛 MBA 之後，曾在紐約華爾街從事金融業，並從來不諱言自己過去對紐約的感情：「在紐約的那五年是我人生很快樂的時光。紐約什麼都有，每一天我都在學習。但我最後仍離開了紐約，《吃玻璃的男孩》中『遺憾的只有熱狗』就是描述我對紐約的感情。¹⁶」然而李奭學 (2002) 指出這種紐約式的台北，許多方面都是處於想像的階段：「除了網咖和酒館，台北是否已經後現代到比昔日的十里洋場還摩登？這個問題有趣。如果不是，那麼《蛋白質女孩》的世界大概只能算是人性的寓言，反映台北人「飽暖思淫欲」的那個「思」字。「思」還停留在「想像」的階段，……¹⁷」實際上若依照 90 年台北市工商普查的資料來看，市民最多從事的行業是批發及零售業，其次是通輸、倉儲和運輸業，因此幾乎大部分的台北人都不是王文華筆下的金融界的跨國精英，都有流利的英文能力，工作上能談到動用美金的生意，或是買得起什麼時尚品牌。職業、政治、資本、語言和文化種種的差異都顯示台北與紐約大不相同。

李奭學 (2002) 認為小說中不真實的、紐約式的台北描述，正是它受讀者歡迎的原因。因為透過王文華未來的台北被具象化，使人能「遙瞻未來的世態，想像廿一世紀的台北摩登。… 讓台北的紅男綠女可以望「書」而止渴」。然而我認為，更具體的說，小說受到大眾喜愛，是由於它符合主流論述，將台北摩登、台北全球化，就是等同於台北「曼哈頓化」 (Manhattanize) 的想像。周素卿 (2003) 指出因為都市中心商業區的發展與再發展，被視為都市全球化的回應，因此，台北都市開發計畫開始傾向誇耀式的大型計畫 (urban mega-projects)，並且以「紐約曼哈頓」作為新都市開發計畫的擬像。所以透過小說曼哈頓景象的台北，讀者能夠看到一個當代或未來「台北摩登」的圖像。

¹⁶ 節錄自王文華流行館〈白天紐約，黑夜巴黎〉一文。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works/newyork.htm> [2010/2/1] 。

¹⁷ 節錄自李奭學 (2002) 台北摩登——評王文華著《蛋白質女孩》，中國時報 8 月 19 日，人間副刊。

《蛋白質女孩》的台北在報章媒體或官方活動中都被認可並正當化，王文華成為當代台北的最佳代言人。他被譽為「戀愛達人」、「寫文章聖手」或是職場成功、創意行銷的達人，並獲邀出席許多演講，像是：「暢談培養職場成功特質」、「科技產業的企管問題」、「綠色生活與綠色城市」，也在 News 98 與主持人對談行銷問題，在各大學巡迴講述自己的求學過程和成功法則。Taipei walker 邀請他寫《台北，原來如此》專欄，告訴台北讀者台北應該是什麼模樣。連台北建城一百二十週年的音樂會上，王文華都在一〇一大樓前主持當代台北人生活面貌的主題晚會：

文化局七日上午，會同各市府局處於中山堂廣場舉行『台北建城一百廿週年紀念活動』開跑記者會……因此系列活動開場特別選在四月九日，沈葆楨一八五歲冥誕日，以『東西唱和，今古相連』雙城音樂會，宣示台北市建城一二〇活動正式起跑。雙城音樂會活動九日晚間七時卅分，分別於中山堂廣場及一〇一大樓前的信義十三號廣場連線舉行，中山堂的西城故事由歌仔戲名角孫翠鳳主持，以歌仔調帶出建城兩甲子的點點滴滴，沈葆楨曾孫女台大音樂所教授沈冬並出席與市長對話。一〇一大樓前由作家王文華主持，呈現當代台北人的生活面貌，由市交演奏台北頌、探戈 舞曲、歌劇魅影等知名樂曲。」（粗體為筆者所加）¹⁸。

然而，這種台北想像脫離了一般市民的生活經驗¹⁹，限縮在特定屬於「都會華麗區」（urban glamour zone）地帶：「雷射頭一定住在仁愛安和敦化南，總之是 106 的高級區」（29）。「雷射頭」是作者描述的「台北人」，他們居住在整座城市房價最高的地段，因為只有這裡才是符合作者城市想像的住宅區。王文華甚至還勾勒

¹⁸ 節錄自〈台北建城 120 週年紀念活動 4/9 開跑〉0023 期的台北文化電子報，<http://www.culture.gov.tw/frontsite/news/EpaperAction.do?method=doFindAll&subMenuId=604&siteId=MTAx>。[2010/4/5]。

¹⁹ 詳見王文華流行館讀者留言區：「幾年前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聽說紅到上海去了，當時我心想，台灣作家紅到大陸，我竟未讀過，不行，所以找來讀，才一開頭，我就覺得果然非讀不可，而且也懂為何上海人有興趣，因為它寫的是台北上班族的故事，當時上海經濟正起飛中，他們當然欣羨早飛一步的台北…但一直讀下去，完全沒有我熟悉的台北味道，我真的離開那座城市那麼久嗎？」（讀者 Paggy），<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 [2010/1/22]。

出一幅最理想的台北約會地圖：

「我喜歡和她走在仁愛路，從總統府走到市政府。在鴻禧大廈停下腳步，幻想兩個人住進去的幸福。慢慢走到連戰競選總部，爭辯他到底會贏會輸...。然後走到空軍總部，說你當兵時非常辛苦.....接著你們走到九如，點了一碗湯圓裹腹。.....走到圓環你們繞到誠品看書，他立刻走到文學名著。.....離開誠品你看到名店櫥窗的衣服，心想這些都是很好的生日禮物。.....離開誠品走到富邦大樓，坐在台階地點起蠟燭。.....你們繼續走到延吉街喝木瓜牛乳，你嚇她說妳最近好像有點發福。她說我們去參加亞歷山大俱樂部。.....接著你們走到國父紀念館，.....最後你們走到華納威秀 (172-173) 。

這不僅僅是個戀愛私房路線的推薦，也是城市空間的勾勒和地點的指認，所有的空間彷彿都為白領精英的生活方式而存在，「誠品」、「華納威秀」、「亞歷山大健身房」、「民生東路上的 Startbucks」，分別提供閱讀、看電影、健身和喝咖啡的服務這些中產階級的休閒活動。

在這個城市圖像的描述中，台北只能是那些金融或外商公司白領，居住、消費、休閒的處所，場景圍繞在：信義區、市政府和東區，這些為上層經理階級工作或消費的場所。也就是 Sassen (1996) 所謂包括：機場、上層商業區塊、高級飯店與餐廳等「都會華麗區」。這樣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所想像出來的台北圖像，已經將其餘的都市空間排除在城市想像之外。

第四節、小結

本章我主要藉由以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觀察到台北全球化下的精英寰宇主義式想像；並從學者們對《蛋白質女孩》中台北故事能暢銷於上海的討論，指出在東亞都會區域經濟重整下，這種精英寰宇主義的台北想像，進而也成為台北與上海出現分層式寰宇主義的基礎。然而儘管從《蛋

白質女孩》的「都會時尚書寫」觀察到兩種形式台北跨越邊界的寰宇主義想像，本章後半段我經由小說文本分析，卻又將指出原先南北／正邪／鄉村與都市／本土與外來的對立，被轉化為底層勞工與跨國精英的階級界線，台北都會空間與台北人身分被重新定義；顯示精英寰宇主義的台北想像只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運作，反而衍生了台北新的邊界。

值得注意的是，本章從《蛋白質女孩》，觀察到全球化台北出現「精英式寰宇主義」想像，以跨國經理階級或跨國精英形象，來定義台北城市使用者身份的現象，仍然會混合在本研究第三、四章中所指出台北「分層式寰宇主義」和「多元文化」想像中。

除此之外，我認為本章在《蛋白質女孩》為何流行於上海的分析與討論，發現台北精英寰宇主義想像，以及兩岸中華民族共同的語言文化，進而成為台北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的基礎；正好回應了 Harvey 對 Held「分層式寰宇主義」的批評，認為其沒有脫離精英式寰宇主義那種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時甚至和國族主義相互合作。不過其中，更深入關於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如何表現在當代的台北城市書寫，以及其想像中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運作與複雜的競合關係，如何進一步衍生劃分台北與上海的邊界，甚至使邊界問題陷入矛盾？我將留置下一章繼續討論。

第三章、台北上海愛情故事

在本篇文章中，我將接續上一章的討論。我藉由過去以「反共懷鄉」題材為主的「兩岸書寫」，在當代轉為以「台北上海愛情故事」書寫類型的現象；發現兩岸雙城之間在東亞都會區域形成、城市空間的「再尺度化」現實下，伴隨著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出現。然而透過咖啡因《雙城故事》和李昂《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為兩本代表性的文本，指出此跨界想像中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運作，不但衍生台北與上海新的邊界，最終還讓雙城落入「台北／上海=落後／進步」與「台北／上海=進步／落後」的邊界矛盾之中。

第一節、兩岸書寫：從「反共懷鄉」到「台北上海愛情故事」

一、台北與上海的「分層式寰宇主義」

台人書寫對岸或以兩岸關係為主題的文學作品，至少早至明鄭時期就曾出現，但是大規模的被歸納為某種特殊類型的書寫，則是發生於戰後 1950 年代的「反共文學」與 80 和 90 年代的「眷村小說」等，因此我特別以 1949 年二次大戰結束，國共分治的年代作分野，將此後書寫對岸或兩岸關係的作品稱為「兩岸書寫」，並如同第一章所述，本論文由於時間與篇幅所限，僅選用小說類型分析。本節我將指出「兩岸書寫」的內容從「反共懷鄉」、「眷村」到 2000 年後出現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已發生轉變，並藉由「台北上海愛情故事」說明全球化兩岸關係的轉變，確實開啟了中國上海與台北跨越邊界的新地域想像。

台灣文學史上所謂的「反共文學」是指：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遷台，為了鼓吹對抗共產黨的戰鬥意識，50 年代在國府強勢推行的文藝政策主導或影響下的文學類型。當時包括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輔佐發行《文藝創作》、《幼獅文藝》與《軍中文藝》。「反共文學」的內

容其中一種是將對岸想像為「萬惡共匪」，應鳳鳳（2007）又將之區分為：女性成長與覺醒型、群魔亂舞型、苦難大地型、「言情+反共」型和見證歷史型；無論如何都是將兩岸作為正／神（國民政府）與邪／魔（中共）劃分。另一方面如同梅家玲（2001）指出的「其中，以『劃分敵我，演述正邪』的寫作姿態，演述『家國想像』與『戰鬥意識』正是主題上的著墨重點」（313）；除了敵我戰鬥意識外，文章也多以「家國故土」來描寫中國，梅家玲（2001）對此提出解釋，是由於保「國」的概念往往依附著懷「鄉」的情感，「土地／家『園』／人民／倫常之間，遂有互為表裡的密切關係」（313）。所以描寫邪惡的共軍，與懷想遭受迫害的家園，同為「反共文學」的主軸。

然而到了 80 與 90 年代的「眷村書寫」，兩岸關係的想像已發生轉變。梅家玲（1999 & 2001）對於「反共文學」到「眷村文學」主題，曾提出精闢的觀察。她認為如果說「反共文學」透漏的是將共產黨視為邪魔歪道，中國土地視為血親故土；那麼眷村二代的「眷村小說」則是嘗試以眷村生活為中心與父執輩對神州大陸的想像作辯證。如朱天文在《古都》中的「看久了不知置身何處」（232）、張大春在《將軍碑》中的「那是您的歷史，爸」（19），兩岸血脈關聯與反攻聖戰的歷史開始被質疑。楊佳嫻（2004）則藉李渝、朱天文、朱天文和駱以軍等作品，指出在 60、7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80 年代和 90 年代眷村二代的「眷村小說」已將台北視為「新鄉土」與記憶的源頭，對岸已不是理所當然的家國故鄉。亦即眷村子弟缺乏大陸記憶，只有在眷村與台灣生長的經驗，加上本土論述與反攻大陸不可得的政治事實影響，兩岸家國想像的牽繫，在「眷村小說」中我們看到已逐漸被拆解。

2000 年以後的雖然仍有眷村二代的「眷村小說」，但我觀察到兩岸書寫又出現了另一種新的形式－「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當然上海成為文藝作品的題材並非新鮮事，許秦葦（2005）指出早在戰後「文化上海熱」就已在台蔓延。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從 40 年代成名上海，50 年代紅遍台灣文壇的張愛玲，60 年代的白先勇，

到 80 年代以後侯孝賢拍的《悲情城市》與《海上花》，都能分別代表不同時期與族群的「文化上海熱」。然而此時的「文化上海熱」大都來自於二戰後上海官僚、商人、文人及其子弟，對過往摩登繁華世界的嚮往（朱大可，2001），許秦葦（2005）也認為這是「來臺人士」的隔岸懷舊，也就是大抵沒有脫離「反共文學」和「眷村小說」以來，「懷鄉」與「失根」的主軸。但是隨著 1985 年台灣解嚴，1987 年開放探親，與 1978 年中共改革開放，並於 1988 年鄧小平指示上海是「與其他特區不一樣的改革」後，兩岸情勢趨緩；探親、旅遊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1990 年代中期台商大舉投資中國，其中上海成為台灣人「掏金夢」的首選。因此許秦葦（2005）認為，2000 年這一波的「經濟上海熱」連帶讓兩岸以上海與台北為中心，重新引領各種文藝交流與書寫題材，例如賴聲川在上海的戲劇演出、王文華走紅上海、鐘文音、藍懷恩等沒有上海文化淵源的作家鎖定「上海」進行創作。除此之外，2002 年 9 月市政府舉辦的「雙城記—台北、上海十年文化變遷系列講座」後，「雙城」一詞開始自然化了台北與上海的關聯。

不過，其中我認為更有趣的現象，是同時間一種從台北和上海愛情故事出發的兩岸書寫形式正在成形，它可能有時是訴諸兩地的文化歷史關係，包括：舞台劇《雙城戀曲》、電視劇《我在 1949 等你》都是找尋上一世代感情秘密的故事，或是以因果宿命牽扯來發展，李昂的《七世姻緣：台灣／中國情人》，暗示雙城之間早有所關聯。有時則是著重於兩岸經濟合作的人員往來，像是：或是袁燕華的漫畫小說《上海情人》、咖啡因的網路小說《雙城故事》對雙城之間浪漫都會流動的想像等。不論情節如何，它們同時都是以台北和上海兩個城市為主軸，敘述兩地男女相愛的故事。

因此我認為，綜觀戰後兩岸書寫的主題，從 50 年代的「反共文學」，到 2000 年後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一方面，可以發現敘事中的兩岸關係，逐漸從「家國血緣」轉變為「雙城情愛」，另方面，也可以推斷其表示著，兩岸間出現了以台北上海為地域尺度的「分層式寰宇主義」跨界想像。如同黃宗儀（2008）曾藉由歷

史文化與東亞政治經濟的角度，說明香港與上海「雙城」連結的「修辭」何以發生。雖然她討論的是香港與上海，卻提醒了我們文化文本的感知空間是因應區域地理現實產生的結果，亦即兩岸書寫敘事主題的轉變，可能代表區域經濟和政治消長所驅動的文化想像變遷。

許秦蒙（2005）分析 2000 年後台灣人的「經濟上海熱」，指出「今日到上海的流動人口，已不再屬於過去外省族群『懷鄉式』、『落葉歸根』的回歸，今日上海，已是族群意識較模糊的新世代尋求開創事業的一番新天地」（9）。龍應台（2001）也以城市高於國家，文化高於政權的觀點來敘述台北與上海的關係²⁰，強調：「我觀世界版圖，我的眼睛裡沒有一片片的國土，只有一個一個點狀的城市。」²¹雖然這些論述，可能讓人很輕易地推論，兩岸書寫從「家國血緣」到「雙城情愛」，應該代表著兩岸在全球都會區域鍊結的情境之下，造成流動人口結構發生改變，所以過去以血緣親屬、家國民族的想像連結兩地的方式，已經全然轉變為全球化台北與上海經貿往來的想像。

然而若細究上述提到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的類型，有的是描寫雙城經貿合作，有的是強調兩地文化歷史淵源，可以發現兩岸城市區域連結的分層式寰宇想像，應該不僅存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整合的邏輯，也存在著「家國血緣」的國族意識運作。

第二節、兩種「台北上海愛情故事」

上述整理發現 2000 年後出現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包含戲劇形式的《雙城戀曲》、《我在 1949 等你》；漫畫形式的《上海情人》以及小說文類的《雙城故事》與《七世姻緣：台灣／中國情人》。不過如同第一章我所說明的，受限於各

²⁰ 龍應台「亞太文化系列」之「我所在意的」中提到三個基本的文化理念：「城市先於國家」、「文化超越政治」、「亞太重於歐美」。見龍應台（2001）中國時報，7 月 20 日，人間副刊。

²¹ 詳見朱大可（2001）台北對上海的感覺和單戀，中國報導週刊，<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chinaweekly/html/1096.htm> [2010/3/2] 。

種文類差異甚大，分析比較文本不易，本論文中觀察的台北城市書寫主要以小說作品和少數詩作為主；因此，接續這類能代表台北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出現的台北書寫中，我選擇兩本代表不同意識立場的小說：咖啡因的《雙城故事》，以及李昂的《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從事文本分析。

咖啡因為戀愛兩性作家，長期為蘋果日報、自由時報、時報周刊、Yahoo 奇摩、東森新聞報、ELLE Online、儂儂雜誌、茉莉雜誌、大陸愛美麗、Wo!man 數位雜誌等兩岸各大媒體撰寫專欄²²。如同咖啡因自敘其是在 2002 年前往上海從事廣告行銷工作時，一邊完成《雙城故事》的小說創作²³，因此這本小說可算是 2000 年「經濟上海熱」勢頭下的文化產物。咖啡因在兩岸商務和文創的工作經驗，以及其混雜模糊的國族意識²⁴，使我們在下面文本分析中，將探查到小說是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漫想像，來創造兩岸雙城的分層式寰宇主義。

而如同 Appadurai (1990) 的觀察：「對於小國來說，被大國尤其是鄰近的大國從文化上吞併的恐懼永遠存在。一個人的想像共同體，對於另一人來說則是政治上的牢籠」（6）。《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的作者李昂，不同於咖啡因，則具有鮮明的國族意識立場。李昂，本名施淑端，出生於彰化鹿港；李昂在解嚴後將性別議題開展至政治家國的建構，「八〇年代末期，即將邁入九〇年代，李昂企圖以女性主體的觀點，為台灣建構新的歷史圖像與國族寓言。在建構歷史的過程中，相對於男性「壯烈的」家國戰爭，李昂採取了浪漫傳奇的素材」（洪珊瑚，

²² 詳見咖啡因部落格「幸福咖啡因」，<http://www.wretch.cc/blog/garphie> [2010/3/2] 。

²³ 取自 2010/10/29 咖啡因訪談：「我 [咖啡因自稱] 原先是做行銷、就是廣告的，所以才會有機會去大陸.....我差不多是 2002 年去上海..... 純粹是在大陸很無聊，又沒有男朋友在身邊，所以就乾脆把自己的故事寫成小說.....」（括號中文字為筆者所加）。

²⁴ 取自 2010/10/29 咖啡因訪談：「你說你（只訪問者）是外省人第二代，那我 [咖啡因自稱] 更好笑，我已經搞不清楚我是第幾代啦，我就有一個深刻的感覺啊，其實我聽不太懂台語…其實我聽得懂，但如果沒有字幕，我會聽不太懂；但我是有一點客家人的血統，但我聽不懂客家話，那我就會覺得很好笑啊，我看電視常常會很想罵人啊，尤其是播新聞的時候，我看客台，我聽不懂那個新聞；我在轉那個民視，我也聽不懂啊，那我就會想，這是我的家嗎？因為我小時候是在台中還沒長大就到台北，那有時候這種文化餵養一直在轉換，又加上我是父母離異嘛，就接受不同的家庭，就不同的教育，你真的會覺得很好奇的是說，我是屬於第幾代，我是歸屬於那一類，我真的不知道耶，那我會覺得這些創作，比方說我看眷村故事，我沒感覺，看娘家，我也沒感覺，那我就會覺得那屬於我們的故事在哪裡？找不到耶」（括號中文字為筆者所加）。

1998：37）。劉亮雅（2000）便指出她在小說《自傳的小說》中，以二二八事件台共領導人謝雪紅的故事為藍本，探索謝雪紅既非中國人也非日本人，由童養媳出身到被視為淫女的身份創傷，重建台籍女性的集體記憶。而小說《迷園》中：「由小說諸多的安排，顯示李昂重建台灣文化的意圖：台灣是否省思向大中國看齊摹倣的心態，思考尋求適合本土體質，並且是擺脫封建、進步積極的新動力，重塑具有特色的台灣文化」（洪珊慧，1998：50）。可見福佬女性的台灣家國意識一直是李昂的重要關懷。

所以而後文本分析中，我將說明具有強烈台灣國族主義色彩的李昂，卻在「經濟、文化上海熱」持續發燒的 2009 年 1 月，出版這本兩岸愛情題材的《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一書，代表著國族意識下所想像的兩岸雙城「分層式寰宇主義」。

一、《雙城故事》

小說《雙城故事》描述許多台北都會女性，來往於台北與上海間的愛情短篇記事。雖然是各種相異的小故事交織而成，但故事的公式卻依循著描述這些女主角們在台北受到了愛情的創傷，為了揮別這一切，決定前往上海，而到了上海後不論愛情是否有美滿的結局，主角都獲得成長。這符合了 80 年代以後言情小說的關懷：「此時期言情小說的共同關切點是女性的自我成長。有些作家把愛情與自我成長這兩個主題結合在一起，而有些作家卻反而描繪女性對愛情婚姻的失望與幻滅，因幻滅而加速自我成長的腳步」（林芳玫，1994：212）。所以小說中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兩岸的往來想像為浪漫的流動，並將上海描述為讓女主角自我成長的地點，而上海男人能成為羅曼史中可欲的「白馬王子」。

（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漫想像

在這部份的文本分析中，首先我認為《雙城故事》看似單純地描述許多都會男女在台北與上海兩地發生的愛情故事，實則透過一種現代女性追尋愛情與工作

的慾望陳述，浪漫化全球化台北與上海城市間的人員流動。

小說最先出現的小蝶為了逃離花心的羅杰決定前往上海，貓貓小姐也是為了結束一段不清楚的感情關係，自願從台北調到上海。而小說第一人稱的主角也同樣為了逃離何瑞而選擇離開台北到上海工作。主角在上海認識的台灣朋友久安也不例外，她選擇離開有家室的摩根哈利來到上海：「直到公司要調她到上海來，久安才想到離開也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好方法，...」(49)。作者咖啡因利用台北與上海人員往來作為愛情故事中需要的轉折橋段，然而從台北到上海的轉折只是要突顯故事中都會女性的自主與能動性，所以決定前往上海的過程變得輕而易舉：「當時公司要派駐一個台籍幹部，我就來了，就是這麼簡單...」(20)、「我以寫小說為理由，跟家人朋友道別，整理行李的時候，看到報紙刊登上海的報導，外灘的建築很美，夜景很迷人，好，那就去上海吧」(36)。對她們而言上海是個想去就去的感情避難所，台北的公司永遠有轉調上海的機會，要離開台北第一個想要前往的目的地就是上海，而且上海與台北間的距離、國家的界線恍若不曾存在。到了上海之後，故事更加證明兩個城市的相像：「天黑的徐家匯，比天亮時還熱鬧，來來往往的公交車，停停走走的出租車，上上下下的人潮，喇叭聲，引擎聲，叫鬧聲，商場的音樂聲響.....吵雜喧囂的讓人頭昏，有時我會閃神，以為自己正站在忠孝東路，以為自己還在台北，...」(26)；「我和吉伯在新天地的東方魅力餐廳碰面，.....他說著工作上遇到的問題，我忽然間覺得像是回到台北，下班之後和朋友相約，在熱鬧新潮的東區餐廳碰頭，...」(54)。即便身處在上海的徐家匯、新天地，也往往讓主角想像自己置身於台北的忠孝東路東區一帶，兩城被繁華、熱鬧、現代化的都會情境類比串連。兩地的來往，不但沒有距離與空間的差異，也同時被男女搭訕的情節，平添浪漫想像。如同十九世紀時波特萊爾在巴黎街頭邂逅一名穿喪服的女子，都市流動中對陌生人最浪漫的幻想便是隨時可能發生的男女巧遇，這個情節讓兩岸人員流動中的未知與不確定，從恐懼變成慾望。所以小說裡面與女主角戀愛的兩個上海男人—毛峰與吉伯，以及和女配角綺麗交往的

夏日，不論是在逛街的路上，抑或是轉機的途中，全是以搭訕女生的方式登場。

而且，這些上海男子都打破了女主角們對中國男人的印象：「我們在上海書城旁邊小歇泡紅茶聊了起來，男孩在外商公司做事，常常接觸台灣客戶，眼界很寬，動作很體貼，說話有條理，我和久安都沒想到上海的男孩如此優秀」（52）。

「『你也是到上海出差嗎？』…『不是，我回家。』男子說。『你是上海人啊？』賽琳娜問，男子點頭。『一點都不像。』賽琳娜驚訝的說」（63）。故事中的上海男人往往讓女主角驚呼一點都不像自己過去以為的上海人形象。然而這些女主角在見到這些出人意表的男主角之前，故事中其實也未敘述她們接觸了哪些所謂「傳統」或「典型」的上海人，那麼是什麼原因讓這些男主角「特別」呢？他們到底是「別於」什麼人呢？小說沒有交代，但我們仍能從作者對這些男主角的描述中窺知。作者描述他們在外商公司工作，眼界很寬、體貼且談吐不俗，背後隱含是另一種台灣人對大陸人，既定的「勞工的、見識淺薄、粗魯且俗氣」的想像在做對比，所以咖啡因的預設意含有兩種可能，一是上海男人的形象被她認為是與其他的大陸人區隔的，或者是咖啡因藉由這些見多識廣的上海男人推翻了過去對中國男人的印象。在「二十世紀中以來『哈樂根』系列 (Harlequin) 所依循的『麗蓓嘉模式』 (Rebacca model) 中，羅曼史故事往往塑造一個純潔的女主角與一個更高權力、更有歷練的男主角陷入一段浪漫的愛情」（Happenstand, 1998: 129）。也就是羅曼史傳統中男主角的條件通常要高於女主角，塑造一個讓讀者可欲的「白馬王子」形象。那麼如果要推翻一個「典型」、「傳統」的中國或上海男人的想像，讓女主角與讀者驚呼男主角的「優秀」，咖啡因該如何設定這些上海男人的身份？依照小說敘述，這些上海人多被設定是在外商公司做事，常常接觸台灣客戶，眼界很寬，換句話說就是常常出國，或常常接觸外國事務的白領階級；或是曾出國留學，在國外工作的身份：『喔，上海人應該像什麼樣子呢？』男子揚眉，充滿興味地問。…賽琳娜地第一次遇到上海人，也忍不住好奇，…男子名叫毛峰，是一種茶名，在上海長大，到美國求學，近兩年在加拿大工作」（63）。亦即一個全球跨

國精英形象。

咖啡因在接受訪談時，曾不諱言的表示，要敘述兩岸雙城的故事，最大的困難在於容易觸動兩岸敏感的政治神經²⁵。而我們可以看到，這本小說之所以能讓讀者拋開兩岸政治緊張的對立，修正台灣讀者對大陸人的負面印象，讓台北上海的愛情故事得以成立，是來自於咖啡因把上海人賦予了國籍模糊的「跨國彈性身份」²⁶想像，將兩岸雙城描寫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城市區域整合下，邊界模糊的地理空間。

（二）台北／上海＝落後／進步

咖啡因雖然會將上海比為台北，卻也用小說中台北人看上海的欽羨，來合理化女主角從台北赴上海工作能成為劇情的正面轉折：「那是我第一次來到上海，2000 年的夏天，我穿著無袖洋裝，學坐地鐵，在都市的脈絡裡摸索，為上海現代與古典交融的景緻迷惑，發現街上的上海小姐大多穿著細肩帶的時髦衣服，她們大膽敢秀，身材火辣，面容精緻如陶瓷娃娃」（171）。作者描寫上海現代和古典的景緻與上海小姐的時髦火辣，將上海敘述為富有文化又先進時尚之都，在讚嘆的同時，彷彿還透露自嘆不如的自卑：「湯姆的小公司接案的能力比公司的外觀傑出許多，案子一個接一個，老實說這裡的比稿比台灣競爭，廣告公司太多了，本土的，外商的，台商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都爭奪同一個客戶，工作壓力竟比台灣大得多」（183）。這裡匯聚了世界各處精英，工作壓力比台灣大得多，意味著上海是比台北還要高階的全球城市，相形之下，好像不主動前往上海，就會錯失與世界連結的機會：「湯姆很有說服力，上海也很有說服力，看著外灘一整排燈光精心投射，稜角分明的百年建築，大半夜也打著燈光的高架道路，聳立在黃浦江畔的東方明珠塔和世界十大高樓金茂凱悅，點點燈光綴滿夜上海…各色各樣的外

²⁵取自 2010/10/29 咖啡因訪談：「你說雙城嘛，兩岸這樣，他們說這樣的故事其實一直有人想拍，但是不好拍，很難拿捏。……會很容易有泛政治化的問題，太敏感很難碰觸。」

²⁶黃宗儀曾指出「跨國彈性身份」成為上海居民對集體身份的新的想像（2007: 19）。在本章分析中可以發現，這種「跨國彈性身份」也被挪用為台北認同上海人的身份想像。

國人，各種語言各式穿著，讓人眼光撩亂，意志飛揚，……幾乎在當下，我就決定離開台北，投身上海」（172）。就像咖啡因在序中自述：「剛回去台灣又接到電話，更多人打算前往上海，做傳銷，念書，去創業……大家的理由都不同，臉上的信念都很類似，上海蓬勃的發展，I should be there! 我總是鼓勵大家前往，台灣太小，遠方太美，彼岸的燈光太亮眼。離開總是好的，捨去一些才會得到新的，多去經歷，人生才會完整，無論是否再回來」（8）。台北到上海遂成一種浮華夢的想望，一種追求更完美人生的途徑。

也正因為上海這個地點被描述為連接世界的舞台，因此在小說的每一個小故事中，上海能夠被挪用為小說女主角尋找自我實現自我的城市，如：〈空位〉中的貓貓小姐到上海後反而讓台北的「他」明白自己的重要，雖然故事不是以圓滿圓收場，但上海之行也讓困擾貓貓小姐的感情獲得解決。另外〈專寵〉中的久安到了上海後也逐漸忘情在台北讓他受傷的摩根哈利，而找到一個願意守候她的上海男子吉伯。〈體溫〉中上海出差之旅，讓賽琳娜認識了上海的毛峰，並勇於脫離台北失敗的婚姻，去追尋自己的幸福。而最後一篇〈雙城故事：上海與台北之間·愛情高潮紀實〉裡的貓貓則是在上海之行後有所成長，「『喔，小姐～你也是台灣來的喔？看起來好像上海小姐喔！』『是吧？』貓貓回問。『對啊對啊，你看你看講話都像上海小姐了勒……』貓貓站在一群台灣人之中，感覺自己並不屬於他們，她知道自己已經不同了，不是去年剛到上海的台北小姐，上海已經教給她很多事，很多在台灣不會發生的事」（161）。她被錯認為上海人，卻反而很開心，因為她已經真的認為自己不再是個台北小姐，變成上海小姐意味著她的成熟歷練，並且得到更大的流動資本：「我對匡說我要離開幾天。『去哪裡？上海嗎？』『不是，我會再回去，但不是現在，等我準備好之時』」（251）。「『你要去哪裡？』匡問我。『新加坡。』……我要去找 H，我不知道見了面會如何。會前進還是後退？生命太快，選擇太多，但是我不再那麼害怕了……我知道我可以選擇留下，或是離開，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攔我」（253）。貓貓最後離開了上海，變得對人生與流動無所畏懼，

而且也可以選擇自己的去處並掌握自己的去留。林芳玫（1994）指出 80 年代的言情小說最重大的主題突破在於自我與工作，亦即愛情能推動自我成長與事業成就，而不會威脅自我獨立；乍看之下咖啡因的台北上海愛情主題，似乎完全套用這道公式，然而實際上細究小說中推動女主角自我成長與事業成就的關鍵，並非愛情的力量，而是女主角經過上海的洗禮，換句話說，小說中是將上海型塑為開化啟蒙台北女子之處。

也就是說小說中可以看到，咖啡因的敘事除了讓台北到上海的流動，變成浪漫且能被慾望的過程，她還將上海塑造為解決女主角愛情問題並使她開創事業與自我提昇的關鍵：每一個女主角從台北到上海後，愛情、事業與自我都得到收穫。故事中，上海國際大都會的景觀，有別於讀者所有原先對中國的負面想像，教導並開化來自台北的女子，彷彿上海是比台北高上一等的城市。

因此總結而論，我認為咖啡因的《雙城故事》，一方面顯示新自由主義邏輯，能隱藏臺灣讀者不欲的兩岸政治邊界，創造出台北上海浪漫的邂逅故事以及雙城的「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然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邏輯下，上海提昇為世界一級全球城市的形象，把台北劃為需藉上海才能與世界連結、向上晉升的地位，這樣以「必須」來創造新的台北與上海「必然」連結的方式，卻又衍生「台北／上海＝落後／進步」的新邊界。

二、《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

《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的故事大綱，為一個居住於台北的台灣女作家，與居住於上海任職中共黨務工作的中國男人之間，一段世代輪迴都註定只能相戀卻又不能結合的命運。

李昂在此小說的序裡，說明自己從 70 年代開始，就一直思索以中國、兩岸題材為書寫主題的可能性；尤其到了 90 年代後期，她在一趟中國行後，更是感觸良多。但是遲遲未下筆的原因，來自她始終找不到「觀看」中國的位置：「...特別是

還要考慮到這類書寫的『看』的觀點—我們一定也不希望自己至今仍有早年西方人看東方的那類心態吧」(iii)！直到全球化趨勢，使得台灣的地域邊界似乎不再穩固：「『全球化』是流動的。……總之，流動的一切一切。果真在形成一個『地球村』？！……我們一個不小心，會是在『全球化』浪頭來襲立即被併入、吞沒的那一環」(iii)。李昂才決定選擇書寫一本兩岸的愛情小說，「一部全球化中的臺灣／中國愛情故事」(vi)。

我認為，李昂寫《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她思考多年，卻因唯恐落入早年西方對東方，那類「我們台灣」劃分「他者中國」心態而無法動筆的創作，最後卻是在 2000 年後，以一位台北女人和上海男人的愛情故事來呈現；表示臺灣國族意識立場的李昂，能在全球化台北與上海都會區域整合的情況下，開始想像雙城的跨界。

第二，為《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是一個能相戀卻又不能美滿的故事：「我不再說：我們的故事一如『灰姑娘』的序篇，而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vii)；在接續文本分析中我將說明，這既不合乎羅曼史小說邏輯，卻也不是為了凸顯愛情至深偉大的戀愛悲劇，一邊創造雙城跨界的幻想，一邊又製造雙城難以消弭的邊界，正代表國族意識與台北上海「分層寰宇主義」合作與衝突的矛盾關係。

（一）跨界與邊界：

1.特殊的「上海男人」

跟咖啡因的《雙城故事》一樣，李昂也是透過設計一位特殊的「上海男人」，來讓台北與上海的戀愛故事得以發生，想像台北與上海邊界消弭的可能。

故事開始發生在代表台灣作家的女主角—何方，與在中國從事領導工作的男主角—周曉東，共同參加在香港的兩岸三地的文學會議進而相識，「那是一個關於兩岸三地文學的會議，廣邀了來自台灣海峽『兩岸』—中國與台灣—還要加上香

港方構成『三地』的作家。開會的地點得折衷，不在台灣或中國，而在香港」(6)。兩岸之間的會議卻要隔著香港為第三地，李昂一開始便要明示雙方政治尷尬緊張的關係。何方因著對周曉東在中國領導工作的厭惡，略帶嘲弄的說起之前她在上海採訪妓女和嫖客私生子滿月酒的經驗，有多麼豪奢與粗俗，刻意要諷刺中國快速經濟發展有多麼荒謬，並掀起了兩岸作家的捍衛戰：「一個應也是中國官方的人替中國的這種現象辯白，開始回擊：台灣也是如何如何。甚且更進一步批評：上海這些色情文化，一開始也是台灣人帶進來的…」(17)。從這段雙方爭辯的談話，透漏兩岸不只是政治上的敏感界線，當以上海代表著的中國經濟崛起，兩岸經濟地位再也無法用富裕台灣和貧窮中國區分之際，文化的先進與粗鄙成為一種畫界的指標，但這也往往是個矛盾的意識形態。而這番激烈的論戰，卻在當有人問起：「那個跳脫衣舞的男人也是台商」(17)？而何方道：「『不是，是個華僑，跟台商一起做生意，也就玩在一起』」(17)。得到休兵的機會：「何方回答，看到一桌人釋然的神情」(17)。也就是當中國人文化荒唐還是台灣人文化荒謬已經分不清的時候，只要那位最失態的跳脫衣舞的男人不是其中之一就行。他是個「華僑」，不在中國人或台灣人的分類之中，也就相對容易剔除在所有的界線之外。李昂在這裡想要表示唯有踏在晦暗不明、非中非台的灰色地帶兩邊的交流才能繼續。所以為了成就兩岸的愛情故事，小說的男主角周曉東也就必須被除卻在李昂設定的兩岸分類之外。

男主角周曉東的出現一一模糊了女主角心中兩岸政治、經濟和文化分明的壁壘。就像咖啡因的《雙城故事》用跨國精英身份讓上海人能消除兩岸既定敏感界線，成為愛情故事的白馬王子，李昂也同樣必須設法讓這個中國男人變成一個可欲的男主角，所以無獨有偶的周曉東也要有別於女主角認識的中國人。其一是他沒有站在與何方對立的政治立場：「以過往的接觸經驗，何方原以為周曉東也會加入攻擊，尤其它還來自黨職機構，不更該為自己國家辯白？！……可是周曉東不曾多說，只坦誠的、落落大方的微微一笑，自然的讓這問題過去」(8)。這番描

述首先透露出的是周曉東的大氣有禮，雖然他來自黨職機構，卻沒有想要挑起兩邊政治的緊張，讓何方頓時覺得自己對政治界線的堅持好像變成一種女孩的任性。其二，為周曉東的經濟階級異於小說中台灣女子對中國男人的想像。中國男人農工階級的習慣，被等同於缺乏衛生觀念、不文明的形象：「也就是說，她們受不了的是個人私下做的事，有些中國男人在公眾場合作來全不避諱：...大庭廣眾下掏耳朵挖鼻屎，還隨時隨地亂吐痰。 (21)她們台灣來的女生一致同意都這樣說：最害怕的是有些中國男人的手，指甲裡滿滿是污垢，...她們台灣來的女生說：有些中國男人經常不洗澡，一頭油膩膩的頭髮，一身體味。坐上車、飛機後脫下鞋，那味道啊！真是不能呼吸。何方很難忘掉關於那『氣味』，她不敢多作辯白」 (23) 。因為在大庭廣眾下掏耳朵、挖鼻屎、亂吐痰與滿滿污垢的長指甲，和油膩骯髒的體味，相悖於中產階級對身體潔淨的要求，所以在這番描述下，中國男人全變成一群底層階級的烏合之眾。但周曉東卻是中國逐漸富裕的新階級：「何方終於知曉這男人何以不似她認識的多數中國男人『老土』，他是那麼逐漸富裕起來的『共和國』培養起新一代」 (131-132) 。男主角的階級身份因而可以被排除在其他中國男人之外。其三，是周曉東受西化的思想與混血身份與中國男人相異。「就像來自農村的你，該是十分『老土』，但只消中國的改革開放一些時日，你有著那樣簡單的得體與優雅，深令我讚賞。.....(如此不同又相同的你，在戀愛的過程中，會是怎樣的一個情人？在床第上，你會不會為好萊塢電影那套通行全球的撫愛、姿勢所馴服...)」 (46) 。周曉東受經濟的開放和好萊塢文化的影響的言行舉止，讓他不再落伍而得到女主角的讚賞；而他長相上的差別，也多了更多血統來歷的想像：「周曉東生的是一對雙眼皮眼睛，雙眼皮的刻痕如此深重，一如白種人，.....幾回後何方才分辨出，是由於那雙瞳的淡色，不僅較東方人常見的褐色眸子淺，而且還透明著能令流光乍現，方有此淺色。『你真不像中國人。』何方開玩笑，.....」 (26) 。

在這裡我認為應該關心的是，作者李昂和咖啡因同樣是透過新自由主義全球

化的邏輯，塑造出政治傾向西方自由民主價值、富裕精英身份、文化開放與身份流動不明，而讓女主角一見傾心的男主角形象。顯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能幫助模糊國族意識所捍衛的兩岸邊界，創造雙城「分層式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

不過不同於咖啡因《雙城故事》中的上海男人，李昂小說中還能觀察到，雖然一面要強調上海周曉東「不像中國人」，另一面卻也要凸顯上海周曉東與台北何方的「同文同種」。其中周曉東的籍貫，被描寫和何方相似：「『我怎麼不會是中國人？』『我的意思是……』何方只有匆忙解釋：『你老家在哪裡？』『漳州，福建。』周曉東簡單的回答（26）。...於何方心底，轟轟然聲響中的是周曉東回答的那簡單的兩個字：『漳州。』『漳泉』（27）。文中雖然周曉東「不像中國人」的特質激起了何方的好感，然而能讓何方對周曉東轟然湧現愛意的，卻是當她聽到他與自己都來自漳泉一帶；接著，男主角因為與台灣人國語腔調的相仿，又拉近他與女主角的距離：「所以當他說起『普通話』，含帶漳州話的鄉音，與台灣人說『國語』一即『普通話』，含帶『閩南語』鄉音，自然聽來相仿。...（她那樣神奇的感到他們之間的相似、相同...方有如此熟悉的感覺）（232）。甚至當周曉東在基隆夜市被誤認為當地人時，何方只有滿心的甜蜜：「他原來的大陸故鄉講的是漳州口音閩南話，本來就是台灣閩南話的主流口音，問路的人得到回答後也不疑他原來自中國。惹得何方大叫：『吔！吔！到底你是台灣人還我是台灣人！』而滿心甜蜜」（266）。亦即，小說的敘事，是將不論來自上海的周曉東，或是台北的何方，都寫成閩南語流利、祖籍來自漳泉一帶「同文同種」的閩南族群；讓「上海人」「台北人」，「中國人」「台灣人」的邊界在福佬族群的架構下不再清楚劃分，才得以使周曉東成為李昂愛情小說中可欲的男主角。

也就代表不只新自由主義，臺灣福佬族群為主體的國族意識，也共同創造台北上海邊界模糊的「分層式寰宇主義」跨界想像；就像文獻回顧中 Harvey (2008) 所說的：「在 Kant 之後，寰宇主義大部分潛藏了不是帶有階級意含競爭性的自由主義，就是保存了國族主義和階級力量為基礎的民族國家政治」（78）。

2.「不能結合」的愛情

《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用台北女人與上海男人的相戀，想像兩岸雙城跨越邊界的可能，但故事卻又要預設兩人註定「不能結合」的下場，暗示台北與上海終究存在無法消弭的邊界。

其中，小說裡所謂「不能結合」包含兩個意義，首先是李昂把愛情有情人不能終成眷屬的淒美意義，修改為不能發生性關係的禁忌。故事的開頭，李昂從七世姻緣的典故講起：是玉皇大帝為了懲罰動了凡心的金童玉女，註定他們在人間要苦苦相戀七世，不能結合。然而李昂卻置換了一般理解「不能結合」是戀人無法白頭偕老的解釋，說明為何其他像「七仙女」與「白蛇傳」同樣是男女不能長相廝守的故事不能列入「七世姻緣」的傳說中，原因在於「不能結合」最重要的關鍵為一不能發生性關係；「於被貶謫的故事中，『不能結合』原因有種種可能：一方逝去天人永隔。長年勞燕分飛不能長相廝守。不能白頭偕老。只有那『七世姻緣』的咒怨是：『不能結合』是指不能在一起，連『洞房花燭夜』都不被允許」(157-158)。

李昂強調性關係之所以成為禁忌，是由於與中國情人的「性」將招致各種危險，其一，是會背叛了台灣的情人－陳定國，就連在想像層次上，都不能容許。因此即便做愛的過程中，一邊想著周曉東，卻仍然要承認眼前的男人是陳定國：「那放棄便來自於承認身上男體是陳定國，也任由這男體在她身享有一兩人（陳定國與她）共同都有一的快感，她的身體屬於他，她也並非不愛他，這一切上不構成背叛，她便不是那『通姦的女人』」(164)。在這段話中，李昂特意把「通姦的女人」用引號標示，以表示其帶有一語雙關之意，那麼她的雙關就很可能是偷情外遇的「通姦」與叛國通敵的「通奸」彼此混用。

其二是喪失主控權的危險。所以小說中何方想像與周曉東發生性愛，只能以口脣來完成：「只有當何方放棄身上的男人是她的至愛周曉東時，她方能盡情無慮

的於想像中與他歡愛。是啊！雖不能迎承張開的下身胴體，她至少能以口脣去吸吮、包容、舔舐……如此她有了兩者，也至少感到安全無虞」（165）。對作者李昂而言，口脣吸吮與抽插的性愛，差別何在，何以這樣的安排才能讓女主角何方感到安全無虞？我們可以在她後面的敘述中找到答案：「她如何能安排這兩個男人，誰插入，而誰讓她以口脣吸吮？兩者不同的差異，是否仍代表著不等的愛？她以為能做的安排，分配交換誰進入、吸吮誰，有主／客之間的差異，……」（166）。亦即被進入與吸吮代表了女性被動與主動的兩種性行為，唯有對中國男人周曉東保有一切主動、主控權的時候，兩人想像中的性行為才能「安全」。

其三，是自我身份喪失的危險。因為在小說中，男女主角的性愛，被描寫為可能危害女主角何方的身份認同。小說中寫何方來到泉州聽到野台戲在唱七世姻緣第五世的故事－「雪梅教子」：明朝的商、秦兩家為世交，商琳與秦雪梅指腹為婚，但商家家道中落，秦家不願將雪梅嫁給商秦，最後替換了一位丫鬟代為出嫁，並生下一子，商琳知道真相後，氣急病死，而雪梅與丫鬟則共同撫育兒子長大。在聽戲的途中，何方出神幻想：「可是我是誰？（我可不可以是那千金小姐、丫鬟，又只是我？我們原就三位一體，你等待的陽具，進入的是我／我們的胴體。）……我究竟想作誰？我究竟是誰？……（可是我是誰？我想作誰？我會是誰？我究竟是誰）」（245-247）？何方不停的自問自己是誰，她想若自己是千金小姐雪梅，就命定不能與商秦結合，而若她換作是那位丫鬟，雖然能與商秦生下兒子，但卻得要拋棄自己原有的身份。與男主角的性愛和維持原本身份被認為是相互違背的兩件事。

藉由這些分析我們可以推論，小說不只將「性」視為會危及對陳定國忠誠的事，也將之視為會失去自我主動權與自我身份認同的行為。其中從「通姦」與「通奸」的雙關，可以推知李昂把男女「性」的「結合」象徵為兩國的合併與界線的消失，把小說中的台灣情人陳定國象徵台灣，上海的中國情人周曉東象徵中國與上海，台北的女主角象徵台灣與台北；然後藉由這些角色設計來暗喻台北與上海

的相戀，可能讓兩岸透過城市的連結而導致兩國的一統，進而危害台灣的主體性。也就是說，李昂將「不能結合」的第一個意義，闡釋為「不能發生性關係」，是要暗示台北與上海雙城邊界消失，將招致臺灣國族主體性消亡的危險。

而第二個「不能結合」的含意，是小說沒有遵循愛情故事的劇情公式，將男主角周曉東賜死。Cawelti (1977) 曾指出：「雖然 [羅曼史] 通常的結果都是永遠快樂幸福的婚姻，不過有時一些更為複雜的愛情故事的結局卻是情侶其中一人或兩人的死亡，然而這樣的結果是為了強調戀愛關係持續且永久的影響。… 這種結局是感傷 (sentimental) 而非悲劇 (tragic)」(42)（括號中文字為筆者所加）。亦即，愛情故事中就算最後以死亡作結，也是為了凸顯愛情的力量。但反觀李昂選擇用「七世姻緣」的傳說來建構這本小說，卻不是以歌頌兩岸愛情為目的。因為若仔細觀察民間傳說七世姻緣的故事：「孟姜女與萬杞梁」、「梁山伯與祝英台」、「郭華郎與王月英」、「王十朋與錢玉蓮」、「商琳與秦雪梅」、「韋燕春與賈玉珍」、「李奎元與王瑞蓮」；這裡頭的男女都是一方或雙方死亡，但他們是因為不能與對方在一起才抑鬱而終，如：孟姜女萬里尋夫在哭倒長城後自盡、梁山伯因祝英台出嫁而病死，祝英台則投墳了斷…等，這些死亡的感傷，都能成就情侶能為愛而死的至深偉大。唯有周曉東的死亡卻是一場無端無由的車禍意外，對於愛情故事最重要的目的一凸顯的愛情的力量，全然無法派上用場。因此這位不同於「中國男人」的「上海男人」周曉東，與台北的何方相識相戀，原本能代表著兩岸雙城跨界的形成，但最後他卻以死亡收場，顯示李昂終究要認為台北和上海跨界的可能，永遠不會存在。

因此我認為，小說敘事中李昂除了以新自由主義邏輯塑造一個模糊兩岸政治邊界的「上海男人」，也透過臺灣福佬主體的國族意識來論述「上海男人」與「台北女人」的「同文同種」，進而使雙城戀愛故事得以成立，是代表國族主義意識運作支持創造「分層式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而李昂安排台北女人「不應該」（因為會背叛台灣男友），也「不能夠」（七世姻緣的註定）與上海男人「結合」，則又

顯示想像台北與上海邊界消弭的「分層式寰宇主義」，將會違逆國族意識型態對台灣／台北地理邊界的堅持。也就是說，台灣國族意識立場鮮明的李昂，之所以既能寫出台北女人與上海男人相愛的故事，卻又不能讓這段愛情故事能到善終，而且兩人「不能結合」的意義也沒有達到羅曼史要凸顯愛情偉大力量的目的，這樣弔詭的敘事安排，來自於國族意識型態對兩岸雙城「分層式寰宇主義」支持與衝突的結果。李昂愛情故事的矛盾，凸顯「強調國家尊嚴、主權至上、族群想像的『國族主義』與全球化的緊張關係」（廖元豪，2006：116），因而使其故事不斷陷在：「怎會有人與我說同樣的話，分享著同樣的文化，可是我們如此相同又如此不同」（43）的矛盾中。

接續，我將指出也正由於《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中，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是在台灣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下運作，所以反倒又衍生了「台北／上海＝進步／落後」的另一道新邊界。

（二）台北／上海＝進步／落後

「羅曼史營造的精神幻境通常是愛情的勝利、永久並克服一切的困難與阻礙」（Cawelti, 1977: 41-42）。然而我們可以看到李昂的《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愛情故事不但沒有克服更凸顯了兩岸雙城的邊界。

因為首先小說裡，周曉東雖然是上海全球化後的新富階級，但他仍是一個渴望向台北學習進步文化的男人。從周曉東初次與何方相見，就對她的名字十分嚮往：「『我以為我才該叫做何方！』……任職於黨部職務前途被看好的周曉東，是同儕羨慕的對象，可是他知道那極限，看到黨部外自由競爭的可能，就不只一次對何方說：『像你多好，憑自己得來的成就，不必靠別人，看別人臉色』」（24-25）。他羨慕的其實並非女主角的名字，而是她身處於不是以黨治國的政體下擁有的自由。而且儘管已有官職權力與較高的經濟能力，周曉東還想虛心的何方學習「文化」：「這見識過外面廣大世面的中國男人知道自己尚有的不足，也看到他爆發中

的國家的問題，何方的確感覺得到周曉東的心虛與不確定。然他不像有些人，…，藉著獲取更多的錢來更大的權力來炫耀，反倒，默默的學習著他認為尚有欠缺的『文化』（180）。在此，李昂特別把「文化」放置在引號中，強調了這裡的文化並非指歷史傳統，而是指現代文明。

這種故事的安排是李昂修改了愛情故事中女主角「征服」男主角過程的結果。通常愛情故事的模式中會看到，「平凡的女主角幾乎都會有一次『消失的行動』（disappearing act），因為某些因素的不得不離開男主角，女主角離開之後，男主角終於省悟了女主角才是他真正的愛，最後，當男主角再度遇上女主角，終於坦然的面對自己的感情而向女主角表白」（Modleski, 1992: 35）。也就是大多愛情故事平凡的女主角會出現一個離開事件，用藉此征服擄獲男主角，這個事件 Modleski 在《復仇之愛》中將它稱之為「消失的行動」。小說中何方也「征服」了周曉東，只是何方並非平凡處於弱勢的女孩，而是一個現代自主有才華的作家，而且她「征服」周曉東的方式並非以「消失的行動」而是用台北女性的獨立與台灣的自由民主思維。所以當周曉東待在台北好一陣子，而因政治因素要離開台灣時，他已經是一副經過台灣洗禮而成長的模樣：「『老天！你真像個台灣人！』…他不再像是那個『共和國』新起卡位的一代，小心翼翼的應對官場的一切，於今，他有一種來自生活、來自土地的樸素。…他捨棄了過往曾熱中的名牌，穿牛仔褲、T恤，棉質襯衫隨便袖子一挽，自在安適」（263）。而何方對他戲稱「台灣真是把你教壞了（269）」的時候，其實是得意於，台灣已經徹底的將周曉東征服改造了。透過這種「征服」的敘事，強調台北在民主自由的政體之下，比處於對岸專制獨裁統治的上海，顯得更加文明進步。

而且故事中，儘管台北的何方用民主價值「征服」了上海的周曉東，兩人發現台北人與上海人彷彿沒有任何差異，彷彿沒有任何必然劃分台北與上海的邊界存在：「那麼，那麼，我們終於一樣了」（266）、「於今，誰活在誰的土地上，都不致不可能」（269）。但終究不能克服國家邊界的力量：「卻顯然並非如此，他終必

得離去，臨別前兩人都不曾多說什麼。兩岸對往來政府官員的約束，周曉東再能回來 Long Stay 遙遙無期」(269)。周曉東駐台北的辦事處被迫撤回上海，讓終於突破各種困難得到何方認同的男主角，因為一個臨時的政治變化就被逐出境，凸顯出國家邊界並非雙城緊密的人員往來就能隱而不見。

最後敘事中，台北與上海成為畢竟就是本質性不同的兩地。因為文中何方再三單獨前往沒有了周曉東存在的上海，發現儘管經濟興興向榮，但上海就像個自大而短視的暴發戶，沒有民主與自由的素養：「『現在台灣搞什麼民主，不過就是政治鬥爭嘛！』……『民主？』民主不外是一種想法，憑甚麼要去相信『一種』思想？」『小李』振振有詞：『至於自由嘛！我現在在大陸有絕對的遷徙自由，…』」(285)。他們被集權政府給馴化，「民主」被視為暴民的行為，對於「自由」的認知更是淺薄，只能以自己曾到過中國各地來誇耀擁有絕對的「自由」。除此之外，更不懂開放接納：「『哦！你們台灣人說的『同志』，我們也有啦！什麼男人穿女人內衣褲…』『小李』做了一個噁心的表情、閃避害怕的動作：『這男人？不如死了算了，他們下流、變態，……』」(287)，對同性戀與變裝癖混淆，無知與保守。在李昂的形容之下，除了周曉東，這些上海人看來愚蠢而自滿，思想保守而落後。所以小說敘述上海這座城市除卻了周曉東後，何方再也沒有留戀：「何方開始感到是自己在這城市，不再有周曉東的關聯，她與這座城市無須試圖建立起一種親近的連結，她可以只是個過客」(289)。也就是說，虛心向台北學習「文化」的上海男人周曉東，雖然似乎模糊了雙城身份的邊界，卻在他離開上海並車禍身亡後，變成一個例外且永遠消失的「上海男人」，而台北與上海也就終究沒有邊界模糊的可能了。

我認為李昂之所以違背了愛情故事的前提，來自於其台灣國族意識，「本就必須要界定自我（誰是『我族』－台灣人如何定義）？同時往往要尋找敵對的他者（otherness）」(廖元豪，2006)，假設台灣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存在與其他地域本質性無法消弭的差異。因此，以此邏輯來創作「台北上海愛情故事」，李昂便會以台北女人何方用「自由」、「民主」的思維征服並啟迪了上海男人來安排雙城男

女的愛情發展，但這樣的敘事策略卻是將民主轉化為「文明」與「進步」的象徵，有開化黑暗大陸的功用，亦即「大陸的『缺乏民主自由』相對於李登輝在台灣掌權後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一種『落後』，…」（鄭鴻昇，2004）。而當這位吸收「自由」、「民主」文化的男人在結局死於非命，成了個中國、上海永遠的例外之後，故事的發展只是凸顯台北（民主）＝進步／上海（非民主）＝落後的邊界。

第三節、小結

本章我指出「兩岸書寫」主題已經發生改變，過去以「反共懷鄉」題材為主，而當代轉為以「台北上海愛情故事」書寫類型來呈現；並認為這呼應了文獻回顧中學者的討論，發現兩岸雙城之間在東亞都會區域形成、城市空間的「再尺度化」現實，伴隨著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跨界想像的出現。而且從「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的敘事類型，也可以觀察到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運作。

進而我實際對咖啡因《雙城故事》和李昂《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兩本小說從事文本分析，發現咖啡因《雙城故事》以全球化的浪漫想像，創造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然而其隱含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將上海敘述為一個啟蒙台北女人的世界之都，反倒重製了上海＝進步／台北＝相對落後的邊界。另外，我也指出李昂《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不符合羅曼史公式的小說敘事，一面藉描述模糊雙城邊界的「上海男人」形象，來成就兩地男女戀情發展，一面又在不是彰顯愛情偉大的目的下，敘述兩人的「不能結合」，來阻止愛情繼續，顯示台灣國族意識與台北與上海「分層式寰宇主義」的相互支持與衝突。而以台灣國族主義運作的雙城跨界想像，進而創造台北（民主）＝進步／上海（非民主）＝落後的邊界。最終，從兩本小說文本中，發現兩岸雙城「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中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運作，不但衍生台北與上海新的邊界，最終還讓雙城落入「台北／上海＝落後／進步」與「台北／上海＝進步／落後」的邊界矛盾之中。

除此之外，本論文礙於戲劇與小說文類的差異甚大，比較分析不易，沒有針對舞台劇《雙城戀曲》、電視劇《我在 1949 等你》從事文本分析，然而我認為這類故事有別於李昂小說中的台灣國族意識，是以大中華國族論來敘述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後續討論值得藉此類型敘事，關注大中華國族主義如何與新自由主義結合，以支持雙城「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其又如何可能彼此發生衝突？以及最後可能衍生何種新的邊界問題？



第四章 移工書寫

James Clifford 認為我們不該將寰宇主義視為有特定本質，因為這將使得寰宇主義往往淪為西方自由主義和特權階級文化；寰宇主義應該指當代能動的、流動的、混血的文化所構成的「後文化空間」(postcultural space) (Robbins, 1998)。並揭示過去那些只將寰宇主義與基督教、白人中心或中產精英階級形象結合的謬誤，指出非自願流動的移民與難民，也有其「差異的寰宇主義」(James Clifford, 1997)。亦即，提醒我們寰宇主義，除了「台北時尚書寫」中觀察到的「精英式寰宇主義」，或是同樣主要以跨國精英身份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邏輯，所產生的「分層式寰宇主義」之外，還應該包含其他，如：底層移民的經驗。而第一章文獻回顧也提到，以寰宇主義「悅納異己」的原則為核心，當代寰宇主義確實已經開始與多元文化概念結合，形成地方對全球化各種人員流動，包括對弱勢移民接納的跨界想像。

在本篇文章中，我將指出另一種當代台北城市書寫現象—「移工書寫」，我認為這應證全球化台北也出現了由寰宇主義「悅納異己」概念，所延伸出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此外，也說明「移工書寫」所代表的台北多元文化想像，甚至還超越學者們對多元文化是以國家公民權為界，最多只將新移民納入的批評，而出現對非公民身份的跨國底層移工開放，更為包容的多元文化。不過進一步藉由分析《外勞詩文獎》作品和《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我卻發現全球化台北多元文化的跨界想像，存在與階級差異混用的文化本質論，與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甚至仍然沒有擺脫公民權界定，進而持續衍生出區分台北與移工的邊界。

第一節、「勞工文學」到「移工書寫」

一、勞工文學的興衰

依照第一本討論台灣勞工文學的專書—黃慧鳳的《台灣勞工文學》，文學分類有很多型式，若以身份為分類標準的話，其中應有「勞工文學」的類別。而勞工文學有狹義和廣義的定義，狹義而言，指的是具有勞工身份者創作的文學，一般稱工人文學；而廣義來說，勞工文學還可以包含非工人作家所描繪的勞工生活及其思想的文學作品（黃慧鳳，2007）。

黃慧鳳（2007）開創性的分析台灣勞工文學的興衰起伏，並將它分成四個階段，首先是日本殖民期間的雛型期，其次為戰後至 1970 年代的黑暗期，再來是 70 年代後的興盛開展期，而在 1987 年以後進入衰退期。文中更進一步歸納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概況，她指出日據時期，由於教育未能真正普及於全體民眾，一般工人階級、底層勞動者因智識能力不高，較少經由文學書寫來抒發個人困境，大部分為知識份子受到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啟迪，或是在思想上承接左翼理論而產生，只能說是勞工文學的雛形階段。直至戰後，由於受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無法或不願意使用漢文創作，而導致與語言轉換問題，加上白色恐怖、戒嚴體制和工農兵文學敏感性的限制，勞工文學進入一段噤聲的黑暗期。70 與 80 年代以後，一方面搭著鄉土文學思潮的行列與作家道德使命的囑託，另一方面則因應台灣進入工業化社會的情境，文壇出現以楊青矗為首、繼以陌上塵、李昌憲等人的創作，掀起一陣勞工文學的討論風潮，甚至有座談會專論勞工文學，可謂是勞工文學的興盛期。然而當解嚴邁入 90 年代之後，勞工得以組成工會，政府也有勞委會等權責機關，工人有合法途徑發聲，使得文學失去革命性意義，加上勞動結構改變，本地勞動人口減少，勞工文學因而在百花爭豔的文壇中逐漸暗淡。

郭誌光《戰後台灣勞工題材小說的異化主題（1945～2005）》以及王雅萍《誰來發聲？—1970 年代以後台灣勞工文學的興起與式微》的文章也都同時注意到勞工文學在 80 年代後期至 90 年代持續衰微的現象。相對於黃慧鳳認為勞工文學式微主要來自勞工問題有了正式的權責機關，勞工也取得應有集會結社與罷工的權利，使文學擔負的使命被社會和政治改革力量取代，王雅萍（2007）則提到「70

年代的鄉土文學進行了一場典範革命，到了 80 年代又持續了一場所謂的『台灣本土論』和『第三世界文學論』的論辯。在越接近 90 年代的同時，隨著消費社會的形成，南北派之別的文學似乎更明顯」（66）。也就是她認為 90 年代台灣文學的南北對立仍存在，甚至更嚴重。此外她根據林淇濬的看法：「『台北的』文學與『台灣的』文學在意識形態的場域上形成一種『城』與『鄉』的差距與對立」（67），來解釋勞工文學的衰微。進一步來說王雅萍認為勞工文學是承繼了台灣文學、70 年代台灣本土論述的傳統而來，而台北書寫則是延續西方後現代主義的都市文學，或是商品消費迎合大眾市場的書寫。因此勞工文學在 80 年代後期沒落，原因在於 80 年代後期以台北為中心的大眾文學與後現代主義小說取得優勢，掌控主流市場走向，排擠了以勞工為主題的創作所致。

二、移工書寫在台北，新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

學者紛紛發現傳統勞工文學已式微，但卻指出勞工文學在進入 90 年代之後，書寫主題發生的重大轉變。過去承襲鄉土文學和本土論述脈絡發展的勞工文學，在 80 年代後期因抵擋不住以消費市場為主的大眾文學和後現代文學，而逐漸銷聲匿跡。但民間作家與台北市政府卻開始轉而關注甚至推行另一種以「外籍移工」為主題的勞工文學：「反倒是台北市近幾年來，卻舉辦了『外籍勞工徵文比賽』，這樣的現象倒是令人頗為玩味」（王雅萍，2006：69）。王雅萍沒有繼續深究討論，卻暗示了勞工文學主題逐漸由傳統勞工轉向外籍移工的現象。

我認為這與 90 年代初期台灣勞動力結構改變有關。因為近數十年東亞的快速工業化，東亞國家人口已由淨外移轉為淨遷入，亦即「外來勞動力」持續增加。這些「外來勞動力」除了來自西方核心國的專業白領、管理階層，以及英語教師這些「專業外籍人士」之外；最大宗就是被稱為「外籍勞工」的族群，其包括來自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契約移工，從事的是建築、勞力密集製造業、看護、家務勞動等職業（藍佩嘉，2002；龔尤倩，2002）。在台灣「外籍勞工」群體的形成，

來自1988年行政院公佈「十四項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規定十四項重要建設得標者得專案申請外勞，後隔兩年外籍勞工正式被引進（龔尤倩，2002），至1992年進一步開放引入家庭幫傭及監護工（藍佩嘉，2002）。根據勞委會2010年10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外勞人數已達37萬6千多人²⁷。

事實上，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反映90年代台灣勞動結構的改變，90年代末開始，「外籍勞工」成為新的書寫者和被再現的勞工主體。例如1998年收錄於陳秋見《紅塵黑手》中的短篇〈那隆阿詹〉、2002年童偉格《王考》中的短篇〈暗影〉等。以及，最主要的是在2000年左右，台北市政府設計以移工為讀者群的書寫，以及支持各種以外籍移工為主的創作和書寫，包括：1999年舉辦的「外勞海報比賽」，2001年開始台北市政府發行第一張《外來移民者文化地圖》（Taipei City's Cultural Map for the Migrants，簡稱外勞文化地圖），同年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也開始舉辦一年一次的外勞詩文創作比賽—《外勞詩文獎》，甚至2006年台北文學獎的台北文學年金，也頒給以跨國移工為題材的小說—《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外籍移工相關的文本似乎越來越多，而且不限於傳統文學的形式，還有地圖、海報，甚至各種照片、紀錄片影像等，因此我將此有別於勞工文學的書寫現象稱為「移工書寫」²⁸，指稱那些由移工自行創作，或以移工為主題的書寫作品。

移工書寫，如同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的勞工文學，也可以區分成狹義的外籍移工自己創作的文本，以及廣義的還包含台灣作家以外籍移工為書寫主題創作的作品。亦即若從作者身份別為標準，移工書寫分為兩種，一為外籍移工自發的創作，二為台灣作家的創作。前者可見於移工之間閱讀的報紙，如：四方報等，但最主

²⁷ 資料取自行政院勞委會「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http://statdb.cla.gov.tw/html/mon/212020.htm> [2010/4/5]。

²⁸ 如同藍佩嘉（2005）研究指出，「外勞」一詞多有負面貶抑的他者之意：「『外勞』一詞正式出現在八〇年代後期。……純就字面上的意義，此詞彙應該涵蓋所有非中華民國的勞工，然而，言外之意具有特定的階級與種族意涵，指的是來自於東南亞『低度發展』國家的低階藍領勞工」（9-10）。因此越來越多學者提倡以「移工」一詞，代替「外籍勞工」：「外來移工（Migrant Workers），即一般所俗稱的『外籍勞工』（Foreign Workers）。因為『外勞』一詞有隱喻優劣之別、他者之意，所以近年來諸多學者和相關團體倡以不具歧視性的『移工』稱之」（王雅萍，2007: 81，註122）。因此本章我也以「移工」一詞取代「外籍勞工」，並稱「移工書寫」而不用「外勞書寫」。

要的是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外勞詩文獎》作品；後者為少數勞工文學作家，如：陳秋見、童偉格的短篇小說，不過其中知名度最高的，還是顧玉玲，在 2006 年獲得台北文學年金的長篇小說。

「移工書寫」不同於「勞工文學」之處，除了書寫主題或書寫者的改變之外；還可以發現，過去「勞工文學」承繼台灣南部農工文學與鄉土文學的脈絡，與主要在台北市政府提倡下，以台北為中心的「移工書寫」，似乎形成了一南一北的差別。我認為這一方面可能代表過去南北階級的差異，已轉化為台北都會內部的階級差距。也就是說，如同黃慧鳳 (2007) 所指出的，台灣 70 和 80 年代勞工文學的興盛，是作家為了控訴當時台灣缺乏合理的勞工政策與制度，為南部加工出口區長期遭受不平等剝削的勞工發聲；然而，在 1984 年勞基法實施、1987 年解嚴並成立「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問題有了權責機關，勞工也有了罷工權與自組工會權，南部勞工問題可尋正常管道解決，致使 90 年代以後「勞工文學」失去原本為勞工請命的責任而消失。顯示「勞工文學」從興盛到消逝，代表南部勞工問題從嚴重對立到逐漸趨緩的過程。而在南部的勞工問題趨緩之後，2000 年以後在台北出現的「移工書寫」，也就表示階級差距的衝突，從南部台灣勞工轉移到台北都會內部的外籍移工上；「移工書寫」就像 70 和 80 年代的「勞工文學」一樣，是為都市內部大量缺乏平等合理待遇的外籍移工發聲。

但另一方面，這又顯示台北出現更為開放包容的移工政策，才能支持「移工書寫」形成。因為在 2000 年台灣政黨輪替造成外勞政策緊縮：民進黨政府實施每年縮減 15000 名外勞措施，2001 年規定營造業新標案全面禁用外籍移工，並限縮外籍看護工的申請資格，將外勞視為本勞失業的元兇；甚至將外勞政策當作外交籌碼，沒有考量移工工作權益與國內僱用移工的大量需求，先後對菲律賓、印尼和泰國政府凍結外勞輸入之際 (龔尤倩，2002)。台北市卻相反地試圖營造一個對移工友善的環境，2000 年起馬英九市長與勞工局長鄭村棋等人，開始推行各項外勞政策，包括：成立外勞諮詢中心、印製「外勞 E 通訊」、「外勞宣導手冊」、開播

「HELLO TAIPEI」外勞電台節目、外勞庇護中心、外勞文化中心等。除此之外，還有各項文化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勞詩文獎》活動—「移工書寫」的主要類型之一 (龔尤倩，2002)。亦即，台北催生出「移工書寫」，代表著作為首善之都的台北，在移工政策上比中央政府要更開放進步。

若進一步探究台北市政府推行的外勞政策，和《外勞詩文獎》活動的相關論述，可以發現背後隱含對台北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例如：2001 年印製的《外勞文化地圖》就是列在台北市政「多元豐富的都市文化」的項目下。而《外勞詩文獎》市長寫的序言，也總是用多元文化的城市想像，將移工涵納於其中：「臺北市為台灣的首善之都，更是個人文薈萃之地，各個不同國家的外籍勞工朋友為了生計匯聚於此，...這本外勞詩文選集的印行，能引發更多人對外勞的關懷，...，以使本市成為多元文化薈萃的國際城市。」²⁹、「『臺北市外勞文學獎』，提供外勞朋友文學經驗更廣的舞台，...使臺北市成為多元文化，人文薈萃的健康城市。」³⁰等(粗體為筆者所加)。就像王志弘 (2003&2004) 所說的，90 年代中期以後，多元文化就開始成為台北市政府文化治理的主要特色之一，將客家、外省眷村、原住民、青少年、兒童、同性戀、勞工和外勞視為城市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移工書寫」的出現，正好應證了全球化台北出現了多元文化的跨界想像。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多元文化想像似乎還突破了過去多元文化以公民權為限制的批評。我在第一章文獻回顧中曾整理到，趙剛 (2006) 認為目前的多元文化想像，並未涵納公民權外的他者。他認為美國對於「外國人」的想像都只停留在專業技術移民上，那些遠方來美國打工的勞工群體，完完全全沒有進入到他們多元文化的思辨裡；而台灣也是，在民進黨政府的多元文化論述中，只包含到外籍配偶，卻將外籍移工排拒在外。也就是，他批評不論是美國或台灣，非專業且沒有公民權的移工，總是沒有進入多元文化的想像中。然而，我卻從台北市政府，

²⁹詳見：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2005) 第五屆外籍勞工詩文選集，8。

³⁰詳見：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2006) 第六屆外籍勞工詩文選集，8。

以多元文化論述推動「移工書寫」的過程，似乎看到一個將非公民身份、底層階級的外籍移工包含於其中的，更開放包容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就像郝龍斌在《第七屆外籍勞工詩文選集》的市長序中所說：「從情感層面來看，我願以『市民』的身份來看待他們」⁽⁶⁾。

第二節、《外勞詩文獎》作品

然而接下來我將選取「移工書寫」的代表文本，藉由文本分析指出這看似更包容開放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如何存在文化本質論，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至也沒有擺脫公民權界定，進而還是衍生了區分台北與外籍移工的邊界。

而首先我必須要說明，雖然如同第一章我說明的，本論文因時間篇幅限制，主要針對小說作品從事文本分析。然而《外勞詩文獎》在「移工書寫」類型中，作品量最豐富、最廣為人知，且制度運作最完整（一年舉辦一次）；所以儘管它的書寫形式為詩歌、短文，我也必須要討論這個最具代表性的「移工書寫」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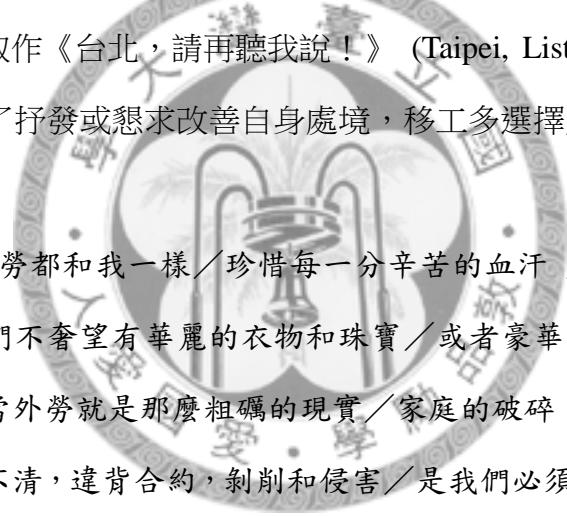
根據龔尤倩（2002）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對外勞政策所作的行動研究指出，2001 年開始舉辦第一屆《外勞詩文獎》，目的在於扭轉社會大眾將外勞視為「暴動」、「搗亂份子」或「說謊耍詭計」等污名，龔尤倩訪談當時台北市的勞工局長鄭村棋，他表示：「從認識外勞是有文化的，而且文化不見得比我們差，甚至有些還是我們台灣社會所沒有的！這樣一步一步讓外勞在文化上出現主體，提昇外籍勞工在台灣的社會位置」⁽²⁶⁸⁾。簡言之，《外勞詩文獎》活動是要讓民眾認識外勞文化的可貴，反轉一般將移工經濟弱勢等同於文化弱勢的成見；並且，讓外籍移工可以不用間接透過記者、社工等「代理人」發言，直接藉由自身創作向社會表達自我。

可是若綜觀 2001 年到 2010 年以來，這十屆的詩文作品，我將指出看似是多元文化跨界想像已經出現，進而催生的「移工書寫」；其實隱含移工與台灣／台北

高低階級的差異，以及移工與台灣／台北間文化本質有高低的意識形態；另外「女性特質」被用來表示成「好外傭」工作專業、付出、守分紀的特點，其實是服膺於新自由主義主張「彈性勞動力」，將勞工自身呈現為「勞動力」而非「人」的思考邏輯。在此文化本質論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下，台北多元文化跨界想像，仍然在衍生區分什麼是外籍移工，與什麼是（台灣）台北的邊界。為了進一步證明此論點，下面我分成三部份說明：

一、強調移工卑微的社會位置

首先，因為《外勞詩文獎》最主要的初衷，就是要讓移工自己向台灣社會發聲，第一屆詩文選集取名為《台北，請聽我說！》（Taipei, Listen to me!），自第二屆起，又全部再取作《台北，請再聽我說！》（Taipei, Listen to me!）。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了抒發或懇求改善自身處境，移工多選擇用卑微低賤的語氣創作：



.....／所有的外勞都和我一樣／珍惜每一分辛苦的血汗／那是家鄉生存和未來的希望／我們不奢望有華麗的衣物和珠寶／或者豪華的物質／那會讓你再度變成奴隸／當外勞就是那麼粗礪的現實／家庭的破碎，寂寥，痛苦和無奈／難道你還看不清，違背合約，剝削和侵害／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台灣，請聽聽我的哭聲和祈求／台灣，請尊重我的人權和尊嚴／在你繁榮的土地上有我的汗水／我要的只是一點點，一點點的公平

〈外傭淚〉第一屆外勞詩文獎 第二名 Estrella De Castro)

如同在這篇詩作中，就可以看到移工將原本合理的希望，寫成貪婪的「奢望」；還將「台灣」重複放置在詩文末段的句首，呈現如同對神明呼喊的語氣；並且在最後一句把移工自己訴求被合理對待的心願，改為對崇高位階者的「祈求」一詞，連與台灣人相等的公平也不敢要求，只求「一點點，一點點的公平」。

這樣低賤卑微的再現方式，不斷重複的出現在之後每一屆的作品中：

.....／請看看我們的臉孔／我們期望的只是一點關懷／請看看我們的眼神／
我們只希望有你溫柔的對待／.....

〈外勞的心聲〉第二屆外勞詩文獎 佳作 Siti Munawaroh

如同上面這篇〈外勞的心聲〉中連續用兩次「請看看」，來表達祈求式的語氣，而下面這篇〈最後一撇〉用聲聲呼喚的方式，把「台灣」置於句首，以「您」來指稱「台灣雇主」：

我們只是奴僕／台灣，請聽我們細訴／睜開您的雙眼，看著我們！／用您聾背的耳朵，仔細傾聽／我們同為人類，有心又有情！／.....／我們奢求的不多／只因我們只是單純的異鄉客／契約上之條款，無論如何，我們都會遵行／只為了讓您看到我們的誠意／.....

〈最後一撇〉第三屆外勞詩文獎 佳作 Leny S. Veluya

不過，移工們這種利用降低姿態，來呼籲獲得公平對待的自我呈現，其實往往也是承認移工本質上比台灣位階低賤，如：〈最後一撇〉中，開頭就先寫「我們只是奴僕」。或是下面〈野草〉文中，用野草來比喻自己的身份：

野草，是一種生命的寫照／在異域發芽生長／最初的枯草，遭人踐踏／蛻變成新鮮青綠，在異域／“家庭幫傭”是他們對我的稱呼／在此地台灣／低級、粗鄙，他們這樣說我／掃帚與抹布，是我所能擁有的／清潔廁所，是我僅會的／.....／“野草”自有其用處／動物食之，將不再飢餓／幫傭如我，雖外表不美／我仍能貢獻所能，給予所愛的土地／幫傭、野草，彼此相同的／....

〈野草〉第五屆外勞詩文獎 佳作 Ellen Panaligan

這首詩的意思雖然是要表達儘管移工低下，也能有所貢獻，頗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勉勵之意；但卻也是先以任人踐踏的野草來定義移工低賤的社會位置，將外傭再現為比台灣人低等的階級身份。而詩文中台灣雇主、仲介和官員們與外籍移工在社會階級上的差異，甚至被轉借為移工生性鴛鈍，而台灣天生聰慧、的區

別：

.....／喔...先生 太太 雇主／喔...幹練設計規定的仲介／喔...有權力的勞工
局先生小姐／.....

〈自由日〉第八屆外勞詩文獎 佳作 Kaminasih

像這篇〈自由日〉寫到：「喔...先生 太太 雇主，喔...幹練設計規定的仲介，喔...有權力的勞工局先生小姐」，就透漏將掌握移工制度設計權力的仲介，視為是比移工還要聰慧精明的人。

二、凸顯台灣／台北的文明進步

詩文中除了是以台灣人比移工位階高等的方式呈現外，移工與台灣社會之間，更往往被歸類為落後與先進文化的差別：

臺灣，喔！臺灣，猶如美女花枝招展／我的心為你忐忑不安／喔！臺灣！請
不要讓我空留遺憾／.....／我會擁抱您 如同您對我的擁抱／我會真心的 愛
您，如同愛我的家／我吸收您的文化，接收您的栽培／相信我，我將會加
倍回饋／孤獨的時候，我想得到您的恩典／.....／我像一個小孩渴望母親
的懷抱／然而此刻卻只能無助的祈禱／喔！我最親愛的臺灣，在這個夜裡，
／請聽我細訴／....

〈臺灣，一個讓我築夢的國度〉第二屆外勞詩文獎 第二名 Blessie B. Landongin 像是這篇名為〈臺灣，一個讓我築夢的國度〉的作品，其主旨一方面「祈禱」台灣能給它多一點關愛，並且把台灣至於上帝一般能給她「恩典」的地位，另一面則將臺灣視為能給她文化栽培的地方，暗示臺灣與移工在文化發展上有落差。以及下面這篇〈兩位慈母〉：

不同言語、不同國度／幸福哉！雇主體諒／工作未熟稔的過錯／溫馨指導我
如慈母／慈母，我真的離開您了／我身邊又添了新母親／.....／越南慈母、
台灣慈母／兩位都是我愛的母親／.....

〈兩位慈母〉第七屆外勞詩文獎 第三名：作者：范氏祥
有時候如〈臺灣，一個讓我築夢的國度〉和〈兩位慈母〉文中的敘述，台灣對移工的開化與教導，被形容宛如他們的「再造父母」。而更多時候，臺灣和台北的文明進步被不斷強調：

有一些事我無法忘懷／第一次見面時的紳士風度／當時—我被你的翩翩舉止吸引／儘管我還沒認識你／你穿著入時／每個地方看起來都清爽宜人／看起來光澤耀人／且有雄偉的建築物／我送你一首詩／給台北／在彈丸之地的重要部位／……／果然／我愛上了／一個城市／……

〈我戀愛〉第五屆外勞詩文獎 優勝 Eka Putriyani
如這篇〈我戀愛〉的詩作，就以「紳士風度」、「翩翩舉止」來比擬台北人的文明有禮；「清爽宜人」、「光澤耀人」來形容台北乾淨整潔的市容；而「雄偉的建築物」則隱含對台北經濟繁榮的稱羨。

而下面這篇名為〈夜晚之圖畫〉的作品，除了凸顯台北人的守法有秩序，以及環保概念外，連台北人的道德感也似乎高人一等：

瓶瓶罐罐回收分類／勤做分類真有秩序／回頭遙望遠處廟宇／兩位和尚身穿袈裟／慈善捐贈（阿彌陀佛）／幫助老人孤苦伶仃／……／我已融入此處生活／心中猶如落葉輕鬆／憂愁煩惱隨風飄逝／卑微孤單不會再現／人生路途更有信心／台灣寶島好山好水／替我說聲衷心感謝！

〈夜晚之圖畫〉第七屆外勞詩文獎 佳作 阮式海霞
這首詩主旨是在描寫台北夜晚的街景，卻是以歌頌的語調，一邊讚嘆市民對資源回收政策的遵守，一邊讚揚宗教團體的樂善好施，並在文末感謝臺灣讓他融入了進步的生活。

這類敘事，將台灣比喻成諄諄教誨的「母親」，或讚嘆台灣／台北的繁華進步、整潔有序，其實都是隱藏外籍移工與台灣／台北在文化本質上，落後與文明二元的分類。像曾嬿芬所指出的「種族化的階級主義」(racialized classism)，外籍移工

在台灣的職業分類，無形中被與族群分類混為一談（藍佩嘉，2010）。

三、以「勞動」再現移工

接著我要說明詩文中，外籍移工多是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以「勞動力」形象再現，而非包容於台灣／台北社會的「人」。

其中，首先移工被凸顯勞力能透支付出的形象，而其往往又是被用「女性特質」的期待來比擬。亦即，可以看到移工常以「母職」的角色，包括：母親、妻子或女兒、孫女等自比：

自從你出生 直到你能思考／我守護著你 紿予你所有的愛／將你視為己出／
如果可以／我願意為你奉獻我的生命／你不安時／可在我的懷裡找到安祥／
蚊蟲別想碰觸傷害你／你若有病痛／我感同身受／我喜悅／當你呀呀學語／
當你高亢發笑／……

〈如果我是你的母親〉第九屆外勞詩文獎 第二名 Emilina Velasquez

像這篇〈如果我是你的母親〉，就描寫自己把雇主的小孩，視為己出。用自己發揮於極致的母愛，來形容她對這份照護工作的投入。

或是下面〈見面與分離〉文中，移工將自己再現為「孫女」的角色，描寫其把照護者當作自己的「阿公」，像對親生祖父般的克盡孝道；在其病重時，細心的照顧，即使「睡眠不足也沒關係」：

……／阿公，／我從早到晚照顧你／睡眠不足沒關係／……

〈見面與分離〉第五屆外勞詩文獎 優勝 Imroatus Solehah

這樣不論是像母親一樣，願意為雇主小孩奉獻生命；或是像孫女一般，情願為被照顧者犧牲睡眠。都是以「好女人」行為，來表達「好外籍移工」形象，用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來呈現移工對家務、看護工作這種「愛的勞動」³¹的盡力付出³²。

³¹ 藍佩嘉（2010）指出：「照顧小孩不只是一種體力勞動，也是一種『愛的勞動』。雇主除了希望家務移工可以照顧孩子、幫忙沐浴、餵食、托育等，也期望她們能將愛、感情與承諾投注在孩子身上。……女主人轉包至家務移工身上的不只是工作，還有社會加諸在女性之上的家務勞動期望；她們希望市場代理人可以協助完成自己妻子、母親與孝媳責任」（157）。

換句話說，移工往往只是以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而非以「人」的方式再現。

移工也以女性貞操觀來再現其只能是家庭勞務身份，而不會僭越女雇主的地位：

.....／身體疲憊不堪／我試著站起來四處看／有時候惡魔在耳邊輕聲呼喚／何不去出賣靈肉？可以輕鬆賺大錢／返鄉時還可以打扮美麗如天仙／聽到美麗的誘惑一句句／但我的心仍努力抗拒／划啊...划啊...／我要努力划到岸邊／雖然辛苦但不會覺得低賤／我的心情坦然 感覺平安／.....

〈我的抉擇〉第二屆外勞詩文獎 第四名 Laelatun Anisa

幫傭請不要害羞／幫傭不一定身上有異味／我們也還有不少的優點／特別是好幫傭／幫傭請不要害羞／我們的不凡經歷／提供了很多新知識／讓大家有更多的新鮮事／幫傭請不要害羞／雖然我們沒有多餘時間／來擦口紅裝扮自己／但內心的良善勝過脂粉／但是當幫傭一定要害羞／不可犯下淫亂的錯誤／不要銷售自己的美麗／而任意解開衣袖／.....

〈幫傭〉第四屆外勞詩文獎 優勝 Linda Roslita

第一篇〈我的抉擇〉就是用一般良家婦女不出賣靈肉的決心，形容自己雖然不能賺大錢，也不能有漂亮的打扮，卻是無愧於心，品格無瑕的外籍移工；而第二篇〈幫傭〉則一邊勉勵移工應該以自己的工作為傲，一邊叮嚀移工們不該展現女性的美麗。外籍移工這樣以女性貞操的道德觀，作為對自身工作專業堅持的修辭，事實上是在順應雇主或仲介，對家務移工「去女性化」(defeminized) 與「去性化」(desexualized) 的要求 (藍佩嘉，2005)，將外籍移工視為家務「勞動力」，而非也具有女性吸引力的「完整的個人」，以確保外來的家務工不會成為家庭的威脅。

³²若細究一到十屆的《外勞詩文獎》得獎者的性別，可以發現只有零星的男性移作品獲選：第一屆有三位，除了第七屆、第九屆以及第十屆各一位。我認為這可能顯示當「好外傭」形象是被以「女性特質」期待時，可能還讓更多男性外籍移工陷入無法被再現的困境。

其次，外籍移工也將自我呈現為不會混入台灣社會的勞動「即期商品」³³。我們可以看到，詩文中反覆用「不能逃跑」來證明自己是個光明磊落的好外勞：

.....／然而...聽到吵鬧的搖滾樂／有時惡魔在噓語，耳朵也跟著唧唧響／充滿誘惑的言語／嘿...逃走吧，到旁邊的仲介公司／回家時會更有錢也更苗條／我告訴自己，這是騙局，不重要！／上帝呀...希望我的毅力不被倒退／在我永遠躺下來之前／我都會繼續忍住／.....

〈外籍勞工〉第六屆外勞詩文獎 詩文佳作 Ratin

逃走的念頭被譬喻為不道德的「惡魔在噓語」，「在我躺下來之前，我都會忍住」，隱含移工誓死都會堅守只作為一名外籍移工的身份；再辛苦也要克制自己不可能脫逃混進台灣社會，被當作移工道德的標準。這樣類似的形容持續在下面詩文中出現：

.....／不要幻想／而聽從不好人的引誘—／幫忙找工作，薪資又多又沒艱難／各位勞工朋友請不要相信／那是不實之謊言／朋友們要切記／善良人一輩子光榮／逃逸將被逮捕／從此沒了工作／錢沒了、嘆息又迷途／不只影響越南一國家聲譽如何是好／.....

〈幫傭之歡樂〉第五屆外勞詩文獎 佳作 Nguyen Thi Hien

在我的監牢裡／充滿了泥土和灰塵／手被工作緊拷著／腳被綁住／被折磨的心，不可以提出抗議／.....／我不在乎／雖然...／很多誘惑／在眼前／對我來說...／你的自由是無形的！／你的自由是欺騙！／充滿陷阱的自由／我已過了一年／在台北監牢／我的耐心被考驗／現在／笑容滿臉隨著自由來臨／.....／而我／是我國的英雄

〈人質〉第七屆 優勝 Susiani

³³劉梅君（2000）曾指出台灣的外勞政策將外勞視為「不自由」的「即期商品」：「很明顯，外勞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一種特殊商品是『不自由』的.....在現行外勞政策下，外勞作為一種勞動力商品，除具有較本勞更不自由的特徵之外，也同時具有一種『即期』商品的特質：期限屆滿即需拋棄，...期滿即需離境的規定.....」（78-79）。

上面這兩篇詩作中，不論受盡怎樣的虐待也都不逃跑的堅持，不但被再現為個人道德的判準，還成為為國爭光的明證。前一篇〈幫傭之歡樂〉就提醒其他外籍移工不逃跑，才是「善良人一輩子的光榮」，更沒讓祖國越南丟臉。而後一篇〈人質〉也將逃跑形容為「誘惑」或與「陷阱」，並描寫自己忍耐堅持，終會成為國家的英雄。

這些以「勞動」再現外籍移工的方式，其實「把外勞作為一個人的完整性，進行不人道的切割」（劉梅君，2000：71），隱藏著新自由主義主張「彈性勞動力」，把移工視為「客工」的觀點。也就是說，外籍移工只被當作生產機器與市場商品，台灣社會要的只是他們帶來的經濟生產力，卻沒有要看到他們其他社會需求（劉梅君，2000），像是：化妝打扮或是轉換雇主自由的需求。「客工計畫的設計乃在為一個國家增加勞動力的同時又不會增加永久性的人口」（Martin, 1997: 483）。所以以此邏輯看待外籍移工，只是將他們抽離於台灣的社會脈絡，顯然還是將移工排除在台北的邊界之外。

藍佩嘉（2007）曾指出，近來已有不少民間組織開始推動以移民與移工為主的文化運動，藉由寫作、詩歌、攝影等文化實作，讓新移民積極發聲，她認為這也許能使移工確實成為多元文化的行動主體。然而藉著文本分析，我卻發現台北市政府舉辦以移工為書寫主體的《外勞詩文獎》，外籍移工卻仍是以台灣社會的「他者」形象呈現。我認為其中可能的原因，其一，有評審篩選的因素，因為外勞詩文比賽的評審每一屆都是臺灣詩人或臺灣社會工作者，而沒有菲律賓籍、印尼籍等外國詩人，或是外籍移工參與評選運作，所以很可能一再用台灣人對移工固定想像，去決定獲獎作品。其二，也可能是翻譯時被重新潤飾而更改了意義。因為移工是以各自的母語創作投稿，收集稿件後主辦單位勞工局還會請人翻譯成中文，再請評審評閱，這其中牽涉了很多翻譯語言和潤飾語氣的過程，原作者原本

想表達的意義，很難如實呈現。³⁴其三，這也很可能是外籍移工為了討好評審或一般民眾，刻意類「自我東方化」的展演（邱貴芬，2003）。也就是如同邱貴芬（2003）以紀錄片為例，指出被拍攝者可能透過鏡頭來表演他對拍攝者的想像的回應，移工也很可能是為了滿足社會讀者對他們角色的期待，反過來表演給我們看。

因此，原本看似代表台北多元文化跨界想像出現的《外勞詩文獎》，文本中卻顯示所謂的多元文化仍然沒能脫離文化本質論，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而還是衍生了區分台北與外籍移工的邊界。

第三節、《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除了前一節所談的《外勞詩文獎》作品之外，另外具代表性的「移工書寫」作品為顧玉玲所寫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此書獲得第九屆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被稱為「台灣第一本以移工為主體的文學記錄」³⁵。2008 年由印刻文學出版後，隨即獲得各方好評與迴響，到 2009 年一月就出了三刷，網路搜尋至少有三十幾頁相關的結果，榮登金石堂網路書店、三民網路書店等暢銷排行榜，並且榮獲 2008 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大獎以及《亞洲周刊》2008 年中文十大非小說好書獎。

不同於前一節《外勞詩文獎》作品，移工本身或評選機制無意識的潛藏文化本質論或新自由主義邏輯，而仍然衍生了劃分外籍移工與台灣／台北的邊界。龔尤倩在這本小說寫的序中所述：「透過沐子〔顧玉玲〕的筆一一劃開了這些污名／控制，這才清晰看見：原來我們都是人之父母、人之子女」（9）（括號中文字為筆者所加）。我認為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卻是有意識的要讓讀

³⁴ 參考寧靜海於奇摩部落格發表的〈《台北，請再聽我說！》請繼續說一回顧前八屆的感想及建議〉，提到：「因為我也曾經間接參與過潤飾的工作，如此一來，還真的有點給他『不公允』呢——因為，有時印尼文、越南文、菲律賓文……本意未必就是中譯者所想的那樣。」

³⁵ <http://tw.myblog.yahoo.com/jw!Es15hbGCGB5A0lFNru.gIAqh/article?mid=203&prev=-1&next=168&sc=1> [2010/5/4]。

³⁵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網站將《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一書，譽為「台灣第一本以移工為主

者看見，移工在台北經驗到的實質與想像的邊界，並且透過對邊界的質疑，試圖開創外籍移工可以成為「我們」的敘事想像。

這樣的寫作動機，來自於顧玉玲的職業與個人關懷。她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理事長，本身參加工運的歷史甚長，大學時代參加的文學社指導老師，就是長年從事社運的前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大學畢業後，參加野百合學運，後來全職投入工運活動，從自立報系工會秘書、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傷協會到現在的國際勞工協會。因此從事寫作，基本上都是為了工運，為勞工發聲的目的，就像在寫這本書之前，顧玉玲已經以另一個描寫逃跑外勞的短篇小說—《逃》，獲得第 28 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

然而，儘管顧玉玲從關懷外籍移工的立場出發，強烈的批判並質疑外籍移工在台北遭受種種邊界的不公，藉由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我發現其寰宇主義「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仍然很容易建立在新自由主義貿易消費的商品奇觀，甚至無法脫離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的批評，是以血統主義與「公民權」架構運作，以至於還是衍生將外籍移工排除在台北之外的邊界。

一、批判邊界

基於顧玉玲對外籍移工的關懷，小說中她讓讀者看見，並質疑各種區隔何謂台灣（台北），何謂東南亞移工的邊界。

她藉由第一章出場的外籍移工—密莉安的故事，要破除將「外籍移工／台灣（台北）人」視為「愚笨／聰明」的分類。描寫密莉安在舉止上會顯得傻氣，完全是由於語言的陌生：「她才剛來不到兩週，中文程度還只停留在：『會不會？會。好不好？好。要不要？要。』……。語言不通，所有的智識、才能、幽默感都無從表達，只能退縮回最又幼稚也最安全的微笑與傻笑」（18）。可是若到週日，在菲律賓人居多的聖多福教堂，語言熟悉的環境裡，密莉安就搖身一變成神采飛揚

體的文學記錄」，<http://www.tiwa.org.tw/nindex.php?itemid=270> [2009/12/15]。

的年輕女孩：「密莉安戀戀不捨和朋友笑著互相搶話，像高中女生喋喋不休；有時她皺著眉，也許是聽說哪個舊識被遣送回國了、……她平常在俊興街電鍍廠工作，穿著寬大的、多起污漬的運動衣褲、黯淡沉默。週日的她神采飛揚，特別漂亮。(38)」此處，作者還刻意描寫，在中山北路移工們流利的英文對談中，反而讓台灣人許晉溢顯得憨傻：「阿溢反而有點退縮起來。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夠好，……。他因為置身語言陌生的環境，不禁有點氣短而謙虛。換他傻笑與微笑」(38)。用這樣的敘事安排，告訴讀者若台灣人與移工置換環境，就會發現「愚笨／聰明」的分類，完全是不可靠的偏見。

而小說最後一章，以艾爾加和麗亞為主角的故事中，顧玉玲也要破除「臺灣（台北）／東南亞」就是「文化進步／蠻荒落後」的分類。例如：她去描寫艾爾加無法理解臺灣工人為何要使用米酒：「同廠的台籍工人會教他們使用一些藥酒，但他一聞米酒的味道就受不了，像馬尿。想到把馬的排泄物塗在身上，艾爾加就止不住要笑，這些，奇怪又熱心，很笨又裝聰明的台灣人」(196)。還去描寫艾爾加無法習慣台灣人吃的便當：「在菲律賓，沒有人把菜、肉、飯的味道都攬和著包進同一個餐盒裡，吃飯時混雜的氣味經常讓人食不下嚥，……」(197)。對他來說，便當把所有食物混雜在一起，惡臭的難以下嚥。另外又敘述艾爾加對台灣人愛種榕樹的不解：「他經過一個發育不良的榕樹，……。奇怪啊，他這樣想，台灣人把鬼樹種在工廠旁，不是很晦氣嗎？……」(198)。在這些描述中，顧玉玲特意要讓讀者發現，對彼此文化的誤解，才會形成那些過度簡化又歧視性的劃分。

作者除了努力的讓讀者瞭解，那些對外籍移工污名化的象徵畫界，還要讓讀者體會這些象徵界線，會進一步形成實質上法律和制度的界線。比如，在第一章，密莉安的故事中，顧玉玲敘述她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要求作健康檢查：「出關後，仲介就直接帶她們飛奔署立桃園醫院進行健康檢查。事實上，申請來台工作時，健康證明早就是必備文件了；確定被飛盟錄取後，再檢查一次；來台後，又檢查；此後每六個月，她還要不斷自掏腰包付錢健檢」(46)。並且立刻在下一段，為這

件事下註解：「健康檢查，不是確定你的健康，而是恐懼你的帶原；要確認你不髒，正因為打心底認為你是髒的」（46）。目的在於確認讀者都能理解，歧視與偏見這些象徵性的分類，是各種不合理的外勞政策背後的基礎。

接續，顧玉玲更強調以污名和偏見為基礎所制定的法規，已變成實質殘酷與荒謬的邊界管制。最主要的，她凸顯外勞不能任意轉換雇主這條法規，讓外籍移工遇到不良雇主時，只能選擇隱忍或是逃跑：「如果有路，需要逃跑嗎？逃跑，竟是自救的手段。而這還是比較敢於行動的一個」（143）；並且以第二章的主角喬伊和荻微娜為例，敘述逃跑成為「非法移工」（TNT），反而能獲得平等的工作權益：「之前她還是合法身份，無法轉換雇主，只有一再忍耐；現在，她可以辭，可以盤算等工期間沒有收入的損失，可以自主決定利害得失」（153）。

合法的外籍移工無法像一般台灣人一樣，擁有在勞工市場自由流動的權力；反倒是踰越法律規範成為「非法移工」，才能換得一點平等與自由。然而這些因邊界管制而出現的「非法移工」，又因此遭受都市各處空間邊界的隔絕排除。如小說中，顧玉玲一再的用「鴿籠」來比喻卡洛琳和荻微娜成為非法移工後，在台北的生活空間：「在一整排木板隔間如鴿籠的三樓，我很快找到卡洛林的房間以及她的室友貝蒂。（159）」「這裡是鴿籠般的雅房，每層樓就有十間房，狹長的舊式格局，大半房間都沒有對外窗戶……」（172）（粗體為筆者所加）。用「鴿籠」不單指房間的狹小擁擠，以及如牢籠般無法自由通行的狀態，更凸顯被邊界隔絕於外的移工，不能為「人」的比喻；讓人看到在《蛋白質女孩》那些跨國精英階級暢行無阻的城市空間外，底層移工處於重重邊界、非人生活的台北。顧玉玲還巧妙的運用 101 這個數字，描寫移工麗亞、被她照顧的阿嬤，與跨國經理階級之間的區隔：「**台北 101 大樓**，灰濛濛像一疊堆高的茶杯，滿溢出終年晶亮的頂環，生機勃勃。全世界最高的大樓，這個距離看來只有一根手指頭的長度，他從沒有機會近身。而他日夜照顧著一零一歲的阿嬤，生命氣息微弱難辨」（221）（粗體為筆者所加）。將象徵跨國資本與跨國經理人的台北 101 對比移工麗亞照顧的「一零一歲的阿嬤」。同

樣是「101」數字代表的台北，但一邊是一百零一層「生機勃勃」的高樓，另一邊卻是「一零一歲」老人垂死的狀態。以「生」與「死」，暗喻都市上下階級生活空間的分界。

二、無法超越「公民權」的多元文化

小說《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主要分成三個章節，分別為：〈我們〉、〈飄浪之歌〉和〈問長路〉，我認為從故事章節的安排來看，後兩章〈飄浪之歌〉與〈問長路〉目的在凸顯台北對移工種種邊界區隔的殘酷。因此其中主要記敘著許多外籍移工被迫逃跑成為「非法移工」，甚至被遣返出境的過程；雖然中間穿插了一個性格過份樂觀的身障者，如《笑傲江湖》中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令狐沖：「令狐沖本姓王，朋友都稱它王哥，但他對我說：『你就叫我令狐沖吧！《笑傲江湖》那個有沒有？我的個性就像他一樣，大口喝酒論江湖！……』」(215)，與其外籍看護之間，從不諒解到相互理解：「新的友善將要從舊的惡毒中解放出來，……」(260)，「面對鎂光燈，他 [令狐沖] 還是說：『我已經原諒她了，伊達人很好……』」(302) (括號中文字為筆者所加)，預示台北出現真誠「無條件的悅納異己」的可能；但其實反過來說，卻顯示作者顧玉玲預設了若不特意描述身障者令狐沖的豪邁開朗，台灣雇主與外籍移工不分我他、友好包容的劇情難以取得讀者信服。亦即透漏如果沒有擁有超乎一般人樂天開朗的個性，對外籍移工「無條件的悅納異己」，幾乎難以實踐。

唯有擺在第一個章節的〈我們〉，主要是敘述台北／台灣社會對外籍移工的包容接納，如同章節以及小說的標題，故事裡的外籍移工密莉安最後成為了「我們」³⁶，凸顯出多元文化的跨界想像。然而，接下來本節我從第一章節〈我們〉的小說敘事中，發現這「悅納異己」的理想，與多元文化的跨界想像的問題在於，其不是如同「精英式寰宇主義」建立在貿易無邊界或跨國精英身分上，就是無法脫離

³⁶也就是《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小說所強調的：「看似『他們』的異鄉人，映照著我們島嶼的人們：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勞動與掙扎，『他們』就是『我們』」(10)。

國族血統主義和「公民權」的體制。

因為首先她採取的敘事策略，是要讓讀者認同「悅納異己」的精神，與多元文化的現象原本就是台北的特質。小說開頭的定調，便是描述台北發展的歷史，一直都是「悅納異己」概念的實踐。「這些島內先來後到的移民，或是南部賣了田地帶著妻小來討生活、或是東部沒有出路的年輕人、或是農村女孩成群結黨來找工作……每個人都帶著無窮的夢想與具體的需求，向台北移動」（17）。台北本身就是吸納島內各處移民，幫助追尋夢想的城市。然後藉此類比，隨著時代演進，當代台北成為外籍移工的棲身處：「直到近十年來，老舊的廠房又開始有人進駐。他們是新一批的都市移民，跨海越洋而來，……都與三十年前南部來的年輕人有幾分神似」（18）。以投射出現在所謂的台北人與外籍移工，只是先來後到的遷移過程；台北本來就是個移民城市，既然過去能「悅納異己」的容納城鄉移民，那麼現在要對外籍移工「悅納異己」，也不乏先例可循。

接續，小說下一節〈中山北路三段〉，回溯男主角許晉溢的母親，作為 60 年代到台北打拼的城鄉移民，體認到台北「悅納異己」精神的實踐，使其過去就已經展現為各種異國文化的大拼盤。「那年代、所有時興的、外來的、最有風頭的東西，都集中在中山北路。……沿途，都是大使館、領事館、咖啡廳、酒吧、飯店，出入大半都是金髮白膚的洋人……在那個禁制出國旅遊的年代，所有罕見的舶來品幾乎都是美軍或家眷夾帶來寄賣的，每樣東西都稀奇精巧，價錢貴的不得了。福利麵包店、聖多福教堂、汗青旗袍店……走馬燈似的櫥窗，中山北路三段漂浮著舊官仕派頭、與異國租借地的混雜氣味，…」（32）。但是，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於昔日台北就已涵納跨國文化的描述，仍然著重於異國風情的消費景觀，這種透過貿易商品創造的跨界想像，只是如同 Ghassan Hage (2000) 批評的「寰宇—多元文化」（Cosmo-multiculturalism）。

而且〈我們〉主旨描述菲律賓移工密莉安與台灣勞工許晉溢由相戀到結婚故事。可以注意到顧玉玲在這章故事裡，要強調外籍移工密莉安在原生國家的高社

經階級。將密莉安的原生家庭，描寫的比臺灣勞工許晉溢還優渥：「相較於同時間在嘉義朴子許晉溢家庭的低落與貧困，密莉安的家庭，無疑是菲律賓社會裡稍具條件的，得以掙一點儲蓄或借貸抵押，以盤算更好的出路。……」（43），並且敘述密莉安從小成績優異：「排行老五的密莉安，成績總保持在全校十名內，國中時就領有德國的獎學金，…」（44），在菲律賓更是有高薪工作的都會女子：「密莉安順利搶到一個不錯的銀行工作，月薪七千披索。這算是很好的差事了，令人稱羨」（44）。

因此故事中這生活富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密莉安，來臺灣成為外籍移工的過程，只是誤觸陷阱的結果：「新工廠什麼樣子？新老闆什麼樣子？新同事與台灣人什麼樣子？她腦裡忍不住描繪未來的景象：精密科技空調大樓、玻璃旋轉門、全自動作業流程……啊！台北」（46）。密莉安滿懷期待到飛盟電子公司，當一個高科技業的作業員。卻不料飛盟公司惡意倒閉，密莉安只好被迫轉換到台北縣俊興街的小型家庭代工廠，從事骯髒且勞力吃重的工作：「密莉安從高科技電子業的全自動生產，一夕之間轉換到俊興街的家庭式電鍍作業；……電鍍廠裡老式的機器笨重粗大，下物料、調染色、扛重物，都不是輕鬆的差事，起放間就是很大的體力勞動，她個子嬌小、瘦弱，更覺吃力」（26）。在這樣的敘事安排下，讓密莉安看來不像個灰頭土臉的勞工，反而像是個「落難的公主」；我認為，是由於顧玉玲巧妙的將底層跨國移工的角色轉化成跨國精英的形象，才得以去除讀者印象中「買賣婚姻」的疑慮，成就外籍移工可能與台灣人產生愛情。而有了愛情，雙方明確的畫界才有鬆綁的餘地：「透過『愛情』，透過急著讓對方多知道自己一些，彼此都開了新的眼界，看景看物都要牽連到自身的生命了」（53）。

不過，密莉安與台灣人得以消弭我他邊界的關鍵，還是被繞回了血緣與「公民權」架構。密莉安與婆婆陳淑華相互理解的方式，是透過血濃於水的孫子：「我知道密莉安一句也聽不懂，但她識得這個口氣的親切、同情、與理解。她於是抱起剛滿月的孩子，貼近淑華：『阿嬤抱抱，好不好？』淑華抱過孫子：『做人，我

沒在分台灣外國的啦。雖然是外國仔，就是有困難來台灣討生活，咱就要更加疼惜』」（35）。密莉安聽不懂陳淑華講得閩南語，無法與陳淑華溝通，但藉著密莉安與許晉溢生下的台菲混血的孩子，世代差距，語言、文化的隔閡都能輕易跨越。

〈我們〉的最後一節〈我現在不一樣了〉的標題，表示密莉安從外人變成「我們」身份的轉變，而此轉捩點也是她與台灣勞工許晉溢有了共同血緣的孩子：「如今，密莉安抱著孩子：『我想我有妹妹，我現在不一樣了。』眼睛閃著光：『再有一點點不高興，看看妹妹我就什麼都沒關係了』」（85-86），彷彿有小孩的密莉安與台灣的「關聯」才不容質疑。「一如我所認識的很多外籍配偶，孩子是她們在異鄉的唯一血親，有了孩子，似乎與這塊土地、與這裡的人，才有了真正的關連，...」（86）；「是啊，異鄉人、觀光客總是躍躍欲試。但她現在有了孩子，整個人與環境的關係變得從容、綿長了，有一輩子的時間慢慢來。」強調因為孩子是密莉安「在異鄉唯一的血親」，透過血緣的聯繫密莉安才不再是「異鄉人」、「觀光客」。

我認為作者描述密莉安與許晉溢相戀、結婚到生子的過程，呈現密莉安從外籍移工、外籍配偶，到新台灣之子的母親，才得以說出一個讓外籍移工成為「我們」的故事。顯示這多元文化的跨界想像，仍然沒有超越學者的批評，而架構在血緣與公民權身份上。因為作為一個漢人華人為主的社會，台灣公民身份的取得，也就是決定「誰有權變成台灣人」，是採血統主義原則，即對主張（真實或想像）的共同祖先或血緣聯繫的人，才予以容納（成露倩，2002；趙彥寧，2003；夏曉鵠，2005）。所以故事中的密莉安不僅需要從外勞變外配，還必須盡到外配最大的生產力—傳宗接代，與台灣人（新台灣之子）有了血緣關係，才能成為「正港的台灣人」：「如趙彥寧（2004）所言，媳婦在父權家庭傳承子嗣的宿命，在此與種族化的族群政治相結合，要成為『正港的台灣人』，外籍與大陸新娘唯有透過成為『新台灣之子』的母親」（藍佩嘉，2007：243）。所以如果密莉安沒有成為外籍配偶、沒有生下血脈相連的孩子，就沒有取得台灣公民權的可能，而外籍移工成為「我

們」的故事也就無從說起。台北與外籍移工仍然以被血緣與公民權作為區隔我／他的邊界。

第四節、小結

本章我說明了繼承南部農工文學與鄉土文學傳統的「勞工文學」，在 2000 年以後逐漸在台北轉型為「移工書寫」。這項轉變，一方面顯示勞工問題已由 60 與 70 年代的臺灣南部，轉變為台北都市內部的階級問題，另一方面，卻又代表台北市政府出現比中央更開放進步的外勞政策，並可能開創了超越「公民權」界線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

然而，藉由我對兩種代表性的「移工書寫」—《外勞詩文獎》作品與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從事文本分析，指出外籍移工往往以「控制形象」被再現，如同藍佩嘉 (2010) 指出：「外籍工作者被投射出來的『控制形象』：野蠻人、壞人、妓女、受害者等，也許彼此之間並不連貫，甚至矛盾，但他們共同編織了一條種族化的界線，化分出『我們』與『他們』、台灣與落後的族群他者之間的不同」 (102)。而這些移工的「控制形象」顯示全球化台北出現的多元文化跨界想像，仍然是以文化本質論，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至國家公民權運作，這種「有條件的悅納異己」，進而還是存在區分台北與外籍移工的邊界。

第五章 結論

我們必須把新的全球化文化經濟理解為一種複雜的秩序。既互相交叉重疊又充滿斷裂與脫節的秩序...目前全球結構的複雜性在於，經濟、文化和政治之間發生了根本性的斷裂與脫節

— Appadurai, 1990:6

第一節、研究成果分析

全球化各種流動帶給界線與邊界研究新的挑戰，學者們紛紛著重討論「界線工作」的運作，和被劃界的雙方如何挪用與重作界線／邊界，他們關注的是畫界動態的過程 (dynamic of boundaries)：也就是界線或邊界如何被創造？強制施行？如何被支持維護？被毀壞，以及如何轉換其形式？(Pachuchi, Pendergrass & Lamont, 2007) 然而這並非本論文的旨趣，如果說本研究也是一種界線研究，我關心的是為何全球化帶給我們地理邊界不再重要的天涯比鄰的感覺，但又同時出現群體間和個人間不斷區分彼此的邊界 (Appadurai, 1990)，如同 Balibar 所說「邊界的搖擺」與「新邊界繁生」的矛盾。

雖然兩種「界線」與「邊界」在社會學上系出同源 (Lamont and Molnár, 2002)，但本研究特別強調「邊界」的概念，為的是凸顯地理空間的特性；也就是說去理解那些區隔台北是什麼？哪裡是台北？與誰可以被認同是台北城市使用者的問題。

我認為今天全球化城市邊界問題的根本，來自於我們想像跨界的方式本身存在瑕疵。當代的跨界想像隱含寰宇主義的地理空間觀，而如第一章文獻回顧的整理，不同類型發展的寰宇主義理念卻總是在新自由主義、國族主義或文化本質的意識形態下運作。因此我們以為台北與世界其他地方，或台北人與其他移入的人口之間，邊界已經模糊消弭的跨界想像，事實上正在為台北衍生新的邊界。

研究中我藉由 2000 年後台北城市書寫現象，觀察到作為全球化城市的台北，出現「精英式寰宇主義」、「分層式寰宇主義」與寰宇主義的「悅納異己」和「多元文化」，三種型態的跨界想像。其中第二章我首先觀察 2000 年後以出現王文華《蛋白質女孩》系列為代表的「台北時尚書寫」現象，是一種精英式寰宇主義想像，再從學者們對《蛋白質女孩》的台北故事如何暢銷於對岸上海的討論，觀察到台北上海城際區域連結下，分層式的寰宇主義想像；並且說明台北精英式寰宇主義，是台北上海分層式寰宇想像的基礎。另一方面，學者認為書寫中台北正面形象出現，代表了全球化台北正在消弭各種畫界的說法對話，指出當代台北精英式的寰宇主義想像，隱藏著新自由主義邏輯，而衍生了台北空間與台北人身分新的邊界。

第三章我整理「兩岸書寫」的脈絡，發現故事類型從原先「反共懷鄉」的主題，轉變為「台北上海愛情故事」，代表伴隨現實台北與上海城市區域連結的新空間尺度，出現了在第二章提到的分層式寰宇主義想像。而我進一步對《雙城故事》和《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兩種「台北上海愛情故事」從事文本分析，觀察到在此跨界想像中，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邏輯與國族主義如何同時幫助了分層式寰宇想像；另方面，國族主義卻又與分層寰宇主義產生衝突。最終衍生了「台北／上海」為「落後／進步」與「台北／上海」等於「進步／落後」的邊界矛盾。

最後第四章我整理 2000 年後，台北「移工書寫」的形成脈絡；指出原本發源於南部農工文學與鄉土文學典範的「勞工文學」，轉變為以台北為中心的「移工書寫」。說明 2000 年初臺灣外勞政策緊縮的環境之下，台北市政府以多元文化論述推行「移工書寫」，可能顯示台北孕育了超越「公民權」限制，更開放包容的跨界想像。然而，進一步分析《外勞詩文獎》作品與第一部移工小說《我們：移動與勞動記事》，發現其中無法擺脫文化本質論、新自由主義，也沒有脫離國家公民權的認定，而將移工劃分在台北的邊界之外。

各章對這三種台北城市書寫現象的文本分析，顯示三種類型的寰宇主義跨界

想像與新自由主義、文化本質論、國族主義等意識形態的結合與衝突，進一步導致「新邊界繁生」，呼應 Appadurai (1990) 所言「目前全球結構的複雜性在於，經濟、文化和政治之間發生了根本性的斷裂與脫節」（6）。更重要的是，這些寰宇主義跨界想像全都存在明確的階級意含，除了台北時尚書寫所代表的「精英式寰宇主義」原來就是新自由主義跨國經理人的全球化浪漫幻想外；透過台北上海愛情故事觀察到的「分層式寰宇主義」，也仍然要透過跨國精英形象的「上海男人」才能想像；就連原本就是相應於過去寰宇主義過於偏重精英階級經驗，而產生的「差異的寰宇主義」到「悅納異己」與「多元文化」想像，我從以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為代表的移工書寫，也發現其仍需透過白領精英身份的菲籍移工，才得以述說移工成為「我們」的故事。亦即所謂全球化城市的跨界想像，其實總是為跨國精英形象開放。

再者，國族與種族的歧視也隱藏在寰宇主義的跨界想像中。像是代表台北與上海出現「分層式寰宇主義」的台北上海愛情故事現象，兩本小說都安排一個與眾不同的「上海男人」來與台北女子相戀，背後其實投射出的是傳統「中國人」落後、粗俗的偏見。而《外勞詩文獎》作品，移工想為自己底層勞動階級處境發聲的動機，將外籍移工與台灣／台北再現為落後與進步文化的差別，可能使個人的階級位置與國家種族的階級位置連結，成為「種族化的階級主義」

另外，性別在本論文中，是一個附帶的子議題。在衍生的新邊界下，可以發現女性比男性面臨更多的壓迫。像是《蛋白質女孩》小說裡，雖然台北城市使用者被定義為上層跨國經理人，但白領精英的女性卻被再現為「壞女人」，更不用說那些社經地位較低、或不具任何生產能力的女性：「倒垃圾的歐巴桑」或「我阿嬤」，其台北人的身份根本上就被否定。而《外勞詩文獎》作品裡，「女性特質」的期待，包括家務分工的角色與貞操觀，還被用來表現移工勞力能透支付出，及移工謹守自身為「勞動商品」的形象。如同曾嬿芬 (2004) 指出女性移民因在階級上比較容易處於劣勢，也因此更容易成為國家排除的對象。

總結而論，從研究結果而言，本論文以台北為例，指出全球化城市產生的各種跨界想像，都隱含著寰宇主義的地理空間觀。而我們必須謹慎地看待其中意識形態的運作，可能一方面讓人感覺台北與世界連結、台北接納能多元的城市使用者，所謂台北和台北人的邊界已經不再重要；另一方面台北與其它地方劃分的邊界卻不斷衍生，甚至像第三章提到的發生邊界劃分的矛盾，而台北城市使用者的形象不是以跨國精英形象出現，就是回歸到國家公民權架構之下。

從研究方法來看，本論文以觀察文學現象與文本分析為取徑，也補足目前對於台北城市書寫討論，在 2000 年以後斷代上的闕漏，找出台北時尚書寫、台北上海愛情故事與移工書寫，三種當代全球化台北具代表性的書寫類型。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後續議題

Balibar (1998) 認為邊界有真實的 (real)、象徵 (symbolic)、想像 (imaginary) 的層面。不過如同本論文最初的動機，是為了關注在實質界線運作與真實地理空間的邊界，或邊界管制的制度外，較欠缺的感知和想像層面的觀察。本研究討論的跨界想像所衍生邊界，只著重在象徵和想像的邊界。然而如同 Lamont and Molnár (2002) 所言：「一旦象徵界線成為社會普遍的共識，它就會成為某種強制性的特徵，並轉而成為實體「社會界線」 (social boundaries)」 (169)。真實、象徵和想像之間相互維繫、互為主體，因此其彼此轉換的過程實為後續研究的方向。

另外，本論文因篇幅與時間，在研究取材上，本研究的台北城市書寫僅以小說和部份詩文作品為觀察對象，並未討論到其他形式，如：散文或圖片、雜誌，甚至影片等書寫形式；而事實上台北時尚書寫還有，如：2000 年楊澤主編《作家的衣櫃》、與廣告名人許舜英的出版《大量流出》散文集等；台北上海愛情故事更多的是各種戲劇的呈現：如：舞台劇《雙城戀曲》、偶像劇《我在 1949 等你》、《轉角遇到愛》等；移工書寫也有許多影片的形式，如：電影《台北星期天》、紀錄片

《八東病房》等。都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持續討論之處。

最後，台北的跨界想像，後續也存在其他的可能，例如：當近來政府打造「東北亞黃金航圈」，除了讓台北與上海納入一日生活的範圍，目前也已經出現所謂「台北-東京一日生活圈」，未來也將出現「台北-首爾一日生活圈」，這新的「城際區域連結」空間形式與論述運作下的跨界想像，可能如何反映在台北城市書寫現象上，又如何可能存在新自由主義邏輯、國族主義或文化本質的意識形態，甚至也可能牽扯著後殖民的力量，其中台北的邊界又將如何衍生，都值得後續研究者關注。



References

英文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 (2) : 1-24.
- Balibar E. (1998) The Borders of Europe,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ondon, 216-232.
- Balibar, E. (2004)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translated by James Swenson,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 Barth, F. (1969) Introductio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Allen & Unwin, 9-38.
- Bauböck, R. (1998) The crossing and blurring of boundarie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s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Blurred Boundaries: Migration, Ethnicity, Citizenship, ed.*, CT: Ashgate, 17-52.
- Brennen, T. (2003) cosmopolitan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Archibugi, *Debating Cosmopolitics*, London: Verso, 75-84.
- Cawelti, J. G. (1976) Adventure, mystery, and romance : formula stories as art and popular cultur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rrida, J. (2001) On Cosmopolitanism, *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trans.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Hughes. New York: Routledge, 3-24.
- Douzinas, C.(2007) Cosmopolitanism Ancient, Modern, Postmodern ,Human Rights and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151-176.
- Durkheim, E., and Mauss, M. (1963)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26& 81-88.
- Ehrenreich, B. (2004) *Women: Nannies, Maid,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254-74.

- Friedmann, J. (1997) 世界城市之未來：都市與區域政策在亞太區域的角色，杜啟穎譯，*城市與設計學報*，2／3：1-24。
- Harvey, 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Jayasuriya, K. (1994) Singapore: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Definition, *The Pacific Review*, 7 (4) : 411-420.
- Kwok & Hsu (2005) Asian Dragons, South China Growth Triangle, Developmental Governance and Globalizing Taipei, *Globalizing Tai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UK: Routledge, 1-15.
- Lamont, M. and Virag, M. (2002)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167-95.
- Martin, J. (2000) Translated space／translated identity: landscapes of Chinese food in a Sydney street, 第五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基金會，211-45。
- Mitchell, W. J. T. (1986)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odleski, T. (2007)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NY: Routledge, 35-58.
- Norton, W. (2006) Cultural Geography: Environments, Landscapes, Identities, Inequalities.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P.
- Ong, A. (2004) The Chinese Axis: Zoning Technologies and Variegated Sovereign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 69-96.
- Pachuchi, M. A., Pendergrass, S., Lamont, M. (2007) Boundaries Progress: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New Contribution, *Poetics*, 35:331-351.
- Robbins, B. (1998) Introduction Part1: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ondon, 1-19.

Robbins, B. (1998) Comparative Cosmopolitanism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ondon, 246-264.

Robertson R. & White, K. E. (2007) What is Globalization, George Ritzer,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UK: Blackwell Pub, 54-66.

Pocock, D. (ed.) (1981)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London: Croom Helm.

Sturken, Marita and Cartwright, L. (2001) *Practices of Looking: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NY: Oxford UP.

Scott, E.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NY: Oxford

Sassen, S. (2002) Global networks, linked cities, NY: Routledge University.

Sassen, S. (2002) 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s, *Globa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Worlds*, KY: Wadsworth Publishing.

Sassen, S. (2007) The Global City: Recovering Place and Social Practices, A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NT: Norton, 97-128.

Smith, P. (2008) 文化理論面貌導論，林宗德譯，台北：韋伯文化。

Storey, J. (2003) 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李根芳、周素鳳譯，台北：巨流。

Tomlinson, J. (2007) 文化與全球化的反思，鄭槩元 陳慧慈譯，台北：韋伯文化

Wilson, R. (1997) 想像亞太：在太平洋的奇幻海域中忘掉殖民主義，陳國偉譯，城市設計學報，2／3: 41-61。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中文

2002 華文市場大贏家：幾米、王文華通吃兩岸，<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tomwang/author/0105ct.htm> [2009/02/03]。

- 王文華 (2000) 蛋白質女孩，台北：時報文化。
- 王文華 (2002) 蛋白質女孩 2，台北：時報文化。
- 王志弘 (2003) 影像城市與都市意義的文化生產：《台北畫刊》之分析，*城市與設計*，13：303-340。
- 王志弘 (2005) 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台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中外文學*，33 (9) : 9-51。
- 王雅萍 (2006) 誰來發聲？—1970 年代以後台灣勞工文學的興起與式微，*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論*。
- 王文華流行館，<http://www.readingtimes.com.tw/TimesHtml/authors/tomwang/index.htm> [2009/01/03]。
- 王文華新浪部落，http://blog.sina.com.cn/s/indexlist_1270305054_5.html [2009/01/01]。
- 文匯報，http://big5.news365.com.cn:82/gate/big5/wenhui.news365.com.cn/wybj/200909/t20090920_2470080.htm [2010/2/18]。
- 中國報導週刊，<http://www.china-week.com/html/1096.htm> [2010/2/19]。
- 不是一本書—讀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2008)，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content/newscontent-artnews/0,3457,112008123000496+11051301+20081230+news,00.html> [2009/2/11]。
- 方婉楨 (2002) 從城鄉到都市—八〇年代台灣小說與都市論述，*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論*。
- 出版情報，[http://www.kingstone.com.tw/publish/PublishInfo.asp?Kind=1&Pub_Date=\[2009/01/19\]](http://www.kingstone.com.tw/publish/PublishInfo.asp?Kind=1&Pub_Date=[2009/01/19])。
- 台灣光華智庫，「書」寫華文版圖 ——兩岸三地出版合流，http://www.sino.gov.tw/show_issue.php?id=2003109210006C.TXT&table=0&cur_page=1&distype=text [2009/02/03]。

- 名家—台海地區的新區域觀 (2010) 旺報，7月23日。
- 亞太文化系列 (2001) 中國時報，7月20日人間副刊。
- 朱大可 (2001) 台北對上海的感覺和單戀，中國報導週刊，<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chinaweekly/html/1096.htm> [1010/5/2]。
- 朱天文 (1992) 世紀末的華麗，台北：遠流。
- 林以青 (1995) 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〇年代的台北為例，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初版。
- 林秀姿 (2002) 重讀1970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德福 (2003) 全球經濟中浮現的北台都會區域：後進者全球生產網絡與空間結構轉化之研究 (1980-1990 年代末)，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耀德 (1990) 世紀末偏航，台北：時報。
- 林祖嘉 (2010) 台北起飛 東亞營運中心隱然浮現，國家政策評論，<http://www.npf.org.tw/post/1/8327> [2009/03/20]。
- 李昂 (2009) 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台北，聯經。
- 李政亮 (2005) 台北、上海與中國小資，去國・汎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台灣：新竹。
- 李建民 (2000) 八〇年代台灣小說中的都市意象—以台北為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穎學 (2002) 台北摩登—評王文華著《蛋白質女孩》，中國時報，8月19日人間副刊
- 洪珊慧 (1998) 李昂小說研究，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論。
- 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 [2009/6/30]。
- 咖啡因 (2003) 雙城故事，初版，小知堂。

邱貴芬 (2003)，「亞洲性」、「台灣性」與台灣外文學門研究：從紀錄片談全球化時代文化異質的展演與抗拒空間，國科會 86-90 外文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議，24-5。

周素卿 (2003) 全球化與新都心的發展曼哈頓意象下的信義計畫區，地理學報，34: 41-60。

周月英 (2009) 2008 開卷好書獎 BV：顧玉玲-我們，中時電子報，<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09/01/09/366647.html> [2010/6/2]。

周逸衡 & 徐明宜 (2001) 確保台灣廠商在全球高科技產業分工體系中不可或缺-建構以台灣為中心的「矽谷-台北-上海」以及「東京-台北-上海」【雙黃金三角】，國家政策評論，<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0/TE-C-090-057.htm> [2009/03/22]。

范銘如 (2008) 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文學地理，台北：麥田。

施叔青 (2002) 微醺彩妝，台北：麥田出版。

張小虹 (2006) 城市是件花衣裳，中外文學，34 (10): 167-186。

張茂桂 (2002) 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台灣的未來，台北：華泰，223-274。

張誦聖 (2005) 臺灣文學裡的「都會想像」、「現代性震撼」、與「資產階級異議文化」，廖咸浩、林秋芳主編，臺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屆，臺北：北市文化局，131-141。

高鈺昌 (2008) 台北的三副面孔——八〇年代以降文本中的三種台北圖景，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論。

莊雅涵、王奕婷 & 吳偉立 (2004) 我們活在不同的台北？—台北政治暨文化性格：1994—2002，政治科學論叢，21：49-74。

蛋白質的修辭學 (2002)，中國時報，9月13日39版。

楊佳嫻 (2004) 論戰後台灣外省小說家作品中的「臺北／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論。

黃宗儀 (2008) *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大都會的自我身份書寫*，初版，群學。

黃宗儀 (2007) *全球都會區域連結的跨國身份想像：以上海與台北為例*，文化研究，4: 8-35。

黃宗儀 (2007) *東亞全球都會區域的相互凝視與自我書寫：以香港與上海為例*，思與言，45 (1): 29-57。

黃孫權 (2006) *如何測量台北的邊界？—border, boundary, frontier and in between*，黃孫權主編，*隱逸的城市靈魂*，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黃鎮台 (2001) *兩岸科技產業發展與未來*，國家政策評論，1 (5): 95-97。

黃慧鳳 (2007) *台灣勞工文學*，台北，國立編譯館。

劉中薇 (2002) *尋找一座城～市民書寫中的台北形象*，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系碩士論文。

劉亮雅 (2007) *後現代與後殖民*，陳建忠等主編，*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317-401。

劉亮雅 (1995) *擺盪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國族、世代、性別、情慾問題*，中外文學，24 (1): 7-19。

劉亮雅 (2004) *後現代，還是後殖民？：《微醺彩妝》中的景觀、歷史書寫以及跨國與本土的辨證*，中外文學，33 (7): 97-100。

歐佩佩 (2005) *王文華現象：都市、品味、消費與愛情—台灣當代大眾文學的一個面向*，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論。

郭誌光 (2006) *戰後台灣勞工題材小說的異化主題 (1945～2005)*，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論。

陳大為 (2004) *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台北：萬卷樓。

陳大為 (2000) *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 (1980-199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義芝 (1998) *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
- 夏鑄九、劉昭吟 (2003) *全球網絡中都會區域與城市：北台都會區域與台北市的個案*，*城市與設計學報*，15／16: 39-58。
- 夏曉鵠 (2005) *全球化下台灣的移民／移工問題，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328-367。
- 梅家玲 (1998) *八、九〇年代眷村小說 (家) 的家國想像與書寫政治*，*台灣現代小說史縱論*，台北：聯經，385-410。
- 梅家玲 (2001) *兩岸關係中的文學想像，家國之間：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動機緣*，台北：新台灣人基金會，311-324。
- 楊岑雯 (2003) *幾米・王文華，如何暢銷到中國？2 個台灣文化品牌的打造故事*，*數位時代雙週刊* 58 期，<http://www.books.com.tw/magazine/item/bnext/index0516.htm> [2009/02/03]。
- 廖元豪 (2006) *全球化趨勢中婚姻移民之人權保障：全球化、台灣新國族主義、人權論述的關係*，*思與言*，44 (3) : 81-129。
- 廖咸浩 (2004) *台北摩登：現代性與愛恨台北*，*歷史月刊*，203: 26-33。
- 藍佩嘉 (2010)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
- 趙剛 (2006) *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2: 147-189。
- 蔣興立 (2010) *蜉蝣之城—朱天文與施叔青小說中的台北時尚書寫*，2010 年文化研究年會，http://hermes.hrc.ntu.edu.tw/csa/conference/index.asp?C_ID=31 [2009/03/20]。
- 鄭鴻昇 (2004) *台灣人的大陸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6: 271-284。
- 藍佩嘉 (2005) *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臺灣社會學刊*，34: 1-57。
- 藍佩嘉 (2007) *性別與跨國遷移，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25-248。
- 觀念平台：打開新東亞想像，2008，中國時報，12 月 9 日。

顧玉玲 (2008)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台北，印刻文化。

應鳳鳳 (2007) 「反共+現代」：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文學版，陳建忠等主編，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112-195。

萬瑞君 (2010) 2012 台北、北京、上海黃金三角，台北：聚財資訊。

